語言文字
約定規範
學淵源
應用源

掌握时代脉搏·激发人文关怀

知識分子的挑戰！

社會良心。時代眼睛

還于知識分子本色

誰來了解知識分子

有力感的知識分子

吹响知识分子的集结号

36

ROSA SINENSI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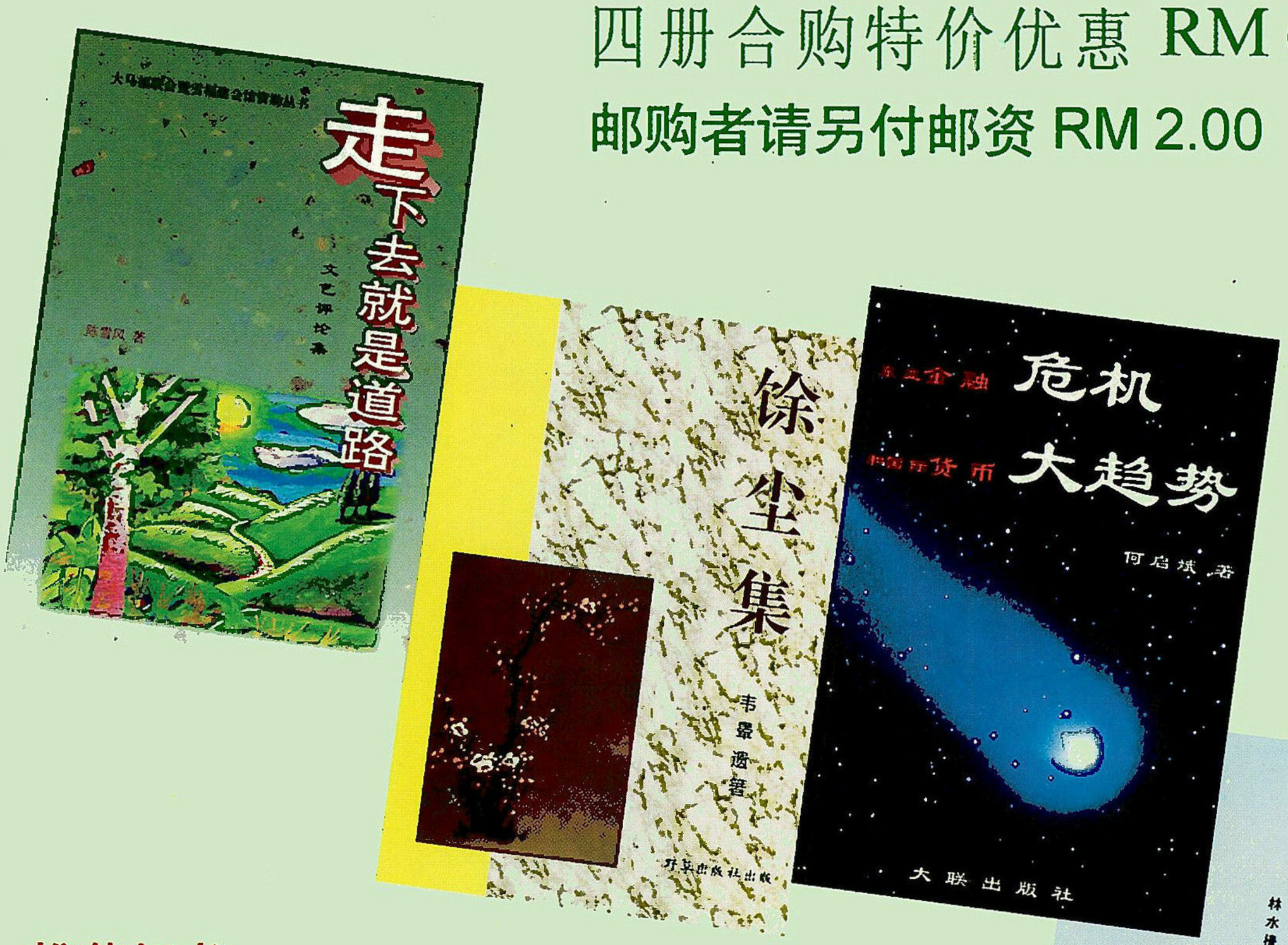
KDN PP 7865/1/99 . ISSN 0128-8369 . 1992年創刊 . 1998年12月31日出版 . 定價： RM 8.00

推荐好书

配套订购特别优待

四册合购特价优惠 RM 65.00

邮购者请另付邮资 RM 2.00



推荐好书

1. 《马中文教与思想抉论》林水檬著
   每本定价 RM 14.00
2. 《东亚金融危机和国际货币大趋势》何启斌著
   每本定价 RM 20.00
3. 《走下去就是道路》陈雪风著
   每本定价 RM 20.00
4. 《餘尘集》书晕遗著
   每本定价 RM 18.00

代售处：

华社研究中心（华研）(271806-T)

HUAZI RESOURCE & RESEARCH CENTRE BHD.

No.1, Jalan Maharajalela, 50150 Kuala Lumpur, Malaysia.

Tel:03-2734035 Fax:603-2734037

E-mail: huayan@huayan.net.my

编者的话

我国有24位有知识与有学问的人士，在一年多之前，联名发表“马华知识界文化宣言”，公告社会，知识分子有思想与批判，关怀社会人文问题，以“天下为己任”，“知其不可为而为”作为其座右铭。他们愿以其批判性的言论，作为第三种声音。在这份“宣言”中，他们也曾对华社的活动与事务作出批判与诉求。

发表“宣言”一周年后，他们中有人举行纪念聚会，而且公开发表感言；其中有炫耀，也有失望的感伤。不过，过后，知识分子的第三种声音却消逝了——一片沉默，一片冷漠。

知识分子去了哪里？

特别是当前我国正处在多事之秋的状况中，我们的许多知识分子，却叫人想到“不见踪影，没听到他们的声音”。

因此，在华研社教部举办“马来西亚知识分子的挑战及其角色的再探讨”讲座的基础上，本刊又邀请骆静山撰写〈谁来了解知识分子〉，并附录其著名论著〈知识分子论〉与庞朴的〈知识分子与文化认识〉等鸿文，呈献给读者，希望能进一步对知识分子与其所扮演的角色，有更清楚的认识。

本期另一组学术论文是论述方块字的起源、发展与规范的问题；杨欣儒的〈外来语与译名的规范〉与王介英的〈马来西亚华文华语的规范〉，都与我们学习华文华语有直接的关系。王玲的〈赏析表现人与生活的两组汉字〉与她和马进教授合作撰写的〈语言与现实的比较与分析〉，既是方块字的学术研究，又是学术研究结合我国华文华语的现实情况的论述。马进教授与王玲讲师的论文，让我们增加关于民族本身的语言文字的知识，同时，对于前些日子有人老调重谈华文难学的片面见解，也是一种有力的辩驳。

我国当前是多事之秋。金融风暴袭击之后，有种种后遗症；安华一日间由国家领袖而成“罪人”，他的现象在发展，他的案件也在审讯中，无论其结果是什么？他的现象与案件，都是国家的大事。可惜“文摘特区”能立此存照的只是突变的发生至他入狱作阶下囚的论述。自然，好戏还在后头。

另外，必须要借此机会报告的是：本刊出版这一期后，即告停止。华研将于1999年出版一本综合性之人文杂志，以取代《资料与研究》，敬请读者及各界人士垂注！

第 36 期

目录

31/12/98

资料与研究
Rosa Sinensis

封面题字：何维城
出　版：华社研究中心
出版人：程道中

编务咨询委员会
陈忠登教授　游若金博士
蔡维衍博士　缪进新
蔡庆文　张灿泉　罗正文
钟启章　黄玉莹　李业霖
编务执行委员会
顾问：林水檬博士
游若金博士　李业霖
主编：陈思庆
编务委员：李雅芬　徐云彪

编者的话

华研之声

4 华研亟需理念与制度建设 / 游若金

学术风华

7 社会良心·时代眼睛 / 许文荣

11 谁来了解知识分子 / 骆静山

14 知识分子论 / 骆静山

18 知识分子与文化认识 / 庞朴

22 还予知识分子本色 / 张永新

23 有力感的知识分子 / 丘光耀

28 知识分子的悲情与悲剧 / 唐彭

30 语言与现实的比较与分析 / 王玲 / 马进

37 赏析表现人和生活的两组汉字的源流 / 王玲

44 马来西亚华文华语的规范化 / 王介英

50 外来语与译名规范 / 杨欣儒

54 文章要讲究文采 / 李业霖

56 欧人咖啡园 / 赖顺吉译

发行处：
华社研究中心 (271806-T)
Huazi Resource & Research Centre Bhd
1, Jalan Maharajalela
50150 Kuala Lumpur
承印：
Perniagaan Yakin
4 Jalan Pudu Ulu Cheras
561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出版日期： 31/12/1998
定价： RM 8.00
KDN： PP7865/1/99
ISSN： 0128-8396

华研文苑

63 时局省思 / 陈亚才

文摘特区

谁主浮沉
65 安华被革职声明全文
66 安华被革职
67 安华终于被革职
68 政坛 10 年最大地震 / 郑丁贤
70 安华二度致函首相 针对诽谤作出解释
74 安华从革职到被捕演变
85 安华 9 宗罪
86 危机中的亚洲：风险和机会 / 李光耀
89 慕沙谈论"改革运动"
92 看华人受凌辱的历史 / 范俊登
94 印尼华人留下的空位 任何人都可以填补？ / 湛焕义
96 印尼同化政策走进死胡同 / 黄昆章

经济纵横

98 海外筹资为银行解困 / 杨名万
100 财务顾问与经济顾问之别
101 所罗门史密特巴尼 资金庞大业务多元化
103 梭罗的一封投书 点燃了狙击之火 / 南方朔

传真走廊

107 其心可诛 / 谢继麟
108 谁最先把中秋节政治化？ / 黄进发
109 烈火莫熄殃及传统文化 / 刘磐石
111 传统节日与政治化 / 张小兰

华研亟需理念

游若金

华研于1994年注册为非营利公司后，笔者曾在本栏数度撰文，寄以厚望。但这几年来，除会所扩建外，华研在学术方面建树不多，而行政方面仍然未上轨道。兹番承蒙主编一再邀稿，在此愿就“中心”定位及相关问题献上数言，以供董事诸公参考，尤其是常务董事们。必须声明的是，笔者忝为董事，却把意见公之于此，无非是希望和关心华研的人士共同切磋。

中心定位之表述向来不固定、不一致。其中一说法是：华社研究中心是一所学术研究机构，以“马来西亚华人研究”为其主要学术范畴。这是一个正式的说法，因为它曾在1997年8月出现在《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的〈发刊辞〉里，以及在1997年10月出现在《全国华团文化工作总纲领》上。此外，这种说法曾在董事会议上讨论过并被接受。另外一个极为普遍且被当作定位表述的说法是：华研是华社的智囊(团)。这种说法振奋人心，谁曰不宜？故常挂在人们口上，有如口头禅。反之，“学术研究机构”之说，在华研的许多文件或集会上，没有被提及，原因何在？

其实，笔者认为问题不在于中心定位是否有固定的表述。（当然，固定的表述是重要的。）“学术研究机构”也好，“智囊”也好，仅是个名称，有关观念的意义、实际的内容与形式、落实的步骤、营管的原则，则未曾进行过有系统的研讨，连基本的共识都没有，这才令人遗憾。

有人对“学术研究”有所顾忌，而强调“智囊”。他们认为学术研究注重理论，不尚实用，而华社目前亟需一个智囊机构为其献谋设计。因此他们直接建议华研成为一所策略研究机构，或折衷建议华研“以策略研究为主，以学术研究为副。”有关建议把学术研究和策略研究对立起来。

我们有必要弄清楚什么是“学术研究”，学术研究就不是策略研究吗？华研是否必须成为策略研究机构（有如ISIS），否则就不能成为华社智囊吗？成为策略研究机构以后的华研，它的策略研究就不属于学术研究吗？

“研究”(research)这个词儿是科学界的一个专门用语，意思是：针对界定的课题，根据理论或假设，有系统地搜集、整理、分析资料，逻辑地阐释分析结果，达致结论，并撰写报告，传达给有关方面。研究的目的在于增进有系统的知识(systematic knowledge，如“马来西亚华人研究”——Malaysian Chinese Studies)。

这样的研究称为科学研究(scientific research)，以别于一般用语的“研究”。由于科学研究是研究机构、高等学府所着重的研究（不论自然科学或人文科学），因此也称为学术研究(academic research)。

笔者认为“华社研究中心”这个称呼中的“研究”一词应是科学界的专门用语；华研所进行的策略研究应该是属于科学（或学术）研究，而具有上述“研究”定义中的各种属性；华研所进行的研究其实是具有策略意义(strategic/policy implications)的学

与制度建设

术研究。换句话说，学术研究可以涵盖策略研究。因此，华研仍然可以是“一所学术研究机构，以‘马来西亚华人研究’为其主要学术范畴。”它将通过科学研究，侧重具有策略意义的课题，作为华社的智囊。

华研历来所举行的各种学术活动，诸如研讨会、座谈会、专题演讲、出版书刊等，都不是“研究”活动。讨论策略的座谈会，有其意义，但也不是“研究”。笔者不反对华研举行各种学术甚至非学术活动，但它必须着重学术研究，否则它就不是“研究中心”了。

我的观察是，如果把华研发展为一所真正的学术研究中心，它将失去对两种人士的吸引力。第一种人士把华研当作是一个“政治行动主义者”(political activists)的团体；第二种人士把华研当作一般性华团，进行各种非学术活动。两种人士彼此颇能配合，因为他们对华研定位为学术研究机构都不热衷；对他们来说，“智囊”似乎较“灵活”，较有适合他们的“活动”空间。

以华研成立的历史背景与宗旨来说，华研基本上是一个华人团体，不过它具有固定的定位与功能，与一般华团有别，不可移为别用。如果华研被移为别用的状况无法改善的话，它将无法发展为学术研究机构或华社智囊。

很多人同意华研作为华社的智囊，但不曾有人构思过，华研和华社，这项智囊服务的提供者与接受者，应建立何种正式的、持续的、有实质的关系。笔者觉得华研首先应广泛地邀请全国各地大小华团加入华研成为其团体会员；其次，华研和华总、董总、教总三机构（根据章程，每一机构可派 3 人成为华研董事）应共同促使全国主要华团设立一个联合机制，以便和华研建立正式而具有实质的关系，并界定和处理两者之间的义务和权力。目前，“华研是华社智囊”不但是一厢情愿的说法，更是一个空洞的口号。

有人以为华研的发展亟需资金和人才，但笔者认为华研更需要明确的、具有共识的定位，以及良好的营管理念与制度。一个定位不具共识，组织和行政不上轨道、缺乏效率的机构，是不可能得到由专业人才管理的基金会的赞助的，也难吸引人才。假设奇迹发生，华研明日忽获大笔捐款，一流人才纷纷愿意就聘，但定位不明、制度不立，财力和人才如何发挥作用？除非再有奇迹。

华研应如何达致有关定位的共识，内部运作的制度化，与华社关系的正式化及实质化，应由董事们负责进行。在这经济低迷的时刻，其他建设恐怕不易进行，但理念及制度的建设，还有可为。如果各成员的思考力，能够获得适当的领导而发挥作用，则一年之内，理念及制度的建设必有可观。当国家经济复苏时，华研也就能处于良好的“准备状态”。

学术风华

社会良心 时代眼睛

当今马来西亚知识分子的挑战及其角色的再探讨

许文荣

对于知识分子的定义向来众说纷纭，这或许显示了各个社会对知识分子形象的多元观。笔者无意去加以整理这些歧异的看法，这是一项艰难及吃力不讨好的工作。本文对于知识分子的观念，是取笔者所认同的看法。

社会学家席尔思 (Edward Shils) 在本世纪50年代曾为近代西方知识分子提供了一则经典式的定义："每个社会中.....都有一些人对于神圣的事物具有非比寻常的敏感，他们对于宇宙的本质、对于掌理社会的规范，都具有非凡的反省力。在每个社会中有少数人比周遭的寻常伙伴更探寻、更企求不限于日常生活当下的具体情境，希望经常接触到更广泛、在时空上更具久远意义的象征。在这少数人之中，有需要以口述和书写的论述、诗或立体感的表现、历史的回忆或书写、仪式的表演和崇拜的活动，来把这内在的探求形诸于外。穿越当下的具体经验之屏幕的这种内在需求，标示了每个社会中知识分子的存在。"[1]

在席氏的叙述中，知识分子群应抱括了学者、作家、新闻工作者、演艺工作者、神职人员等等，然而，知识分子比这些行业/专业人士有更宽广的兴趣与关怀，各行业/专业人士若只对本身的专业领域感兴趣，还不能算是知识分子，只能称为"脑力工作者"；知识分子以其敏锐的嗅觉及爱好思考反省的大脑，不满足于事物的表象而求本质，他们对社会、国家以至全世界的美好价值（神圣的事物）表现出高度的关注，并通过各种方式表达他们的论点。

席氏对知识分子的论述中，美中不足的是，缺少了如爱德华·萨依德 (Edward Said) 所强调的"批评者"的角色，这是近代西方知识分子最本质的性格，也因此使他们被誉为"社会良心"。为了维护人类基本价值（如理性、公正、自由、爱等）他们一面批评世间的不合理，一面推动这些美好价值的实现。[2]2,500年前的孔子也曾有提及知识分子的这项角色，他说：

[1] 席思尔，〈知识分子与权势：比较分析的一些角度〉文收《社会与历史的比较研究》，转引自爱德华·萨依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台北：麦田出版社，1997年，页72。

[2] 余英时，〈略论中西知识分子的源流与异同〉，《内在超越之路——余英时新儒家论著辑要》，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页125-126。

"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3]换句话说"天下无道则庶人议也"，这里所谓的"议"指的正是批评的意思。

近代西方的知识分子多数不隶属于任何社会阶级或团体，不服事任何权力或权威，尤其是统治阶级，这使他们更能发展出"自由批判的精神"；一如爱德华·萨依德所说的，他们是"另类人"、"业余者"：即他们的动力来自对事物的关切和喜爱，而不是为作个人或某个集团的利益，或追求狭隘的专业性成就。[4]明显的他把政治人物排斥在知识分子以外。无论如何，在古代中国的"士"的传统，政治人物是与"士"分不开。"士"的中心任务一方面是文化和思想的传承与创新，另一方面是辅佐君王励精图治。中国的古代知识分子（尤其是受儒家传统薰陶的知识份子群）的确兼具有文化人与政治人的双重身分，[5]这就难怪孟子为什么曾经痛骂提倡为我主义，不鼓励知识分子参政的杨朱为"无君"，是"禽兽也"了。

时至今日，马来西亚还未建立明确的知识分子传统，过去由于教育水平的低落，尤其是华族人士，因此尚无法产生真正的知识人。马来族群也是在独立建国之后才在教育上快马加鞭，80年代才有中产阶层知识分子的崛起。一直以来马来西亚知识分子没有独立生存的环境，他们多依附在社团、政党等组织里，处于从属的地位，担任献策或咨询的次要角色。马来西亚教育的普及与发展只是近十年来廿年的事，随之而新兴的知识分子队伍尚无法建立崇高的威望，比起政党领袖及华团领袖，他们的言论尚未获得普遍的重视，去年《知识界文化宣言》的发表没有激起多大的回响就是其中一个明证。

"学而优则仕"的思想仍然在马来西亚知识分子群中根深蒂固。从安华的加入巫统，以及80年代的华裔知识分子参政的论争中，可以看到还是有许多人认为知识分子参政才能比较有效地进行改革。然而，参政后的知识分子往往受党鞭及官僚机制的牵制，本身反而被改革而变质，放弃独立思考的权力，以集团利益为依归；因此，董教总看来对本身曾支持参政的华教分子在政坛上的表现并不感到满意，一度官拜副首相的安华也莫名其妙地成为马来西亚有史以来最悲剧性的人物。另一类的知识分子则选择服务于官方赞助的研究机构，如策略与国际研究中心（ISIS），马来西亚策略研究中心（MSRC）、政策研究中心（IKD）等，成为执政党或政党领袖的智囊团成员，[6]这些御用文人只能跟着官方的旋律引吭高歌，肯定无法唱反调。此外，由华团及华商所成立的华社研究中心，过去也明显地服务于这两个集团，如从事编工商指南这一类的工作，虽然现今这种情况已经有所改变，但华研至今仍然无法建立较高的知识与学术权威。

冲不出族群的藩篱，也是当今马来西亚知识分子的悲哀。从过去到现在，在我国所进行的种族路线的政治斗争，在各族里造就了族群关怀浓厚的知识分子。最近马来知识分子召开"知识分子大会"争取马来文地位的诉求很明显地仍然无法摆脱在族群斗争的格局，[7]华社所最敬重的两位知识份子，即林连玉与沈慕羽的影响力也只限于华族的范围。当今马来西亚，除了作家乌斯曼·阿旺及学者詹德拉·穆查化与佐摩·孙德南之外，还无法找到其他堪称为是马来西亚国族的知识分子。各族知识分子各自为政，拥有本身的斗争议程，这不能不说是使到马来西亚知识分子队伍疲弱的原因之一。

诸多的言论的限制与禁忌，泛政治化的干预（例如《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所遭受的），处在半开放社会的马来西亚，使知识分子不能

---

[3]《论语。季氏篇》，见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香港：中华书局出版，1984，页174。

[4]爱德华·萨依德，同注1，页121。

[5]余英时，同注2，页124。

[6]"The Growing Link between Think-tanks and Politicians", New Straits Times, 7-1-96.

[7]鲁斯丹A沙尼，《知识分子和巫青团》，吉隆坡：《南洋商报》18-9-95。

对现实的腐败畅所欲言。在这方面，政界的知识分子面对的挑战最大，报界的知识分子则其次，文化界及学术界的知识分子相对的有较多的自由空间发挥，但有一些则选择向政权靠拢，另一些则陶醉在狭小的书斋里皓首穷经、与世隔绝。敢于讲真话的知识分子属于少数中之少数。

世俗化在加上冷漠的社会，使大多数人趋向功利主义，对真理的探寻提不起劲，对普遍价值的维护显得意兴阑珊。多数人的愿望只想成为专业人士，提供专业知识与咨询。此外就是个人的名利地位追求。有人认为，唯有使用激烈并带着挑衅的议论方式才能激起知识分子的斗志。在这方面，看来黄锦树及曾庆豹拿捏得最传神。

马来西亚的历史进程一直是由政党及政治人物所主导，虽然初期是由知识分子所发动，但是到了后期则是由政治人物扮演着更积极的角色。60 及 70 年代马来族群的马来语文斗争、思想革命以及回教化运动，基本上都是巫统的政治议程。真正比较属于知识分子的斗争，是 60 年代末期及 70 年代初期为下层老百姓请命的大学生运动以及从建国以来华人知识分子维护华教与反同化的斗争。这些知识分子站在少数民族（弱势民族）的基本权益而说话，所扮演的正是施压者 / 批评者的角色。由于不公平、不合理、滥权、贪污、裙带风等现象在我国仍然存在，知识分子的批评者 / 监督者的角色有必要加强，制造更多的舆论以向权威施压。近来一些知识分子也渐渐比较活跃于非政府机构 (NGO)，加强知识分子的声势，这种趋势的发展是令人鼓舞的。

去年，第一次以“知识人”名义发表的《马华知识界文化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则认为知识分子应是知识文化的钻研者，并发挥其在文化思想上的传承、转化、批判及启蒙的功能。[8] 在文化上继往开新，是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当今的华社知识分子仍然应在这方面贡献所长。当然，文化建设是一项共同的民族任务，因此《宣言》认为政党在文化上的任务在于“争取国家文化政策、教育法令以及言论自由的更大空间，有效地保障马华文化的生存与发展”；华团的文化任务在于推广民族文化。各集团人士应各尽其职，在这个过程中不应有任何主从关系的出现。

然而，很遗憾的，《宣言》里的其中一段话：“政治人物，或具有政党背景的人物，必须远离文化团体，还马华文化一块净土”却被人误解了，有些人甚至对这段话有过激的反应。他们没有清楚再阅读下文：即“若他们坚持要在华社文化团体里活动，就必须一切以马华文化建设为优先考虑。”这种要求何错之有，我们必须阻止一些另有企图的政客利用文化组织来获得个人的政治利益，以确保我们真正为文化而文化，而非为政治而文化。

知识分子也应该是一位“超越者”，不是为自己或者某集团甚至某个族群的利益而斗争。一个只是被民族感情所驱使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眼界是狭隘的。殷海光说，民族感情有时是盲目的，[9] 因此对一个象马来西亚这样的多元民族社会没有好处。知识分子是一个真正追求真理的人，如孔子所说的“士志于道”。为了追求真道，他们必须是“超越者”。席尔思指出，古代各民族的知识阶层最初都和一种“神圣的”(sacred) 传统有渊源。余英时解释说，这个“神圣的”传统便是人类古往今来所追求的“理想世界”、“精神世界”；而落实到社会文化的层面，便成为超越的普遍价值。例如西方人所推崇的“公平”(justice)、“理性”(reason)、“爱”(love)、“自由”(freedom)等普遍价值，其来源便是基督信仰与希腊哲学；大多数中国人所肯定和接受的“仁”、“义”、“礼”、“智”、“信”等价值也和儒家思想息息相关。[10]

---

[8] 安焕然等，《马华知识界文化宣言 - 我们对马华文化建设的基本观点》，见《南洋商报》，6-7-97。

[9] 殷海光，〈知识分子的责任〉，载于《中国文化展望》，台北：出版社与出版年代不详，页 671。

[10] 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创世纪〉，文收《内在超越之路 - 余英时新儒家论著辑要》，同注 2，页 229。

知识分子自始便是这些普遍价值的卫护者。他们有了超越的精神权威为根据，才能反过来批判现实世界中种种不公平、不合理等现象。美国近代最著名的人权斗士马丁路德金牧师，以基督信仰为超越精神权威严厉地批判美国的种族歧视与不平等；马来社会知识分子一般上比较敢怒敢言，他们所依仗的精神权威便是回教价值观；反之深受世俗化影响的华人，所重的只是个人切身利益，常常在许多议题上表现得畏畏缩缩，或者观点前后矛盾。

近来也有一些知识分子参与心灵建设工程，倡导正信宗教价值观、参与心理辅导的工作、投身于各种艺术活动等，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世事的纷纷扰扰，使到现代社会人心的躁动、不安、暴戾与乖谬，需获得及时的指引与疏导，以获得心灵的安顿，或者反之将成为现行社会秩序的破坏者。有些知识分子轻视心灵建设的工作，只讲求外在（硬体）社会体制的改革，然而，若没有内在（软体）心灵的建设的支援，社会体制的改革终归无法深入与彻底。一个外表肥壮但心灵萎缩的新一代，不可能建立一个完善的新体制。因此知识分子除了是社会体制的批评者，同时也是人类心灵的监督者，对黄色浪潮、极端的功利世俗思想与自私心理、不道德的行径等也得进行批判。

知识分子若要建立崇高的威信，亦得以“修身”为重，行孔子所说的“修己以敬”。崇高的道德人格可使知识分子的言论更有说服力。刘述先有一次在访谈时说，知识分子也有贪财好色之徒，他们批评别人只因为自己得不到，这句话听起来很刺耳，但却不是无的放矢。作为“社会的良心”的知识分子，如果这颗“良心”有道德上的严重污点，就很容易被反对派反咬一口，无法有效地发挥其功能，也使知识分子的微弱的声音更加没有市场。

诗人李白的诗云：“古来圣贤皆寂寞”，这是有道理的。台湾哲学界泰斗殷海光也说，那些不甘寂寞的人不能成为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经常是一位独立思考者，他必须要忍受孤寂，不会迎合世俗的观点。盲目地支持而不管是非对错不是知识分子的本性；“人人都这么做，世事本来就是如此”[11]更不是知识份子的口头禅。唯有独处的时候，知识分子才能洞烛幽明，成为世上的光，照亮在黑暗里的百姓。

马来西亚知识分子可在社会上扮演着多层角色，但同时也必须面对多重的挑战，因此他们必须要有一颗高度热诚与关爱众人的心，才能完成他们的时代使命。他们参与社会改革，不是因为一己或一小集团的利益，只因为自己内在良知的呼唤，为了正义而把个人利益、荣辱及安危置于度外，“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或许知识分子注定是一位为爱因斯坦所形容的“为别人而活的人”，也因为如此而使他们获得社会的尊重。

（作者现为南方学院中文系系主任）

[11] 艾德华·萨依德，同注 1，页 135。

谁来了解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热”的两个高潮

骆静山

81年4月30日至5月1日，经过多年的求证，我在南洋商报《商余》版发表了《知识分子论》一文，阐述知识分子的定义、本质、角色和历史命运，并列举他们的理想类型。此文引起时评家许光道先生的注意，他在《知识分子的战斗位置》一文中给予很高的评价。此后华社间歇出现了“知识分子热”，第一个高潮应以80年代中期胎死腹中的“前驱社”为标志。在这股热潮的推动下，南洋商报应多位读者请求，于85年8月23日至24日重刊这篇文章。编者在按语中说道：“这篇文章的内容，对知识分子的本质和任务，有精辟的评析。这些论点最近一再在本报言论版被引述，受到华人社会广泛的关注。……”到了88年3月，我又应邀在《大专青年》系列之一发表《学术探讨与知识分子展望》一文，当作前文的补充。这两篇拙作都收录在华社资料研究中心于94年6月出版的《知识分子与社会文化》一书。

跨进90年代以后，马大中文系毕业生协会和大马中华大会堂总会等团体陆续举办了规模宏大的华人文化国际研讨会，使华社产生了一股“文化热”。这时候，作为文化的监护人，知识分子的角色再次引人瞩目。有关知识分子的议题重新被炒热，参加讨论的以新一代的学人为主。于是“知识分子热”出现了第二个高潮，其标志应是97年6月30日出笼的《马华知识界文化宣言》。这项宣言虽然不够严谨周全，代表性受到质疑；但是它显现的群体醒觉，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委实是近年文化界所欠缺的。

没有欣喜只有惆怅

听到《资料与研究》双月刊在谈论知识分子的专辑中，要推出我的陈年旧作供大家参考，心里感到不是欣喜，而是惆怅。原来前述拙作发表的17年后，对知识分子议题不是愈辩愈明，而是越谈越乱。这个议题已经被人搞烂了。我本来不想再谈，只因思庆兄拳拳约请，不得不黾勉交差。

由于“知识分子热”的粗疏和浅陋，加上率尔操觚的人太多，90年代涉及知识分子的论争显然被误导了。这种不健康的趋势扭曲了知识分子的形象，使他们的声望锐跌，几乎被当作徒托空言，对社会毫无建树的话匣子。

近代西方历史表明，没有知识分子在观念领域的创新，欧洲就不可能实行在政治、经济、社会、知识、宗教和心理各个文化于系统的现代化转变。（参阅 Manfred Halyerm, "The Revolution of Modernization inter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Society" in Nomos, New York, 1966, P.195）同样的，近代东方知识分子也是新文化的播种者，没有他们，东方社会也不可能实行现代化转变。

华社产生了“知识分子无用论”是非常不幸的，我想也许大家看到的多数是“伪知识分子”和“半知识分子”。诚然，如果华社拥有众多具有真知灼见，深厚学养，并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我们的学风和文化氛围便不会这

么窳败和令人窒息。

半文化现象和伪知识分子

无庸讳言，华社偶而出现文化热的底下存在着泡沫文化。它徒具形式，缺乏实质，失却了本能升华，指向未来的超越意义。它类似路易·多洛 (Louis Dollot) 所辨认的“半文化”。这位法兰西学院的院士认为，半吊子的文化比愚昧本身还要危险。他说今天掌握半文化的人在文化界占据重要的位置，形成“伪知识阶级”。真正掌握“全面文化”的知识分子反而被边缘化，人微言轻，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

台湾佛光大学校长龚鹏程说：“有时知识分子会觉得这个社会似乎已经不再需要传统知识分子了。什么以天下为己任，主导历史的动向，引领社会的发展，渐渐成了可悲的笑话。”他又说：“发现主导社会已不可能，又无力于攀附者，便可能试着安于边缘位置。例如不再奢谈历史与社会，只求能以其知识餬口。”陋儒昧于客观环境，硬要知识分子以事功来确定他们的存在价值，这是无知的表现。他们看到当今的知识分子只能立言而不能立功，便加以嘲弄。如果华社普遍存在这种文化幼稚病，知识分子除了成为闹市中的隐者，还有什么选择?

知识分子生存的环境

十年前，我在前述《大专青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知识分子能够发挥他的社会功能，那是因为他拥有生活的凭借和稳固的基地，有许多同胞欣赏他，可以听到他的声音，并且产生持久的共鸣。缺少这些条件，知识分子就很难在社会上浮现。”

我又说；“以目前的情况来说，外在的压力和内部的腐烂很难使华人社会为知识分子的成长提供有利的条件。知识分子生存的环境严重地伤害了他们的性灵，使他们不能以集体的力量去挽救自己的命运和民族的命运。”

十年来，知识分子生活的环境并没有显著改善。尽管华团邀请了许多国际文化明星来宣扬传统文化，但是他们宣讲的主要内容是已经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被打倒的玄学，对解决当前的马华文化问题没有多大帮助。无可否认，华团领导机构对推动华人文化活动未曾懈怠。但是资源的投入非常巨大，文化的产出却令人失望，个中原因同领导素质和所托非人有关。

华团领导机构虽有耕耘，我们的文化园地依旧荆棘满布，杂草丛生。有毒草存在的地方便不会出现香花和秀草。只要重虚名而不重实学，看形式而不问实质的情况持续下去，真正的知识分子便无从施展他们的抱负。

夏虫不可与语冰

由于站在时代的前沿，具有超前的思想，并且对人类精神的超越升华作出许诺，知识分子与社会秩序有一定的疏离感。他们得不到世俗的了解是不足为奇的。历史告诉我们，“殷忧启坚”，伟大的知识分子都是饱经风霜，在历史大变革的动乱时期出现的。马华新一代知识人在和平和繁荣的时期成长，缺乏深刻的忧患意识和社会体验。那些以知识分子自称的人，如果对知识阶层的历史命运和特质了解不够，社会阅历又不深，他们便很难有效地扮演知识分子的角色。我在报上常常看到有人对知识分子的定义和角色不甚了了，却又对后者大放厥词，又有人今天自认为知识分子，明天看到知识分子被围剿，便立刻丢掉知识分子的标签，甚至倒戈相向，这都是知识界浮滥和不成熟的表现。

知识分子在奔向理想王国的道路上，受到历史惯性和现实王国的双重束缚。涤荡一切的消费性大众文化已经消解了他们巨大的历史热情。他们看到从中世纪等级特权关系中解放出来的人，又在现代商品关系中异化为“非人”。面对这种情况，他们有深沉的无力感。对历史投入毫无效果的他们，变成市侩揶揄的对象，有时还要遭受文化打手的狙击。罕有人能了解他们的内心和行为，也许只有他们才能互相了解。如果他们不能互相了解，可能当中有鱼目混珠的成分。

〈知识分子论〉非一家之言

六十年代，在研究有关战争，和平与革命理论的过程中，我已经注意到知识分子的历史角色，但是没有发表有关的文章，因为我自认

人微言轻，读者不会轻易认同我的观点。直到81年搜集足够的证据和资料以后，我才写成前述《知识分子论》，报馆编辑以第一时间把它刊载了。

我要强调的是《知识分子论》的基本观点并不是我的一家之言，而是在许多权威性论说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譬如知识分子的定义便是从美国《时代》周刊翻译过来的。根据我的考查，这个定义受到当代世界各国知识界的普遍接受。

拙文发表后，有人怪我把界定知识分子的条件定得太高，造成华社的知识分子太少。也有人讥笑我只会引述别人的话，他们不明白我引用那么多话的用意是要证明我的看法具有客观性和代表性，文化界长久以来存在着不健康的征象，有些假权威拿不出研究成果，却千方百计去贬低和抹杀别人的心血结晶。80年代我与朋友合作编写一部四十多万字的《马来西亚华人史》，就有同样的遭遇，说来令人心寒。

拙文发表后，我继续阅读谈论知识分子的文章和书刊，发觉它们的观点和我的没有显著的分歧。读者不信，可以参阅近年余英时，龚鹏程，许纪霖等台海两岸学者的有关论文和专著。最近问世的权威性著作是艾德华·萨依德的《知识分子论》，它印证了17年前我撰写的《知识分子论》并非出自个人的随想，它的基本论点今天看来仍然稳当。

看官千万不要误会，我无意以知识分子自居，只是把研究知识分子的一点心得呈献在大家面前，抛砖引玉。

附录：赫曼·赫塞论知识分子

“我们了解他身上有一股强烈的冲动，同时要成为圣徒和浪子；但也许是因为某种软弱或迟钝，使他无法投入那毫无阻碍，无垠无涯的天地。布尔乔亚的星座用魔咒困住了他。这就成了他在宇宙间的地位和他的束缚。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及艺术家都属于这种典型，只有其中最坚强的人才能冲破中产阶级地球的气层，进入那广阔的宇宙。”（录自赫曼·赫塞：《荒野之狼》）

陈忠登教授新著

《俯首甘为孺子牛/生命意义的探索》

每册：RM 8.00

生命是什么？生命有什么意义？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它？

陈忠登教授在书中，向你诉说他的答案。娓娓动听的言语，是“生命意义一个相当完整的诠释”，也是一种亲切的启示。

欢迎邮购请联络：

华社研究中心（华研） (271806-T)
HUAZI RESOURCE & RESEARCH CENTRE BHD.
No.1, Jalan Maharajalela, 50150 Kuala Lumpur, Malaysia.
Tel:03-2734035 Fax:603-2734037
E-mail: huayan@huayan.net.my

附录

知识分子论

骆静山

> **知识分子是时代的眼睛，这双眼睛已经快要失明了，我们要使这双眼睛光亮起来，照着大家走路。**
>
> 殷海光

谁是知识分子?

现代教育的大众化，系统化和专门化，允许智力平凡的人吸取学术上重要的结论，完成高等教育，而成为科学家、医生、律师、教师和工程师等。然而拥有学术资格和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并不一定是知识分子；真正的知识分子并不把学术完全当作一种啖饭的工具，他们是唯一觉得随俗浮沉的生活太过无聊的人。

德贝吾说："所谓知识分子，是借独立思考参与国家大事、指导事务、做礼拜、观剧、参加音乐会、谈论科学和读书的人。"[1]他所指的是欧洲传统的知识分子。

时代周刊曾经举出下列两个条件来界定知识分子：

第一：一个知识分子不只是一个有知识的人，他必须有独立思考和创新的能力，并且为追求观念而追求观念。

第二：知识分子必须是他所处的社会的批判者，也是既成价值的反对者。

根据时代周刊的看法，学有专长的博士和大学教授，早已不能自动成为知识分子；至于专业人士，除了一些例外，更从来就不被当作知识分子。[2]

矫挽末流，抨击现状，这是苏格拉底式的任务。古往今来，几乎所有称得上知识分子的作家和诗人都不满他们周围所见的世界。譬如屈原、曹雪芹、托尔斯泰和哥德，假如他们不揭露世间的不平和人性的堕落，他们就不会写出不朽的作品。伟大的文学家如此，伟大的学者和思想家更是竞相针砭他们自己所处的社会。如果孙中山、甘地、爱默逊、梭罗和尼采这一般人不是有所反对，他们便不成其为政治和伦理学者了。

华裔社会的弱点

并非任何社会都能产生伟大的知识分子。古希腊的自由城邦，欧洲中世纪宁静的僧院，以及中国古代的独立书院，都是知识分子的温床。今天大马华裔社会的经济结构和教育系统对学术发展都是非常不利的，因此，尽管教育发达，这一个社会始终不能产生一个真正的知识阶层，这似乎是它最大的弱点。

在中国的大地上，每一个时代都有产生伟大的知识分子。这些名列四民之首的知识分子多出民间，而不出自历代的官学；例如明末的顾炎武，黄梨洲，王船山和颜习斋等所谓："岩穴之士"，都没有被现实政治糟蹋过，也没有被功名利禄腐蚀过，所以思想上最为坚卓。

科举制度和现代文凭主义的教育，都汩没了年轻人的性灵，所以很少产生有感受性的知识分子。哲学家斯宾塞

---

[1] J.G. De Beus: 《The Future Of The West》.

[2] "The Flourishing Intellectuals" (Time, May 21, 1965).

(Herbert Spencer)只受过三年学校教育，却是他们那一时代思想界的重镇。陈独秀、梁漱溟和钱穆等人，都没有考取大学学位，但是他们都是现代中国光芒万丈的知识分子。

那神秘的无政府主义者巴达耶夫给“俄罗斯知识阶层”下了这样的一个定义：

“知识阶级是一个理想主义的阶级，属于这阶级的人，全部受观念的影响，并准备为他们的观念而面对牢狱、苦工及死亡。”[3]

作为理想主义者，知识分子所追求的是灵魂而非财富，创作而非交易，结果他们在这个庸俗的世界上，往往寻不到欢乐。

知识分子的本质

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注重气节，能舍生取义，他们讲求风骨，不趋炎附势。进则建树功名，致君泽民；退则遁迹山林，栖心玄寂。

不满现实是知识分子性格上的一个特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陈独秀可以说是一个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胡适说他是一个“终身反对派”。他发觉孔教违背时代精神，便反对孔教，发觉第三国际不民主，便反对第三国际。在新文化运动中建立了丰功伟绩的他，最后居然成为一个没有团体，也没有朋友的人。他的一生可以说是一个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悲剧。

典型的知识分子都具有“民胞物与”的情操。俄罗斯知识阶级之父，生活在18世纪的拉吉希柴夫(Radishchev)说道：“我的灵魂因人类的痛苦而受了伤害。”他强调自由，公道与真理对人类生活的重要。他的著作一出版，他便被逮捕。最后服毒自杀，成为俄国为人民争自由而牺牲的第一个作家。

毫无例外的，知识分子的感受性都特别强烈。他们对社会正义和社会责任，都具有炙人的热忱。爱恩斯坦(Albert Einstein)说：“对我个人来说，在人类生活的壮观行列中，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并不是政治体系，而是有创造力，有感受性的个体和人格。当一般群众的思想陷于呆滞，感情陷于麻木的时候，这种独立特行的人却能够创造出崇高与卓绝的东西。”他慨叹这一代的人缺少上一代那种为了争取自由而甘愿忍受痛苦的意志和伟大的牺牲精神。[4]

那经常在指引知识分子向前迈进，并且使他们充满爱心的理想是什么呢？爱恩斯坦说：那是真、善、美。他说：“以追求舒服与快乐为目标的生活，从未吸引过我。……我觉得占有，外表的成功，出风头、奢侈的生活都是无聊的东西。我深信一种纯朴和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对每一个人都是最好的。”[5]

明代的吕坤把一切人物分成三级，第一级是深沉厚重，其次是磊落刚勇，再后是聪明才辩。伟大的知识分子必定属于第一级。知识分子怎么会养成深沉厚重的性格呢？现代圣人许怀则说：“当人类觉察到自己的生命是附属于世事演变的过程以后，便从塑造其存在形貌的机运里赢取内在的自由。所谓内在的自由是指个人有力量面对其命运中的每一件艰苦遭遇，从这些逆境中磨练自己，使自己成为更深刻、更内向的人。这些艰苦净化了他，使他变得冷静而平和。”[6]具有这种性格的人，一定不趋风气、不趁时局，诽之不忧，誉之不喜。他们从来没有把他们平静的心灵置放在这些变动不居的基础上面。

知识分子的任务

在市侩的眼光中，不计个人的荣枯，而试行追求真理的人，都是多余的书呆子。工于谋己的人，坐享文明的生活，却蔑视作为文明底保姆的知识分子。汤恩比说：“知识阶级为它自己的人民厌恨和轻视，因为它的存在，对于他们是谴责。”[7]诚然，知识分子代表一个社会的良知，他们憎恨庸俗、妒恶如仇，惯常地抨击他们同胞的种种劣根性和丑态。

---

[3] Nicolas Alexandrovich Berdyaev: "The Russian Idea".

[4] 林衡哲译：《20世纪智慧人物的信念》。

[5] 同注4。

[6] Albert Schweitzer: "Out Of My Life And Thought".

[7] A.J. Toynbee: "A Study of History C. 18".

不拘孜孜为利的市井小人，或者贪得无厌的大人先生都不喜欢他们；任何偏邪的势力，对他们更是怒目相视。想一想假如孔子是一个随波逐流的人，以他贵族的背景和丰富的学识，不难得到高官厚爵，享尽人间的富贵荣华。可是他偏偏要高唱“春秋大义”，辨明君子和小人，引起乱臣贼子的惧怕和反感，怪不得他到处被人排斥，落得像一只丧家之犬。

培根说：“若无穷的学子扶植人类的文明，维系人类的尊荣，则王公大人们的安乐奢侈，早已使人类复返草昧，退归野蛮了。”[8] 这位历史上有名的大学问家讲出了知识分子常常被忽视或者被低估的功能。

作为文化的监护人，知识分子并不一定是任何文化部门的专家；他们是一些渊博多闻，高瞻远瞩的通儒，常常以审美的与道德的理想来做衡量一切的标准。只有像他们这样周览文化全貌，以天下为己任的人，才能给学术提供领导，为时代思想指示方向。他们能够辨认社会的根本问题，并试图寻求答案。一个社会的重要事务，如果缺少知识分子的积极参与，这个社会对它的重大问题，便会失去一定程度的知觉和洞察力。

罗素(Bertrand Russell)说：“如果说知识分子在社会上有任何作用的话，那便是面对着大家都诉诸情绪时，他依然能够保持一种冷静而不偏不倚的判断。”真正的知识分子必定能够凭着他的良知和远见，针对国家社会的问题，提出明确的观点和主张，他不会迎合流俗，人云亦云。

凡夫俗子只能看到自己，汲汲于功名利禄，他们所想和所做的，无不以个人的利益为依归。只有真正的知识分子才能舍离个人的欲念，超越时空的限制，明辨是非，讲求正义，追求天下一家的理想。一个社会的灵魂就是由这种知识分子铸成的。试看希腊社会处死了苏格拉底以后，它便丧失了它的灵魂，结果逃不了覆亡的厄运。

今天华人的知识分子是从古代的士大夫递嬗演化而来的。古代那些好勇斗狠的军人，或者放辟邪侈的流氓，虽则可以从马上得天下，却无法从马上治天下。他们篡夺政权以后，自然需要知识分子来为他们的王朝制定典章，管理百姓；所以历代都有为士人而设的晋身阶梯。“三代以上出于学，战国至秦出于客，汉以后出于郡县吏，魏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隋唐至清出于科举。”[9]

攀登了社会阶梯以后，士人形成一个“辅治阶级”。庸碌之辈，只是成为统治者的工具，而优秀的士人，多能根据圣经贤传所教导的，竭力促使统治者施行仁政，把道德的精神灌输到整个帝国的体系里。他们学而优则仕，显达时不忘大同世界的理想。宋朝名相范仲淹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表露出传统知识分子的伟大襟怀。跟他同时代的，那个出入佛老，终归儒家的张载教导后学时，总期望他们“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的话里充满了一种历史的使命感。

中国传统教育的主旨是在成就道德，而不在成就知识。一般来说，道德、学问和文章被认为是一个读书人的最高价值所在；因此饱读诗书，风骨嶙嶙的知识分子常常能凭借不畏强暴，耿耿忠贞的气节，而树立一个道义的权威，去缓和统治者的暴戾之气，使百姓少受暴政之苦。

华裔知识分子进退失据

今天大马华裔社会偶尔产生的知识分子之中，那些受过五千年文化薰陶的，在气质上和思想上，多少总带着过去士大夫阶级的烙印。但是现在生活条件已经改变了，他们面对一个崭新的环境，既很难出仕，又无法归耕，更缺乏独立自主的学府给他们庇护、容忍和理解。他们一方面遭遇一个文化认同的危机，另一方面又要面对一个畸形的低级趣味的社会。在这个进退失据的时候，他们那里还会负起文化的包袱。

中国历史上的知识分子，除非偶尔得到政治上的机遇，

---

[8] 培根：(Francis Bacon):《学问的进步》。

[9] 引自《东坡志林战国任侠论》。

否则在当时所扮演的角色，都是非常可悲的。历代能够得君行道的士人，屈指可数，而被污辱、被折磨、被放逐和被杀戮的，却史不绝书。

史宾格勒认为一切政治都是反道德的，那些讲正义与真理的人，往往被唯力是视的人击败。他说："世界历史就是世界法庭，老是爱好强者，力量充足者和能够自保者。世界法庭常常牺牲真理和正义，以迁就势力和种族，并且对于那些视真理比需要更重要，视正义较权力可贵的人，施以死的刑罚。"[10] 自 18 世纪的启蒙运动以来，富有创造力的知识分子都背叛了这种冷酷的历史和文明，他们渴望改造这个世界，并深信这个世界是可以改造的。虽然到了 19 世纪，思想界产生一股复古主义的逆流，但是无论是向左转或者向右转，大家对现状的不满，却是毫无二致的。

在专制的政体下，当危疑震撼之秋，知识分子很少有机会以集体的行动去挽救国家的命运和自己的命运。东汉的大学生，唐末的清流和明代的东林复社等等，都在结党的罪名下，惨遭杀戮。

所谓历史精神就是殉道者的血和泪化成的。首阳山上饿死的伯夷和叔齐，葬身鱼腹的屈原，以及从容就义的文天祥等等数不完的自我牺牲的人物，在人类的贪婪、自私和残暴所造成的黑暗中，闪耀着一丝丝人性底光芒；没有了他们，中华文化就会失去它的风格。

知识分子不断遭受周期性的幻灭，他们的梦想常常为两种现世底力量所粹碎，那就是上面的横暴的统治者和下面的蒙昧的群众。因此在现实世界中，他们往往一筹莫展；他们生活于未来，有时生活于过去，过着蹇蹙淡漠的岁月。

希腊的哲人比较幸运，他们生长在具有自由主义精神的繁荣的城邦，产业的收益或国家的津贴使他们衣食无忧，可以利用闲暇来追求知识。他们虽然热心政治，却并不以升官发财为鹄的，所以能够树立以社会立场，而不是以统治者的立场去谈论政治的优良传统。

中国战国时代出现的"游士"和"养士"，因为土里无根，所以朝秦暮楚，把学术理论当作逢迎主子的工具，因此对文化的贡献，远不及希腊的哲人。

知识分子，只有当他们在社会上具有立足点，有所不取的时候，才能保持对政治不偏不倚的观点。两千年来不习武事的知识阶级能够跟统治阶级相抗衡的凭借，根据钱穆的说法："魏晋南北朝以迄隋唐为门第，东汉两宋为士风，元明清三代皆汲宋儒遗脉，而所得深浅不同。"[11] 说穿了，门第也罢，士风也罢，还不是靠田园来作后盾。陶渊明如果没有"将芜"的"田园"，他难免要乖乖地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

知识分子受苦受难，只因他们是理想主义者，不能接受一个不公道和不完满的世界。他们坚信改造社会是他们神圣的任务，常常在黑暗的时代里，燃烧自己，照亮别人。例如伏尔泰(Jean Francois Marie Arouet Voltaire) 和卢骚 (Jean Jacques Rousseau)这两个大思想家为了主张天赋人权，批评当道，结果不是被囚，便是逃亡，一生坎坷。但是他们的思想力量却造成法国大革命，为人民带来新生。

历史的两种根本力量是维持现状和改变现状，知识分子往往是这种矛盾的历史环境的牺牲者。当现状太过不合理，不满的情绪日益高涨的时候，他们便以救世者的精神出来领导群众，进行改革。但是群众是有惰性的，他们不会长期牺牲现世的享受，跟随知识分子去追寻他们所不能理解的乌托邦。于是当改革的狂风暴雨过后，跟随在观念人物背后的行动人物便脱颖而出，夺取领导权，使动荡的社会安定下来，以适应疲劳的群众底需求。这时候，作为观念人物的知识分子便常常被淘汰了，于是社会又恢复到维持现状的局面，这是近代世界历史恒常的规律。

知识分子就是常常这样的陷入可怖的命运之网中。

（南洋商报，1985 年 8 月 23 日至 24 日）

---

[10] Oswald Spengler: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Ch.XIVIII".

[11] 钱穆：《国史大纲上册》。

附录

知识分子与文化认识

庞朴

不管怎样给知识分子下定义，知识分子总是和文化分不开；不管怎样给文化下定义，文化也总是和知识分子分开。如果说知识分子的性格在于以社会政治批评为职志，或以天下为己任；那么这首先是由于知识分子以“道”自任，即对“道”有著透彻的了解和掌握。如果说一切文化无不是人的创造物、一切人无不由文化所塑造；那么这里所说的“人”，首先便指向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和文化，文化和知识分子，虽不便说是同义语，但二者的关系，确实是难解难分的。

但是关系紧密是一回事，彼此是否真正认识，则是另一回事。中国知识分子拿文化做为对象物来研究，严格地说，是近代以还的事，是在一种异质文化强烈冲击的前提下进行的，其中经历了漫长的由浅入深、由现象到本质的过程；直至目前仍未完成。

追踪这个过程，回忆既往的艰辛，把握当今的使命，展望未来的前程，体味一下即使在对文化进行认识这样一个小小侧面上的“任重而道远”的情景，也定会激发出由衷的光和热来。

将文化作为文化现象来认识的时期

同西方人之由殖民地文化触发起文化研究的途径相反，中国人之认识“文化”，是由西方文化的传入引起的。明季万历年间，利玛窦等耶稣会士东来传教，西方文化也便随之而来了。两种文化乍遇，彼此都还生疏，一如他们称我们为“远东”，我们称他们为“泰西”那样，东西文化的距离，也很遥远，双方处在互相容忍的阶段。尔后，接触既多，异己之见生起，有所谓“礼仪之争”和康熙、雍正的禁教及乾隆的闭关，直至爆发鸦片战争，是为中西文化的冲突阶段。

冲突，尤其是战争形式的冲突，表现了两种文化的全面拒斥；但冲突和战争，也是文化交流的一种手段和形式。从战场上，以及通过战场，可以深刻地认识到对方文化的长处，紧迫地认识到自己文化的短处；其中许多是和平时期无法达到的。

所以不是偶然的，鸦片战争以后，士人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便不胫而走，风靡朝野上下，开始了一个以我为主去融贯西方文化的中西文化融合阶段。

融合外来文化是本土文化用以生存发展的重要手段。容忍——冲突——融合，则是两种异质文化接触过程的必经阶段。中西文化的融合，从鸦片战争以后便开始了，直至目前仍在进行融合的过程，也是一个认识彼我、乃至认识文化一般的过程，并以此为思想条件。而认识，总是难得一开始便捉住本质，不免从现象的认

识开始。

洋务运动，即以一八六一年一月清政府增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办理洋务为起始标志的自强运动，可以看成是中国人承认西洋人在物质技术方面较我为长而力图富国强兵的运动，亦即从文化的表层——物质层面去认识文化的时期。据统计，从一八二一年到一八六一年的四十年间，至少有六十六名人物赞成中国必须采办军舰和枪炮，来对付西方“以夷变夏”的侵人，其中包括道光皇帝、高级官吏和著名学者(《剑桥晚清史》下卷)。而一八六一年以后，这种认识不仅遍及士林官府，且更固定为国策，体现为行动了。

洋务搞了二十年，到一八八二年，清政府竟也拥有战舰五十艘，俨然船坚炮利矣！可是出乎世人之所料，这些舰队一败于远道而来的法国海军(一八八四年)，再败于数量和威力都不如我的日本海军（一八九四年)。“强胪灰飞烟灭”之后，人们强烈意识到，仅仅师夷之长技，还远不足以达制夷之目的。战争又一次发挥了它的文化威力。

就在甲午（一八九四年）这一年，孙中山先生上书李鸿章，指出富强之术与富强之本的区别，有云：“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我国家.....徒惟船坚炮利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上李鸿章书》）这个本末之辨或体用之辨，是洋务时期人们论争的焦点，实际上指的是文化的制度层面和物质层面的区别。“船坚炮利，垒固兵强”，只是西方文化的表面物质现象，以之挪来嫁接在中国社会政治制度的“体”上“本”上，搞一个“中体西用”(张之洞)、“由本治末”（王韬)，容或可以繁华于一时，最终难免蔫萎枯槁而死。“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无异宣告了洋务运动寿终于正寝。

一八九五年四、五月间清廷批准“马关条约”，激起了南海康有为领导的十八省举人“公车上书”大示威，喊出了“变法维新”的时代最强音。所谓变法维新，就是要在富强之“本”上下工夫，在政治等制度上弃旧图新，以保证实现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这样一个古老的大同理想和崭新的政治要求。这个口号的提出，反映出当时的知识分子已能透过文化结构的物质外层，看到了制度内层的权威作用。人们对文化的认识，至此又深人了一步。

维新变法从知识分子的口号和试验到成为政府中枢的决策，花了三年的时间，最后以一百天的生命而悲壮夭折。维新作为一场改良运动，是失败了；但变法作为文化前进的一个必经环节，却无法绕开。从一九零一到一九一一的十年间，变法工作事实上并未停步，从教育制度到军事制度、行政制度、财政制度，乃至立宪政体的准备，都在保证皇权无上的前提下，作了可能的改革。虽说这些改革在颇大程度上只是为了装潢门面，但它岂不正好说明，这个门面已是非装不可，继物质层面变化之后必经一个制度层面的变化，已为人们（包括顽固派）所普遍承认、所无法抗拒了么?

辛亥革命是对满清王朝的彻底否定，也是对维新以来种种变法的全线推进，更是孙中山先生追求“富强之本”宏图的凯歌奏鸣。辛亥革命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即变革文化之制度层面的根本制度——国体、政体的使命。辛亥革命成功了，中国政治由此进入了共和时代。

但是“革命尚未成功”，辛亥未能使旧文化的制度阴魂涣然散尽。袁世凯和张勋相继于革命后的第四年和第六年称帝、复辟的闹剧，说明推翻一种制度和建立一种制度，都还不能就制度本身便使之完成；在制度后面，还有一些更深层的东西有待解决。

那就是文化的心理层面

文化的心理层面包括人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趣味、道德情操、宗教情绪、民族性格等等，它是整个文化结构中最为稳定的部份，是各个文化的灵魂。如果要用本末来分解文化、说物质技术是末、制度理论是本的话，那么文化心理则是本中之本，是大本。

在近代中国，只是到了辛亥革命以后，当旧的政治制

度、社会制度推而不翻、新的取代的制度建而不立的时候，才普遍痛感到这个文化心理层面的严峻存在。五四运动的爆发，便是这一认识的标志。

陈独秀说，五四运动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其任务在于解决“伦理问题”即文化心理问题（《吾人最后之觉悟》）。“盖伦理问题不解决，则政治（按：指制度）学术（按：指技艺），皆枝叶问题。纵一时舍旧谋新，而根本思想未尝变更，不旋踵而仍复旧观者，此自然必然之争也。”（《宪法与孔教》）

胡适说：“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可叫做‘评判的态度’。”而所谓“评判的态度”，便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新思潮的唯一目的是什么呢？是再造文明。”（《新思潮的意义》）

他们所谓的“根本思想”，所谓的“评判的态度”，都是著眼于文化深层及其应有的变化，其要点在于价值观念的变化（重新估定一定价值），其目的在于改变人的文化心理状态（再造文明）即当时所谓的“改造国民性”。其他什么“制械练兵”，“立宪”、“共和”，统统不过枝叶问题而已。可以看得出，这里也有一个本末之辨。只是这个“本”已非当年洋务、维新时代的所谓“本”，那个“本”到此已贬值为“末”为“枝叶”；五四人物在对文化的认识上，比前人更深入了。

就这样，从洋务运动到戊戌、辛亥，再到五四运动，在同西方文化的直接较量和对比中，中国人一步一步地由对文化的物质外层的认识，进而至于制度中层的认识，最后达到心理深层的认识，完成了将文化作为一个构成物的全部认识过程；前后费时半个多世纪。这是一个集众人智慧乃至生命而终于完成了的空前伟业，也是历史赋予这两三代人的艰钜使命。今天我们能以从容地将文化整体分解为三层结构来谈论，正是受惠于他们的奉献。

将文化作为社会现象来认识的时期

但是文化并不是一个孤立自足之物，它首先是一种社会现象。文化由结成为社会的人所创造，它又创造著社会的人和人的社会。没有社会便无所谓文化，没有文化也不成其社会。文化的这种社会属性，是文化的本质属性。人们认识文化具有三层结构，虽说已非易事，但还只仅仅是将文化作为孤立自足之物进行认识而已，只能算作认识的第一步，只是弄清了文化的现象；要想达到对于文化有个本质的了解还必须捉住文化之如何作为社会现象，捉住它的社会属性。

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文化同组成社会的人群息息相关，同人群的社会变迁步趋相续；这些正是文化用以存在的空间和时间，正如一切存在物无不存在于空间时间中一样。由文化在一定空间存在即同一定社会的人群相关的必然中，产生了文化的民族性；由文化在一定时间存在即同一定的社会变迁相关的必然中，产生了文化的时代性。民族性和时代性，构成了文化的社会属性或本质属性。

在近年中国，开始将文化作为社会现象来认识，从而达到了对之有一定的本质了解的人，依然是五四人物。五四人物是一批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他们既完成了上一时代的将文化作为文化现象来认识的末段任务，又开创了下一时代的将文化作为社会现象来认识的起始事业。正是五四人物，明白而又坚定地提出了文化具有时代性的命题。

他们说，文化上的东西之争，实质乃古今之争；西洋文化是近世的文化，东方文化是中古的文化；二者只有时间上的迟速，而无性质上的差别。如此等等。

这是一种以社会进化论和社会发展论为基础的文化观。不同文化都是同一个人类社会的文化，因而没有性质上的差别；不同文化分属人类社会进化或发展的不同阶段，因而有时间上的迟速。这种论断，高扬了文化的时代属性，带有强烈的变革精神。五四人物正是基于这种东方文化落后于西洋文化一个时代的说法，用古代中国的国民性格对比近代西方国家的国民性格，用中世纪的盲从态度对比新时代的科学态度，用陈旧的专制的习惯对比新兴的民主的习惯，从而得出了彻底告别过去、再造青春中华的结论，在当时，以及在历

史上，都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到现在，仍然是我们应该为之奋斗的纲领。

只是作为社会现象的文化，不仅具有时代性，同时具有民族性。任何一时代任何一类型的文化，无不从属于一定的民族，是某一民族得以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文化标志。超民族的文化是不存在的，因为超空间的存在物是不可设想的。当然，民族的文化同时也是时代的文化，某种文化既是某个民族的，同时也是某个时代的；超时间的发展物同样是不可思议的。文化在时间上的存在和空间上的存在，时代性和民族性是不同的，却是互相依存的；是对立的，但不是互相排斥的。

五四人物的缺点之一，正在于将文化时代性与民族性当成是互相排斥的。他们用时代性去排斥民族性，以至于看不到文化有民族性，并不承认文化有民族性。他们轻信了欧洲文明论者的言论，无条件地以为："现代西洋的文明是世界的，不是一民族的"（常乃德：《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他们不懂得，现代西洋的文明中，固然有"世界的"即适用于其他民族的成份，或谓之人类性的部份，堪为其他民族所撷取；但这种人类性的部份并不裸露出来，它只寓于西洋文明的民族性之中，正如任何普遍性之寓于特殊性之中一样，因之不好说它"不是一民族的"；更不用说那些并不适于其他民族的纯西洋成份了。

与不相信西方文化有其民族属性相应，五四人物也一反洋务、戊戌、辛亥时代的民族主义情绪，否认中国文化有自己的民族性，或中国新文化应该有自己的民族性，直至提出"废除汉字"、"百事不如人"之类的全盘西化的绝对主张来，而使自己足跟离地。直至抗日战起，民族情绪高昂人云，方才有人承认文化"在形式上是民族的"（胡秋原：《中国文化复兴论》，1938年），扭扭捏捏地做了一点让步；而于文化在本质上具有民族性这一点，则给后人留下了有待论证的重大课题。

二次大战以后的世界发展现实，越来越强地提醒人们放弃文化一元说，承认文化多元说；放弃某些文化堪为世界文化的论点，承认一切文化具有民族性的事实。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这便意味著时代要求我们，在继续实现五四的根本精神的同时，还要有超越五四的勇气；在主张文化有时代性、高举科学与民主的时代大旗的同时，还要主张文化有民族性、探讨文化的民族性，将一切做得具有自己的特色：以此来完成将文化作为社会现象予以认识的历史过程，来确立中华民族在新的世纪中的光辉形象。

一位美国学者列文森教授说过，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苦恼在于，他们理智上是面向未来的，而情感上却留恋过去。如果从知识分子对文化的态度来看，不如说，他们理智上是向著文化的时代性，而情感上则向著文化的民族性。现在是到了将文化的民族性也提升到理智地了解的时候了，时代期待著我们这样做，民族也期待著我们这样做。

（录自《中国论坛》）

还予知识分子本色

张永新

知识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社会变革的催化剂，能够掌握和拥有社会发展与变革最新知识的人——知识分子，往往总是走在时代的前端，也往往备受世人重视，肩负着时代的重担。因此，自古以来，人们都在谈论着知识分子，对他们下了种种的定义，提出了种种的要求，作了种种的论述。

人们已经论述的就无须赘述。我对知识分子，特别是当前我国的知识分子提出几点要求。

（一）知识分子必须是有知识，而且懂得正确运用知识的人——掌握了很多、很先进的知识，为什么？是为了个人荣华富贵、名誉地位呢？还是为虎作伥、助纣为虐？或者是以天下为己任，为了社会健全发展，人民幸福？有了知识，却不懂正确应用知识的人，不是知识分子。

（二）知识分子必须是有勇气的人——一个有知识的人，如果在其内心充满了恐惧感、终日担心害怕、畏首畏尾，在黑暗的、邪恶的势力面前颤抖，然后用最美丽的词藻高歌“谨慎小心”、“明哲保身”、“识时务者为俊杰”，我们很难想象这些人可以被称为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必须是智者无惧的面对残酷的现实，说真话、做好事、揭露虚伪、反映真实、咀咒该咀咒的一切。

（三）知识分子必须敢于作自我批评——不要自以为是，以为知识创造了一切，而自己掌握了知识，就掌握了一切，忽视社会实践，不知知识正是从社会群众的实践而来。知识分子必须常先作自我检讨，自我批评和互相批评。必须常常作知识翻新，跟着时代的脉博跳动，和社会群众的社会实践相结合，不能老是唱着陈腔滥调——“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丈夫是别人的好”。

（四）知识分子必须建立知识权威——权威是重要的，问题是权威从何而来，权威是为了什么？对于腐朽、落后、压制新兴力量的传统权威，就必须建立反传统权威与之抗争，为的是新社会的发展，对于专制独裁，就必须建立人民民主权威与之抗争，为的是一切权利归人民，为的是社会平等、公正、民主、自由。

知识分子必须以知识建立起其知识权威。专业领域必须建立专业知识权威，如工程师，必须以其专业权威，自由自在地执行其任务，所有的发展商必须依据工程专业知识权威办事。不象如今在缺乏专业知识权威的情况下，许多工程师或工程顾问公司，往往受到一些无良的、有钱有势的资本家、发展商颐指气指。又如文化领域：文化工作者、文学写作者必须以其文化知识建立文化知识权威以对抗市侩主义和金钱万能说，以才势对抗财势，还文化，知识人的尊严。

（五）知识分子绝不孤独和寂寞，孤独和寂寞的人绝不应称为知识分子——社会财富，包括知识财富，从来就是集团创造的。知识分子从社会集体中来，和社会集体关系最为密切。知识分子群必须更紧密的结合起来，然后再和社会群众的实践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建立知识权威。“知识就是力量”，但只有集体的知识才是力量，只有知识的集体才能发挥更大的力量。

（六）知识分子必须直接或间接的参与社会实践——社会理论是社会实践的总结，它反映了社会实践，反过来又指导了新的社会实践，而新的社会实践又丰富和发展了社会理论，不断的反反复复，就促进了社会发展，建设了人类文明。虽然知识分子着重于理论建设，但由于理论和实践不能分割，因此知识分子必须直接或间接的参与社会实践。脱离社会实践的知识分子，其精神面貌，其理论内涵必然显得苍白无力。当然，参与的方式有多种，定义也有广狭意之分别。

有力感的知识分子

丘光耀

英国哲学家培根曾说："Knowledge is power"。

过去我们比较熟悉的翻译是"知识就是力量"，然而，经法国后现代主义大师米歇尔·傅柯（Michael Foucault）的"颠覆"后，我们也不排斥"知识就是权力"的诠释。

然而，若将上述两大命题颠倒过来思考，那么"力量就是知识"或者"权力就是知识"是否又能成立呢?

由此，我们可以结合现实情况，来对以下四对悖论作出检视：

掌握知识，但不掌握力量。
掌握知识，但不掌握权力。
掌握力量，但不掌握知识。
掌握权力，但不掌握知识。

目前大马华社的权力精英，他们都掌握知识吗？大马华社的知识分子，他们都身处在权力的核心吗？林吉祥、郭铢镇、黄家定、翁诗杰、刘磐石、许光道、李万千、柯嘉逊、曾庆豹、祝家华、黄锦树、陈雪风、林水檬、罗正文、张景云、黄永安、黄文界、谢爱萍、郑云城、张永新、张碧芳、郭素沁、安焕然、庄迪澎、蔡添强等等，他们应该如何被归类?

他们是书生、读书人、文人、知识工人，还是知识分子？我们对这些概念似乎从未进行过严谨的区分。到底知识分子应该如何被准确定义？有否特定的"硬指标"和"软指标"?

由于知识分子规范化定义的"空场"，导致我们习惯把拥有"高学历"的"专业人士"、"政坛权贵"、"华社精英"统统都接纳为知识分子；同时又赋予他们"中立"、"客观"、"理性"、"超然"等"光环"；更甚的是，再从古今中外的遗训、格言和典故那儿借来一些如"时代的眼睛"、"社会的良知"、"独立的思考"、以及"置疑的勇气"等等"泛标准"来套给上述所谓的"知识分子"身上。然而，我们从来不曾认真去检验那些被套上"光环"和"泛标准"的对象有否具备"知识分子"的真正条件，因为我们的社会缺乏检验这些"泛标准"的"真标准"。

严格区分"知识分子"定义

以我的看法，为了早日终结"泛标准"的

被滥用，知识分子的定义应该严格被区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

广义的定义，即所有创造、传播、应用文化/知识（包括艺术、科学和宗教）的人都是知识分子。在这个范畴底下，知识分子可以分作三大类：（一）文化/知识的创造者，如学者、艺术家、哲学家、宗教家、科学家及作家等；（二）文化/知识的传播者，如教师、新闻从业员、社会工作者、政治工作者等；（三）文化/知识的应用者，如律师、医生、工程师、会计师和各类技术人员。

今天，随着教育和资讯的普及，他们的共同特征是多半有大学学历，对文字语言的驾驭能力甚强，社会阶级属中产阶级，因此是白领的非体力劳动者。

至于狭义的定义，我把它理解为「有力感的知识分子」。因此他应该是这么一种方程式的总构成：

对公共事务的关心 + 独立思考 + 明确的世界观 + 批判现实的勇气 + 改造世界（实践）的能力 = 有力感的知识分子。

“有力感的知识分子”是相对于现实中“无力感”/“不需要力感”/“害怕力感”的广义知识分子的状况而提出的理想，这并非乌托邦式的空想，而是可以被实践的、活生生的、现实的、感性的一种新型社会所需要的知识分子。

当我们在下一世纪迈进资讯社会时，人人都是广义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针对属于传播和应用知识的那一个层次而言。所以，“知识工人”很可能将取代“知识分子”而成为“后网际网络”时代的社会主体，不掌握知识的人几乎将不能生存，但这并非意味着资讯社会里的“知识工人”人人都是“知识分子”。

鉴于此情，在新世纪里能符合知识分子定义的人们，必定是属于狭义的定义者，不论他们在广义的定义中是归类于哪一个层次（文化的创造/传播/应用）。

举例来说，一名即使懂得利用资讯工艺来进行“远距治疗”（Telemedicine）的医生，若他不具备判断应否支持“人工流产”抑或反对“安乐死”的社会人文素养的话，那么他不能被称为知识分子。又或者一名通晓“数码法律”（Cyber law）的律师，若他不敢对当局进行“选择性提控”或行政权干预司法权的举措表示反对立场的话，则他亦不能被称为知识分子。有关检视能不断被扩大下去，如一名报章老总对新闻自由、市场需求和报馆应否预设政治立场的理解；一名科学家或科技人员对“克隆人”及“核武器扩散”的立场；一名经济学家对透过管制货币、动用公积金来挽救朋党资本主义的作法的态度；一国的领导人对同性恋、人权、环境保护的见解等等，都能突显出对“知识分子”的严格定义是何其的重要，以免“知识分子”的称谓被那些利用专业知识来为不合理的既定现实作辩护的读书人所滥用。

力感的自戕

依我这几年来的观察和判断，我认为大马华社知识分子存在着若干的弊端，导致他们难以挣脱“无力感”、“自哀自怜”、“内在流亡”的悲凉怪圈。所以，知识分子必须要克服内在的种种虚妄特性，特别是以下这些“硬伤”导致知识分子“力感”的自戕和消解。

（一）学术自满——许多在七、八十年代曾从国外引入民主人权概念/理论的留学生，他们在抗衡巫统的单元种族霸权方面，确实有一定的启蒙作用，因为西方资产阶级的法权（社会契约论、三权分立论）相对于巫统的封建威权统治，肯定是更为进步的。但是巫统自90年代开始调整若干的“建国政策”后，以“亚洲价值观”来反击以自由主义为首的“西方民主论”时，那些迄今依然抬出洛克、卢梭、孟得斯鸠来弘扬民主人权的作法，则显得有点落伍。试问“社会契约论”如何回应“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或“亚洲价值观”？西方自由主义经过两百多年来的演变和发展，其内涵业已产生相当大的变动，大马华社知识界对国外学界和政治界针对自由主义所展开的论述是相当陌生的，而巫统的策略家在跟进有关方面的讨论却是很尚时（up date），所以他们在作出反击和辩解时也能够自圆其说。我这么指出并非表

示“社会契约论”或“三权分立论”对本土的民主化建设不重要，而是希望大马华社知识分子要摒弃“学术自满”的习气，不要总是“吃老本”，反之要时时跟进世界最新的学术动态和发展，以免掌握的旧理论僵化或滞后，因为我们要对付的国家机器，其背后的“文化霸权”是不断自我更新和发展的。

（二）学术炒卖——相对于“学术自满”的弊端，此类好玩弄各家各派学术词汇的几乎都是年前的一辈。他们确实不断读书，力求吸收新的理论，惟功底不足，学术方向感不清，导致对某一特定学术词汇的内涵掌握不足，但却拜倒于这些新颖的词汇当中。我可以从近年来许许多多大小块的文章中，罗列出一堆青年朋友所喜好引用的词汇：异化、结构、解构、重构、张力、基进、释义、霸权、吊诡、悖论、典范、颠覆、扬弃、终极关怀、宰制、疏离、物化、边缘、边陲 - 中心、去 / 解政治化、合法性、合理性、流亡、总体性、此在、他者、领导权、后现代、场、自为、论述、主体性、批判、多元、黑箱、再生产、压抑、文本、再现、升华、现代性、话语、实践等等。事实上，许多源自西方当代哲学的词汇，在国外学界里的使用是极端严格划分的，比如属于新左派的术语，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是不会使用的，再来如人本主义（非理性主义）阵营的字眼，科学主义者是不会使用的。然而，这些学术词汇一旦“输入”到大马，华社青年知识分子遂不加鉴别地统统加以使（滥）用，看起来仿佛很“多元”，实际上却突显我们的无知和肤浅。

（三）世界观伪中立——大马华社知识分子为了显示自身的“客观”、“超然”和“中立”，因此对任何特定的世界观 / 主义一概拒绝，把意识形态理解为“标签”，并等同于“教条”。他们对 Socialism 的“ism”严加抗拒，但却拥抱 Neo-confucianism 的“ism”；当他们在引用海耶克的论断来攻击社会主义时，却忘了海耶克是新自由主义的大师，同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作主导。我尤其不能容忍的是，那些早期流台时不曾接触过马克思学说的华青团领袖，经常犯上“批评马克思的人多半读不懂马克思”（[波兰] 阿当·沙夫语）的征候群；他们爱说“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但不懂这是新保守主义的说词；然而他们在另一些场合又反对新自由主义所推进的“全球化”，似乎表现得很激进前卫，事实上他们什么都不是，只是滑头的“伪中立主义者”。在华总的《文化总纲领》以及随后出炉的《马华知识界文化宣言》一案中，大家应能充分认识到有关现象。

（四）清高梦呓症——华社知识分子把理论和实践割裂开来，甚至有人倡议什么“学术型的知识分子”云云。这种蓄意要脱俗、远离社会、告别权力的作法，只表现出他们眷恋中国古代那些不得志的读书人，过着所谓隐居山林、淡泊逍遥、不问世事的生活，他们没有能力和勇气改变现实，却又不愿承认自己的消极避世。一句话，他们以学术象牙塔中的梦呓来合理化自己的“不事生产”和“无需实践”。就算他们私下勤于思考、反省，亦丧失了作为知识分子的社会身份。没有社会关联的智力活动好比只会烹调给自己吃的人不算厨司，只会给自己看病的人也称不上是医生一样。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清高症”的病患者也有“道德自大狂”的突发症，他们经常会有“走出象牙塔”的冲动，企图以一篇惊世之作来拯救全天下，或靠一篇声明来推翻整个政权。然而，问题的本质依然是：脱离实践。

（五）功利主义——我想传统“士大夫”向往代圣贤立言；或为政权制造合法性的封建残余依旧在许多读书人的血液里翻腾。独裁政权需要道德教化，而非民主意识，因此它要收编读书人，把读书人纳入官僚幕府之中，为其政权的长治久安出谋献策，高级者称谓“智囊”，低级者则是文棍、“抢手”。这种类型的知识分子业已成为国家机器或垄断资本的一部分，他们再也不是自由的社会职业和独立的知识阶层。由此，他的社会身份必定要依附权贵才能彰显，他的知识 / 言论必定要有“特权”的庇护才会引起瞩目。一旦依附的对象被推翻，这些知识分子的人格、地位和利益即刻消散。功利型的知识分子，不仅盘踞于政治圈，甚至在华团、传媒界及教育界都普遍存有。

知识分子的“力感”正是受到以上的自满、

无知和肤浅、滑头、脱离实践以及对权贵的依附而被抵销。

国家机器 VS 文化领导权

“烈火莫熄”的口号最近响彻云天，各族人民求真、求变的意愿澎湃汹涌。国家机器为镇压改革力量而全面总动员，社会的习惯和保守势力也相应地作出反扑。我们华社知识分子应否沦为观望阶级（Looking class）抑或秉承我们的社会良知以及对美好社会追求的本质，而挺身出来引导这场全民的改革运动。

对正义、平等、自由、民主和人权等价值的追求，导致知识分子理应先天性成为反动政权和国家机器的宿敌，这是我们的动力。然而，我们的战场在哪里？我们的武器是什么？我们的战略是如何？

我认为，知识分子应该全力抵抗在社会各个领域中经已被国家机器对不合理的现实所垄断的诠释权，我们的战场就是在我们现有工作的各个领域——如记者和编辑先生的战场在传媒界，律师的战场在司法界，教师的战场在课室，艺术工作者的战场在舞台和国家机器争夺诠释权，为何安华的支持者被传媒抹黑为“滋事者”；为何和平情愿的群众是暴徒；为何安华“鼓动性”的演讲被描述为“煽动性”；为何教师不能“教育”学生反对政府；为何中秋节不能和“烈火莫熄”想挂钩；为何我们要容忍“内安法令”肆意践踏人权；为何“513 事件”和“印尼暴动”会成为我们的梦魇，对这些问题的合理诠释权应该掌握在知识分子手上。我们本因掌握知识而获得力量，但为何在对抗掌握诠释权的国家机器时我们会显得如此“无力感”？问题出在哪里？我们应该怎么办？

“实践”（praxis）是我们的出路！将我们的理论和实践相勾联就能产生出“力量”。这股力量不是即刻释放出来就能推翻国家机器；也不是一彰显出来就能令某某人下台。知识分子对颠覆不合理诠释权的战役是持久性的、争夺诠释权不是靠发表文告 / 文章 / 宣言就了事，而是要在每一个战役中投入大量的精力来反复地、耐心地宣传、说理和教育。“实践”中的每一个具体环节都要体现出民主精神、集体领导、理性论证、相互信任和妥善分工。“实践”不是敢不敢上街的问题，“实践”是透过如何上街或不上街或其他管道而又能达到比上街产生还要更大效应的问题。比如“上网”、设立网站或者转播 " 网上 " 的另类消息。

我们不掌握国家机器，但我们应该有能力掌握“文化领导权”——这是我们的武器——并和当局的“文化霸权”相抗衡。例如“内安法令”的行使权不在我们的手上，但对行使“内安法令”的诠释权不应该单方面由警方垄断。知识分子要懂得将晦涩的学理，透过生动活泼的方式，广泛地向人们作出另类的诠释，并在诠释的过程中，赋予人们“有力感”(Empowerment)，让人们感受到、认知到国家需要进行改革的必要性。所以按安东尼·葛兰西（Gramsci）[意] 的理解，知识分子应该是那些了解历史运动的人，“历史并不是由‘独立于群众的知识分子的杰出人物’所创造的，而是由‘自觉地意识到与民族大众之间存在着的有机联系的知识分子们’所创造的”。

按狭义的知识分子定义而言，美术家、舞蹈家、书法家、漫画家、歌唱家都有“实践”的能力，整个改革运动需要的是各个领域的人才，我们迄今还未看到“反 ISA”T- 恤的印制；另类漫画比赛和巡回展览尚未举办；「反暴政」的狂欢舞会在私人住宅随时可举行、现代舞台剧和重金属的演唱会（讽刺时政）或许要申办也不难。这就是知识分子的战略——“阵地战”(The position warfare)，我们没有能力和国家机器打“运动战”，既然无法力敌，就要晓得智取。我倡议要“精明抗争”（Smart Struggle）及“迂回出击”的道理就在这里。

换言之，知识分子除了要“敢于”反对国家机器的宰制；也要“懂得”如何教育人们摆脱国家机器的桎梏，前者需要的是勇气；后者需要的是智慧，即从日常生活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勇气和智慧。

学术理论的研究和考析是我们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的指南，实践理论的勇气和智慧是确

保我们每一个战役取得成功的关键。我们的力量来自理论和实践的相互配合，缺一不可。知识分子的“无力感”要么肇因于理论的匮乏，在实践上盲冲蛮干，结果招致更大的打压；要么缺乏实践的勇气和智慧，沦为梦呓一族。

最后，我要提出检验知识分子“理论＋实践”的标准，姑且称之为“三大有利于”，即我们的活动是否：

有利于拓宽公民的自由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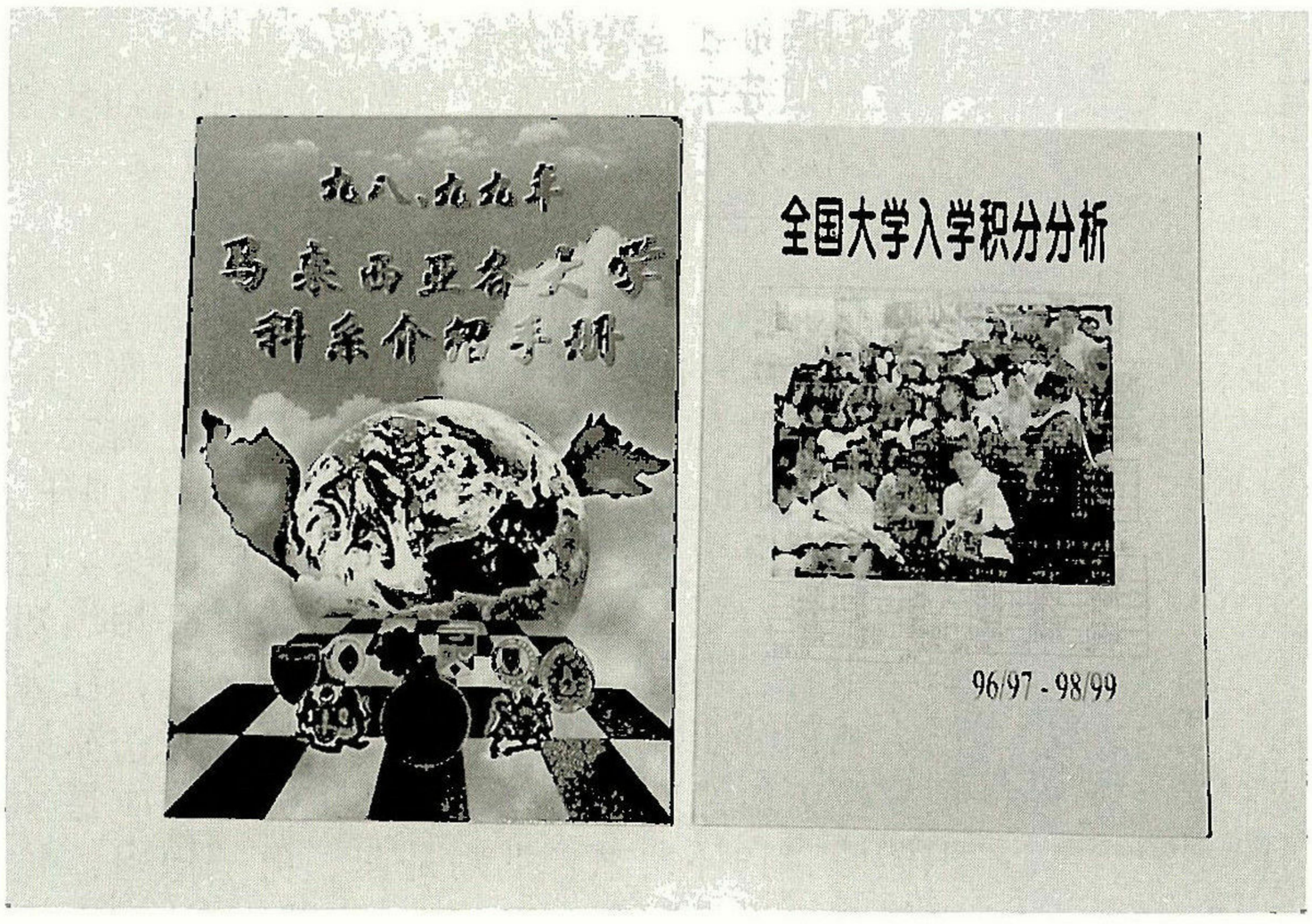
有利于经济资源的合理分配；

有利于公民社会的缔建。

“有力感”的知识分子会从不断的检验过程中再学习、再实践、再改造（包括改造自己）。“无力感”的不应该是我们，回赠给敌人吧！

告别“无力感”，创造新明天！

（作者为历史学硕士，行动党社青团全国政治教育局主任）



迈向大专院校指南

- 96/97 - 98/99《全国大学入学积分分析》RM9.00
- 《马来西亚各大学科系介绍手册》RM13.00

出版了！

欢迎购阅参考
作出最佳选择

合购两册特价优待 RM20.00

邮购请另付邮资 RM 2.00

订购处：

华社研究中心 (271806-T)

Huazi Resource & Research Centre Bhd.

No. 1, Jalan Maharajalela, 50150 Kuala Lumpur, Malaysia.

Tel:03-2734035 Fax:603-2734037

知识分子的悲情与悲剧

当今马来西亚知识分子的挑战及其角色的探讨

唐彭

翻开数千年来的人类历史，固然充满了帝王将相威尽一时的纪录，但是，知识分子在重重压力下所展现的智慧火花，却更是光芒万丈的照耀古今，成为每一个时代强权下不屈的英灵，塑造了人类的文明，矗立了丰朗的典范，而令人景仰。

到如今，教育普及，资讯发达，封建传统的专制时代已远，自由平等的民主时代到来，按理，社会的日趋合理化，必然减少了社会的矛盾，那也就减少了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的悲壮使命。但是，人的社会竟是如此多纷扰，社会的问题依旧层出不穷，新时代仍然呼唤知识分子仗义现身，冀望知识分子出来力挽狂澜，使灾难消溶、社会清明。

于是，每当国家风雷激荡、政经巨变的时候，就是谈论知识分子的角色的时候。

难道知识分子是一个不祥的名词?
到底谁才是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何德何能，担当得起如此的重托?
知识分子的角色是什么?
知识分子的挑战又是什么?

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称为“士”、“儒”。“士”是指研究学问的人，也是官名。“儒”除了是学者之称外，也是孔子之道和研究儒家学术之意。由此可见古代知识分子“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和以儒家学说为知识主流的事实。近代的知识分子，本意为任何阶级之具有相当知识学术者。但是，由于历代忧患的洗礼，社会已为知识分子风蚀出一具精瞿的岩雕，苍凉地顶立在天地之间。那伟岸的知识分子，应是知识渊博、胸怀大志、批判是非、勇于担当，并以修齐治平为职志，以建立国泰民安的太平盛世为己任的读书人。可见知识分子早已从泛泛的读书人中脱离而出。一个知识分子的担当，决不是一个死读书的读书人所可比拟的。

但是，在今天这个教育普及、知识爆炸的年代，社会不再封闭，教育不被垄断，高等文凭学位人人可得，人人都可成为专科专业的知识分子，那么，知识分子又应扮演什么角色呢?

历史上的知识分子，生在封建专制的时代，钻研的多是综合式的人文知识，在庞大的官僚政治体制下，科举考试、加官进爵、忠君报国、以利天下，便是他们毕生的理想，这是一种广义的“立功”。

一个胸怀大志的知识分子，若不被当权所赏识，只好退而著书立说，传诸后世，这是一

种保守的“立言”。

若不甘平谈，则可开馆纳徒，授业解惑，作育英才，这是一种积极的“立德”。

“立功”、“立言”、“立德”，即为古代知识分子的“三不朽”。

历史便因这许多知识分子不屈的脊梁，写下不朽的风骨。屈原、伍子胥、司马迁、范仲淹等，都成为千古知识分子的典范。而戊戌政变、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则因近代知识分子的慷慨义行，而改写了历史。

历史上的知识分子，以扮演悲剧英雄的角色而留名舌古。他们每于封建的乱世，以“铁肩担道义、辣手写文章”的苦行僧形象，打造光辉的历史。

现代读书人，生活在一个教育普及、知识分类、职业分工、行行有发展的工商社会，不像旧时代，做官是读书人唯一的出路那么狭窄，使读书人与知识分子变得更有距离，由于社会形态的复杂，国家也不可能由少数的知识分子全权掌控。现代的知识分子，已转型为专业人士和中产阶级的结合体，各人分处在四面八方各行业的各个岗位，只要人人站稳立场克尽本分，做一个尽忠职守的专业人士，也就尽了一个读书人的义务，汇成社会的文明进步。换句话说，一个健康的社会，需要医生、律师、工程师、政治家、企业家、小商人、教师、警察、工人，都谨守各自的专业道德，社会自然清明而安乐。最怕医生没有医德、律师背叛正义、工程师偷工减料、政治家贪污滥权、企业家失信逃税、小商人招摇诈骗、教师误人子弟、警察包庇罪恶、工人怠工懒散，那么，专业道德荡然无存，国家必然腐败暴乱、民不聊生。

所以，虽然现代中产阶级的专业人士，是社会结构的主干，但失序的社会，在思想上仍然需要启迪和引领。当然，在现代这样一个满街都是读书人的时代，仍需知识分子仗义现身的本身，就是一个不文明的悲剧。无论如何，在悲凉的社会里，思想型的专业人士，显然必须负起创造社会思维的责任，指导行动型的专业人士，走向正确的方向。

现代知识分子，有必要在忧患的年代，化身为社会良心，进行社会批判，建构社会思维、推动社会改革。

总之，古代悲情的知识分子未死，现代知识分子仍在悲情中奋斗。

可是，知识分子何德何能，担当得起如此重大的期许？

史册中知识分子的身影，其实是多么的伶仃与孤寂，大多数的读书人，都沉沦在宦诲中争名逐利而没顶。今天，工商社会的名僵利索，也一样会使知识分子的灵光窒息。

现代专业人士型的知识分子，一如旧时科考功名中的知识分子一样，面对着的挑战，那就是如何排除当权势力的打压，从平面的思想人，兼任立体的行动人；从待命的献策人，变成主动的决策人。而知识分子的另一大挑战，则是如何抗拒世俗名利的引诱，坚持自我不变质，不在荣华富贵里忘记理想，投身政海商场中仍守原则。这样才能避免一个个知识分子被现实融化后，又得苦苦寻觅其他的知识分子现身。

当然，新时代呼唤知识分子的真义，在于新时代呼唤一个自由民主的公民社会。如果，在一个人人都是知识分子的现代社会里，知识分子的角色，理应延伸为公民的责任。换句话说，以天下为一己之任的精英时代应已过去，自由民主的公民社会，不该把人民的福祉，托孤于少数悲情的知识分子身上。唯有知识分子从天下兴亡的责任中松绑而出时，大概才是整个社会安和乐利之日。

语言与现实的比较与分析

——马来西亚华语与中国华语的差异探讨

王玲/马进

（一）汉语是世界上最有魅力的语种之一，它不仅拥有人数最多的使用者，而且遍及世界各个地区，人数的优势、地域的宽广，使汉语风靡全球。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蒸蒸日上的迅速发展，使世界与她的联系日趋加强，更多的国家、更多的民族、更多的人群，产生了学习汉语的欲望。汉语之成为世界性的语言。

马来西亚的华人对学习汉语历来很重视。他们深知自己的血脉在中国，而与中国的各种联系，不仅依靠血亲关系来维持，而且要作靠语言来维持，离开了语言，等于丢弃了中国人这种认同。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种族的社会，巫、印、华三大种族在语言上的差异十分明显，语言是一个种族的明显标志。一个种族内的人们可以有不同的姓氏、不同的性别、不同的地位、不同的职业，但必须有大致相同的语言，以便能彼此沟通和交流，形成一种民族凝聚力。

马来西亚华人对汉语的热爱，从他们对汉语的称谓中也可以窥测一斑。他们习惯于将汉语称华语。以华语作汉语的称谓，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中华民族这个汇集了所有中国人的词，带有十分显著的民族亲切感，是马来西亚华人认祖的强烈表现。用华来代替汉，仅更动一字，就有了情味上的差异，很准确、很巧妙地表达了马来西亚华人那种斩不断的情丝。因为华实在比汉更具广泛含义，内容也更丰富。所以本文也以华语作为对马来西亚汉语和中国汉语的称谓。

（二）马来西亚的华语与中国的华语是同源语言，所谓同源语言即语言的来源是一样的，都是经过“六书”的方式创造出来的，其字形、字的结构完全一样。不论中国的华人或马来西亚的华人都使用这种完全一样的方块字作为与人交往的媒介，大家都可以凭借这种方块字在社会中扮演一个角色。每一个方块字所提供给大家的意思也是确定的，大家对每一个字的共识的原因，即在于语言的同源性。华人语言的同源性很好地说明了语言与民族的关系。一个民族的母语所以只能有一个，不能有两个或更多，根本点就在于这个民族的语言之源只有一个。以汉字为例，其产生的基础首先是象形，从形关始，就决定了汉字方块字的特征。汉字相对拼音文字来说，的确不易写，不易记，它那精致的结构，真象一座美妙的殿堂，抽去一

点、一横、一撇、一捺、一坚，都会让这座殿堂丧失美感，现出错误。但是，汉字也由此富有形象性、指示性、会意性，从子形就可激发想像，腾飞思维，创造美感，令人无比惬意，比如鸣字，甲骨文写成一只引颈长啼的雄鸡，又在鸡旁加一个口形代表啼声，中国文字学家康殷释在其代表作《文字源流浅释》中惊叹："这是人们在生活中最习间常见的情景。个人的熟习生活、艺术上的高度表现、创造和概括力都不能不使令人惊叹。"（该书由中国文物出版社 1987 年印刷，引文见该书 180 页）再比如贝字，开始写作一个贝壳的图形，后来变成今天这样一个字形。在远古人的心目中，贝类产自遥远的大海，物以稀为贵，贝被视作珍宝，成为贵重的装饰品，商周奴隶之常以贝作为珍贵的赠品。从一个贝字的演变源流，就可以令人浮想联翩，沉迷在浩翰的无际的历史的海洋中，发出一串串思古之幽情。象织字，甲骨文写作一条下垂的绳线被几条横线连在一起，很形象地说明了早期人类编织的情形，而以后的演变，使只成了织的声旁，纟成了织的形旁，它们共同构成了约占汉字百分之八十的形声字。难怪有人说知道了汉字的一半就可读出汉字的正确发音。

（三）德国十九世纪的大哲学家黑格尔发现：任何一种文化离它产生的源头越远，它的表现形式越丰富。中国的语言文字随华人进入马来西亚，经过百多年的洗礼，逐渐产生了新的变化，在与中国语言文字相比，在大同中有小异。所谓大同，即指：马来西亚华人所使用的华语与中国使用的华语，在写法读法用法等方面无太大差异，即使用方言读汉字，那仅仅是地域的影响造成的发音的不同，不能说方言与华语不是一种语言。其实华语的多姿多彩，丰富博大，正就表现在它的包容性和差异性上。从纵的方面看，华语从古汉语中来，至今许多成语、俗语、谚语、名言警句依然被大家乐此不疲的使用，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从横的方面讲，生活在东西南北中的具有不同地域的众多人口，各有各的方言，象无数条小河，汇成华语的汪洋大海，这大海中的每滴水珠都有自己独特的光彩。从历史深处走来的华语其源在古汉语，它流在哪里，哪里就出现汉语的异样性，表现出汉语的丰富多彩。

人们生活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环境，往往对同样的语产生不同的感受。这是就语言的内容方面讲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其理由如下：一是先天遗传和大脑结构及个性有所不同；二是观察某种语言现象的动机、目的有所不同；三是也可能作者本身的著作的语言表达的含混不清；四是观察时所处的环境因素的影响；五是每个人的价值经验包括文化背景、知识背景、生活经验的影响。第四、五点对语言的影响尤其重要。当我们感受某种语言现象时，往往喜欢以自己固有的文化背景、知识背景、经验阅历进行透视，并在特定环境的影响下，作出一定的判断和结论。

（四）当我们说到儒家时，就马来西亚许多华人的观点看，当然容易想到仁义礼智信、孝顺忠悌敬一类内容，而事实上，儒家本身这个词就相当含混。从时间上划分，有原始儒、汉儒、唐儒、宋儒、明清儒.....等等；从主张上划分，又有第一代儒家、第二代儒家、第三代儒家；从人格上划分，又有大儒、雅儒、俗儒、陋儒、贱儒等。许多马来西亚华人由于种种原因，不可能对儒家了解得很深很透，所以有上述认识可以说与文化熏淘、知识背景、个人经历、社会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再比如在引进西方思潮时，对于中文翻译的个人主义一词，许多华人的感受也很不一样。其实个人主义可以进一步划分成利他主义、个体主义、自我主义、利己主义。

上面谈到的是从语言的内容着眼的。就语言的形式来说，涉及到语音、语法、修辞方面的差异。马来西亚的华人绝大多数来自中国广东、福建，在这里繁衍生息，形成与巫、印两大种族并存的华人社会圈，世代相传，耳濡目染，乡音未改，其读音带有浓厚的方言色彩。在语法方面，虽然依然遵循华语的句法结构，但在语法成分的排列上有细微的变化，不象中国那样严格对待语法。在修辞方面，有许多带有马来西亚特色的辞格被创造出来，众口传诵，遂被纳入马来西亚华人语言系统。

从语言的演变规律来看，语言形式的变化常常先于内容的变化。以马来西亚的华语为例，华语的读音、语法存在不少不规范的现象，但华语的内容依然是固定的，有任何一个中国人都很容易明白的意思。“五四”运动前，胡适、陈独秀等人发动文学革命时，从白话文的提倡、实践开始，这种语言使用形式的转变，不仅打倒了占据统治地位长达二千多年的文言文，而且引发了一场至今余波未息的文化革命。胡适的《尝试集》虽然是幼稚拙朴的白话文，但却开创了中国文学的一个崭新的方向，代表了新文学的未来。

（五）为了能对马来西亚华语与中国华语作出正确的比较和分析，让应对语言功能展开必要的探讨。语言作为人类相互沟通的基本工具和储存人类经验的宝库，显示了四种功能：

一是报导功能，主要是传递、沟通资讯与事理，较具认识意义。此种语言重在说清一个事实，而透过经验对它能检证、印证、否证。

二是表情功能，较无认知意义，只表达一种情绪、情感。有的语言学家说：这种语言在表面文法上，往往是惊叹句或其他，但从深层文法而言，却隐藏了许多不同特殊文化因素在作用。换言之，表情用的语言就个人而言，它涉及了私人的意识形态、生活习惯；就文化而言，它涉及了此地区特殊的文化、社会背景、意识类型。例如传统的东方人就比较不会说：“亲爱的、蜜糖”一类语言，较习惯于隐藏内心的感情，但隐藏久了，一爆发，又不可收拾。

三是导引功能。此种语言最主要是导引被告知者如何去行动，其本身也几乎缺乏科学的认知意义和情绪意义，而只是人类的一种规约，往往有实效、规范功能及意义。

四是礼仪功能和执行功能。这种语言往往具有礼仪功能，象：“现在我宣布某某先生与某某小姐结为夫妻。”至于“现在典礼正式开始”，在礼仪语言中又含有一个事实发生，就具有了执行功能。还有日常生活中许多应酬的客套话，大多并无认识意义和情绪意义，可归入礼仪语言类中。

据此，还可将语言划分为中性语言、情绪语言。

一是中性语言。不包含主观价值判断，尝试表达事实。中性语言较具报导性功能。

二是情绪语言。包含主观价值判断和各种臆测的语言。由于价值判断往往受到判断者情的干扰和影响，所以这种语言包含了个人的情绪在内，易显示个人的立场、观点、方法，甚至带有一定的夸张性。因为在情绪的影响下，说话者难免说出激烈的言辞。

（六）马来西亚华语的中性语言使用频率高，中国华语的情绪性语言使用频率高。

先来看马来西亚华语的中性语言的表现

一是说话者比较注重纯客观介绍。大的方面看，如果你请马来西亚的华人介绍马来西亚国家的历史、马来西亚华人的历史，他们多向你客观地叙述事实，很少或根本不去作自己主观的评价，尽可能让事实突现出来，让事实自己来说话。这种叙述很象一部编年史教科书，只将某年某月在某地发生的事实叙述出来，不去评论谁对谁错。即使马来西亚华人讲述自己个人的经历，叙述自己生活中发生的事情，也包含了大量的中性语言，仿佛一位讲解员在讲与己无关的事实，语气很冷静，心情也很平静。

二是说话者不易表明自己的立场、观点、方法，注意情感上的克制和容忍。马来西亚的华人不太容易动感情，也不随便去表明自己的价值判断。当他们谈论某个人的时候，不论这个人作的事是对是错，大家更多的是把这件事讲出来，而不去评头品足，论说是非。对政府的某一项政策、对大的社会事件，也多是注重观察、了解，而绝少议论。即使对自己不利的有一定负面影响的措施，也较易于容忍宽恕，不在语言里表示过分激烈的情绪。这种中性语言的大量使用，很容易使人觉得马来西亚的华人的脾气很好。

马来西亚的华人为何使用中性语言比较多呢?

一是马来西亚多元种族并存，和睦相处，

环境宽松，培养了华人自我尊重和相互尊重的习惯。华人的语言里无偏版、过激情绪。

二是马来西亚强调民主建国，尊重公民权利，开辟许多管道，给国民讲话的机会，华人在这种气氛中注重以事实为依据来谈论一切。

三是中国传统文化对华人影响很大，不偏不倚的中和心理对马来西亚华人的立身处世起了定型作用。

（七）相比之下，中国的华语则包含大量情绪性语言，并主要表现在下列方面。

一是中国人喜欢评头论足。当政府出台一个政策、社会发生一个案件、产生一种现象，不仅舆论传媒争先恐后评说，而且上至政府官员，下至一般百姓莫不关心议论，不过，有些议论是公开的，有些则是私下的，有些是正面的、赞同的，有些又是负面的、反对的，如果你乘火车、坐飞机，你会感到每位游客都是出色的国是评论家，因为大家虽然素不相识，来自五湖四海，但对国是的关心却使大家亲近起来。你可以看到、听到不同的观点、思想，你来我望，针锋相对，互相撞碰。

二是中国人易情绪化自己。中国人对任何问题喜欢作出自己的判断，不喜欢冷眼旁观，无动于衷，所以遇事爱表达自己的看法，评出黑白是非。中国人的情绪化的语言包含着自己强烈的爱憎。如一个人工作紧张，甲说他是能者多劳；乙说他是一无瞎忙；丙说他的工作很出色。但很少有人说他做了很多工作。因为前三种语言包含着说话者给出的价值判断，后一种语言则是中性语言，是一种客观报导。有的语言学家把中性语言表达的思想称为“无颜色的思想”。而把以价值和情绪语言表达的思想称为“有颜色的思想”。当然，中性与价值或情绪往往是程度之别，不是非黑即白。如果说有纯粹的中性语言，那就是数学分析语言了。

（八）中国的情绪化语言为什么多呢，可能有这样几个理由。

一是今日中国正处于急剧变化时期。政府的治国方略、改革措施、政策调整，社会的某种现象、情绪波动、微妙动向莫不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是也。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人们的共同点特别多，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感觉、共同的问题很容易牵扯大家的情绪，形成议论纷纷的局面。

二是今天的中国正在大开放，世界的各种思潮纷纷涌入，多元文化互相激荡，对中国人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大家的思想越来越活跃，参与的意识格外强烈。过去只有知识分子才关心的话题，一般的工人、农民现在也感兴趣。这些人比知识分子不知多多少倍，有十多亿。象民主、自由从“五四”时期进入中国，虽然有快八十年的历史了，但严格说来，只是知识分子对此感兴趣。围绕民主、自由产生的学说，并未真正走入民间，占人口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工人，农民所向往的是孔子的小康世界。大家追求的是衣食饱足的生活方式。现在，工人、农民解决了基本生活问题，产生了更高的需求。不再满足于现有的饱暖生活，更希望获得自己应该享有的权利，包括行使公民的选举、被选举权，表达自己主张的权力等。在中国的工厂、农村，有不少不负责任、滥用权力、腐败的领导者就这样被工人、农民集体罢免己有许多实例。

三是中国人有一种从古延续下来的传统，这就是凡事求十全十美。春秋战国时代，有一个很一致的核心，又使他们神似。这个核心就是希望社会完美。所以，中国人在这种求完美的心情支配下，都很热切地盼望社会快点进步，早日在各方面现代化。因而大家难免指手划脚，评头论足，也难免大量使用情绪化的语言。现在，中国开放了，中国人衡量事物的标准不在局限于过去与现在这样一个纵向系列，而扩展为左右、未来这样一个横向系列和前向系列。比如一件事情做得比过去好，还不是真正的好，真正的好应该是比左邻右舍更好，经得住未来的检验。你是市长、省长，你的工作有无成绩，不在于你比前任的市长、省长多干了哪些事，还在于你比其他市长、省长要干得好，起码达到国际，最好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市长、省长比一比。如果一位市长、省长能进入世界级标

准，大家会真正心服口服，交口称赞。

（九）通过上述的比较和分析，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下面四点结论。

一是中性语言和情绪语言并无优劣之分，各有优点。中性语言偏重事实，情绪语言偏重评论。在马来西亚，多元种族平存，各民族和睦友好，中性语言有助于加强各民族的团结，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繁荣进步。在中国，汉民族是主体民族，汉语是国语，在实现中国现代化这个总目标、总方向下，大家以不同的价值判断和情绪显露，来表达一种心照不宣的认同和想法，很适合中国人口众多、国土宽广这样一个基本国情。

二是中性语言、情绪语言都是语言的一种类型，人们怎么去使用它，那是由一个国家情况决定的。只要一种类型的语言有利于人们沟通、理解，方便人们的生活和工作，能促进社会进步，那么，这种语言无论是中性语言还是情绪语言都是有魅力的，人们怎么选择、怎么使用，那是人们的自由。我们千万不要说马来西亚华人是客观的，中国人是主观的。我们只能说由于环境、国度、地域的不同，分属两地的华人有不同的使用语言的习惯。

三是从马来西亚华语与中国华语的差异中不难看出，在大众传播内容、教育内容、社会价值观多元化、多样化的时代，华人在不同国度中的价值观呈现出各种层次，显示了华语的灵活度、适应度及无法遏止的生命力。华语在与中国不同的世界里，依然可以融会入一个异样的社会，与其他语种争奇斗艳，焕发出新的生机。

四是华语在马来西亚不可能一成不变，与在中国一般模样。语言是尼思想的外衣和形式，形式的改变是和思想改变有关系的，不过这样改变是缓慢的、细微的。在马来西亚，华人除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外，不可能不受到其他文化的影响，引起观念上的变更，这对语言会有一定的影响。象我们在前面分析所表明的马来西亚华人对中性语言的偏重就是例子。在马来西亚这样一个三大种族共存的社会，从各个种族不同价值判断和情绪体验出发，如太多使用情绪化语言不利于社会稳定和进步，而中性语言恰好避免了情绪语言的短处，注重客观事实，从而就使各种族能寻找到一个共同沟通交流的基础，取得情绪语言所无法具有的融合效果。

（十）前面说到马来西亚华语与中国华语比较起来，存在不够规范的问题。

一是在读音方面，受广东、福建等地方言的影响，不大分 z、c、s 与 zh、ch、sh，不大分前鼻音与后鼻音，所以在有的字的发音上欠缺准确。

声音是语言的外壳，声音读不准，字的意思就不能正确表达出来，会造成理解上的歧义。

二是在语法方面，马来西亚华语受到英语语法的影响，喜欢把状语挪至动词后面。看下面的例子。

例一，我们应该多给他几次学习的机会。

例二，我们应该给多他几次学习的机会。

多是虚词，用来修饰限制给的数量，用在给之前是正确的，但马来西亚华语往往将多放在给之后，这不符合汉语的惯例。

副词不能用于修饰名词，一般用于修饰动词和形容词，但在马来西亚华语中，副词也被用来与名词搭配在一起。

例三，这里有少数学生很坏。

用程度副词很来修饰形容词坏，表明坏的程度，这在中国华语中被视作正确的句子。

例四，这里有少数学生很坏蛋。

用程度副词很来修饰名词坏蛋，是把名词坏蛋当作形容词来用了。从词的作用上看，这种词性搭配法不符合汉语的规范。

马来西亚的华语还常常使用偏正词组作谓语。一般说来，偏正词组是名词性词组，只充当主语、定语、宾语，不作谓语，谓语由动词性词组充当。

例五，你应该用大的力气。

在上句中用是动宾，大的力气是偏正词组，做用的宾语。

例六，你应该大大力。

大大力在上面的例句中充当动词性词组，做了谓语。

马来西亚华语的迭词与中国华语也有不一致处。中国华语的形容词可以重迭，比如我们可以说：

例七，安安静静、冷冷清清、碧绿碧绿、红红火火、平平常常、实实在在。

一些双音节词在中国汉语中可以按 AABB 的方式重迭，如：多多少少、大大小小等，但一般不习惯说多多、少少、大大、小小。如果这样说，只适合于单音节词，如我们可以说：

例八，红红、绿绿、好好、坏坏。

马来西亚华语有时会拆开双音节词，按单音节词的方式重迭。

例九，他买了小小一条鱼。

我们已在文中说过语言的变易性。华语在马来西亚有变化乃是正常的。语言的约定俗成性表明，只要一种语言现象被大家认可，能存在下去，那么，它就合法化了。

（十一）在语法方面，马来西亚的华语多以可以、不可以来作动词，表示一种愿望、一种想法，语气比较委婉曲折。

例十，我可以这样作吗？

例十一，你不可以这样回答。

中国华语在表示一种愿望或一种想法的时候，词语的感情色彩因人而异，有时较委婉，有时较强烈。

例十二，我想这样做。

例十三，我十分想这样做。

例十四，我不想这样做。

例十五，我根本不想这样做。

值得注意的是，马来西亚华语在表示愿望、想法的时候，只涉及自己，不涉及对方。中国华语因为要说出自己的想法和愿望的浓烈感情色彩，所以不仅仅涉及自己，也会涉及到对方，如果要表达的愿望和想法是自己所赞许的，就会连同对方一起赞扬，如果要表达的愿望和想法是自己所非议的，那么，可能连同对方一起非议。

例十六，我愿意这样做，你的提议太好了。

例十七，我讨厌这样做，你怎么能想出这样坏的主意。

此外，马来西亚华语在表达一个相对完整的意思的时候，不太注重借助成语；而中国华语则很喜欢借助成语来表达一些特定的意思。这大概和成语的特点有关。成语是经过从古至今、世世代代的人们不断使用而形成的在意义、结构上定型的语言。成语表示的意思由它的整体意义而定，往往不能依照其字面的意思来望文生义。比如运筹帷幄这个成语出自《史记·高祖本纪》。刘邦说：“夫运筹策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子房是张良的字，筹是筹划的意思；帷幄是军中帐幕。意思是在军帐内对军略作全面策划。刘邦认为自己在这方面逊色于张良。现在中国华语以这个成语泛指策划某事，而不仅仅指军机要务。许多类似的成语包含动人的典故，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附加了引伸的意义，弦外有音，从字面上很难看出它们的意义。由于许多成语的意在言外的特点，故有的成语含有明显的比况和夸张、引伸的意味，又可用来指称一些不好用明确语言表达的意思。由此看来，马来西亚华语喜欢把一些事讲得明明白白，使大家一听就清楚，而避免出现歧义、含混一类费解的现象。而中国华语借用成语表达的意思，会造成一定的听者参与空间，使之互相交流时更富有情感色彩。

在马来西亚华语虽然处于与马、巫语并驾齐驱的位置，但通行于马来西亚的语言依然是马、英二种语言。华语主要在华人社会中传播。在中国，华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任何语言不仅无法代替，而且根本无法与之抗衡。所以，华语的地位和悠久的历史决定了这种语言具有相当大的空间，供听者来参与，以丰富其中的

含义，强化其感染力。

（十二）从语言文化学方面看，任何一种语言都表现着一定的文化特征。马来西亚华语之所以与中国华语在大同方面存在小异，不能不归结于马来西亚独特文化的影响。马来西亚的马、巫、华三种语言及英语相互影响，长期共存，是我们所提到的变化的主因。象把状语放在动词后面，把数量词放在动词后面，以形容词作副词的被修饰语，就是例证。语言所处的环境不仅仅在句子与句子、词与句子中，而且主要指一定的社会环境，包括人与人的关系、人的地位和身分、人所在的民族和团体等。所以语言的文化特质表明，任何一种语言在这个社会环境中是这样，在那个社会环境中就会出现一定的变化。对这种由文化引起的变化，应该给予承认，它是文化积淀的结果，也是约定俗成的结果。约定俗成就是习惯，习惯就是不成文的法。语法就是语言习惯。马来西亚华语与中国华语在表达上的变化，已成为马来西亚华人的习惯，重要的是，如何使这一变化和与之完善相应的表达方式相结合，以促进华语在马来西亚的发展，则是马来西亚华语必须正视的问题。从大的方面讲，不论马来西亚华语还是中国华语，因其是同源语言和华人的母语，必然有共同的语音、共同的词汇、共同的语法。如果连这些语言的构成要素都大相径庭，那么，华语就失去了其代表一个民族的功能，很难想像失去语言的中华民族还可以叫中华民族。从华语在马来西亚的现状看，在语法方面出现的变化，反映了马来西亚华语已植入马来西亚这块文化沃土。我们甚至想马来西亚华语可能在读音方面有自己的独立性，其具体表现是有的字、词与中国华语的读音不一样，但含义相似。就像英语分成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一样。

所以，可以这样讲，马来西亚华语的变化，并不是对中国华语的叛逆，是语言在其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的现象。

（马进——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现代语言研究学院教授。王玲——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现代语言研究学院讲师）



《癲痫并不可怕》

增订本面市

每册：RM 8.00

陈忠登医生以浅白的文字，通过系列的真实故事与医学知识，解释什么是癲痫病，它发生的情况，如何检验与治疗，以及生活禁忌等问题。

《癲痫并不可怕》是病患者治疗的指南；也是可贵的医药常识。

欢迎邮购请联络：

华社研究中心（华研）(271806-T)
HUAZI RESOURCE & RESEARCH CENTRE BHD.
No 1, Jalan Maharajalela, 50150 Kuala Lumpur, Malaysia.
Tel:03-2734035 Fax:603-2734037
E-mail: huayan@huayan.net.my

赏析表现人和生活的两组汉字的源流

王玲

一、汉字的演变历程

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汉字的演变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由注重形体的表意文字逐渐发展成为表音文字；

二是字形由繁变简，所谓删繁去难，损复为单。

汉字由繁变简的演化，主要表现在从图画变成线条，再由线条变成粗细的笔划。

中国最古的文字是殷代的甲骨文和金文。殷代的文字因写刻在龟甲和兽骨上，所以叫甲骨文。甲骨文发现于河南安阳县小屯、后冂和候家庄的殷墟——商王盘庚迁殷后京城遗址，所出的甲骨是从盘庚到帝辛12位帝王约273年（约公元前1300——前1028年）的卜辞和许多记事文字，所以也叫“殷墟文字”或“殷墟卜辞”。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距今已有3300年。从这时的文字看，六书的象形、指示、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已经具备。

商周时代，中国已大量使用青铜器，其上刻有铭文，铭文中常有“易吉金”等字样，便简称“金文”，又因铭文多刻在青铜的礼器和乐器上，又叫“钟鼎文”。

汉时许慎所著《说文解字》所称的籀文是指周宣王时史官教授学童识字的书的部份字。

甲骨文、金文、籀文都属于大篆，统称古文。

小篆是秦统一六国后确定的标准文字。它改变了古文的象形和不统一的写法，在笔画上注重匀圆齐整。

由篆变隶，使汉字发生了性质的变化。篆字书写较难，而隶体则为适应书写的要求应运而生。隶体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文字从实用向审美发展。

楷书、草书、行书都从隶体中演化出来，隶书产生于汉代，故称汉隶。

从汉至今，是今文字时代。

汉字的演变历史表明：它由象形变成符号，脱离图画成为文字，从不固定的字形，变成固定的字形，从繁复的笔画结构变成较简单的笔画结构。图画形的、繁复的文字很不方便书写，而隶书就比篆体写起来方便，而楷书、行书、草书又比隶书写起来方便。东汉初的尺牍是用隶草来写，魏晋的尺牍则用写楷书的书法来写行书。

汉字在它的演变过程中，除了重实用外，还很重美感。不论汉字的哪种形体，都很注重字的间架结构，讲究笔画的运用和气势，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表现了一定的艺术性和强烈的美感。

二、表现人的一组汉字的源流

在古文字中，表现人和人的活动的文字是主体，数量相当多，有表现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的文字，有表现不同面向、人形的文字，还有强调人体某部份的文字和表现独特人形的文字，真是千恣百态，气象万千。

（一）表现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的文字

1. 表现老人的文字

A. 老：甲骨文、金文的老，象一位头发花白、体态老迈、手扶拐杖或儿童的老人。但金文把老字由甲骨文的象形仅保留为一个杖的形状，而对腰躬的部份则以笔划来象征。有的文字学家只看到金文的老，认为老字是一个主祭祀的老人，把酒壶顶在头上。

B. 考：在甲骨文、金文中，考、老的意思相似，但也有字形上的细微差别，老字里老人的拐杖的把柄在拐杖的中上部，考字里的老人的拐杖则在顶端。有的文字学家因不大清楚老、考在拐杖上的这种区别，而误把考字的拐杖理解为完全与拐杖无关的东西。许慎是汉代著名的文字学家，他的《说文解字》一书是研究文字学的必读书。但许慎却说考字的拐杖是人出气时凝结在一起，遂走入怪诞的歧途。

C. 孝：甲骨文、金文中没有这个字。这可能与当时尚未形成如此明确的道德观有一定关联。从篆体看孝字，孝字很象一个人用头承接老人的手行走，以表明孝字就是晚辈对长辈的顺从和敬意。在金文中，有一二处借孝来代考，有人据此认为老、考、孝同意。

历史表明，中国人重德起源于周，《诗经》中所说的“天命靡常，惟德是辅”是周时人们流行的观念，但真正讲孝还是在孔子以后，而孝作为一种观念被接受下来，那就是汉以后的事了。

D. 寿：甲骨文没此字，金文有时把它写作用手扶着寿字，有时写作举起酒器或奉器于老人。从字形上看，这个字的上半部象一个老态龙钟的老人，下半部表声（畴声）。显然，寿有活的长、高龄的意思，人们以酒器相贺，则含有庆祝之意，今日的贺寿、祝寿显然从古意中引出。

E. 长：甲骨文、金文写此字为一位长发老人扶杖而行，以表示其为长者、长老之意：秦篆、汉隶承接此意，在字形上尽量突出长发的特点，实得此字神髓。

2. 表现妇女的文字

A. 在古文字中，妇女的形象是一位跪着的两手交叉在腹前的人形。甲骨文中的女形有几种，有的突出眉、有的突出头发、有的突出头部、有的突出双乳，但是，上述的几种女形，都是跪着的，腿呈弯曲状。由此可以看出男尊女卑观念对文字的影响。

B. 妇：甲骨文、金文的妇字都是女形手执扫帚。这个字表明妇女在当时社会中所处地位是低下的，她们所从事的是家务劳动。中国有一古语：“女主内，男主外。”正是这个字的注解。

C. 孕：甲骨文、金文的孕字很象一位大腹便便、怀有胎儿的妇女，但是，在篆字中，那个腹中孩子已有一半露出腹外，不如甲骨文、金文那样具有象形特征，而是显示出会意的特点。

D. 母：甲骨文、金文在女形胸上加两点，指示为双乳，又在头发上加一横，表示发上有

簪，以示成年。后来将双乳、簪写成今天的母字的横转，楷体将其写作今天的母字。

E. 妥：甲骨文、金文都写作用手抓住女形。妥在金文中多有祈求的意思，大概当时有以妇女献祭的风习。《仪礼》中的“妥而后安”乃是明证。从妥字的古体，可看出这个字的本意含有对妇女的污辱。

3. 表现儿童的文字

A. 子：甲骨文、金文的子象两只小手上下摆动、下肢裹在襁褓中的幼儿，头部较大，这很符合婴儿的特点。

B. 孙：甲骨文、金文的孙象用绳索缚住手的子。孙与讯同意、同声，是讯的异文，是少年俘虏的意思。今天所说的孙子除有辈分低的含意外，也从俘虏中引伸出地位低下的意思。当说一个人过于没有身份和地位时，往往有“象孙子一样”的话语。

C. 孟：甲骨文、金文中的孟象一个在大的盆中洗澡的婴儿。当时的风俗有婴儿一出生就要洗澡的讲究。因此孟字含有开始、起动的意思。孟春、孟秋是春、秋两季中的第一个月，孟兄、孟姐则是兄弟姐妹中排行居长的。至于把孟引伸为大的意思，实未脱离孟的本意。

D. 孔：金文的孔与子很象，只是比子在头上多了一个装饰物。可见这个字的本意与子孩有关系，所以它也能表示小洞、小窟窿的意思。

E. 弃：甲骨文的弃象一双手捧一个簸箕往外倒一个婴儿的样子。可见，弃的本意不是扔物，而是扔人。

（二）表现人的某个部分的文字

1. 表现头部的文字

A. 首：甲骨文、金文的首是一个侧视的有点象动物的头形，似乎还未脱去当时的人们崇拜神的那种浓厚的风习。中国文化的两大源头——神本文化和人本文化交汇在这个字里，这个半神半人的首字有多么深厚的文化底蕴。真能窥一斑见全豹。

B. 喏：甲骨文、金文的喏同诺、若，象一位用双手将长长的头发理顺的人。所以，这几个字都有顺从、通顺的意思。《韩非子·八奸》“人主未命而唯唯，未使而诺诺，先意承旨，观貌察色，以先主心者也。”文中的诺诺，就是顺从的意思。

C. 沐：甲骨文的沐字，象一位散发的人跪在一个用架子支起的盆前水洗发，相当形象。沐的本意就是洗头发。《诗经·小雅·采绿》：“予发曲局，薄言归沐。”显然就是洗头发的意思。至于润泽等意思则明显引伸了原意。

D. 斗：甲骨文、金文的斗，象两人互相撕扯对方的头发。也相当形象。在后来，斗的发形被省去，许多人望文生义，把交叉的手当作兵器，还有的人不懂斗的初形，又生添许多笔画，把一个简单的斗字写的很繁杂。

E. 须：金文象颜面有须的侧面人形，后来，被借用其声，用来组成所须、必须一类词，已失去本意。

2. 表现身体的文字

A. 身：甲骨文、金文的身，象一位有意袒腹的裸体人形。由此可见身的本意在强调腹部，即人的主体部分。而身手、身分则是在此基础上的引伸意。

B. 心：甲骨文的心象人的心脏，呈三角形。由于心字与贝字在形状上近似，许多人将心释为贝，以致把重要地名中国的沁水县写成浥水县。在此心构成的文字中，心的含意有两种：

一是用心代表花纹。甲骨文的心有时加上一个花纹，使心来代表花纹。

二是表示心意、思想，同念、愈等字。

C. 手：甲骨文、金文的手象一只张开的人手，五指全见。在古文字中，表现人手的文字很多，大概手对人的作用太重要了，而古人干什么都靠手，所以，对手就情有独钟了。比如谢字，在甲骨文中，谢象伸开双臂打开一张席子，用以表示隔绝、拒绝、阻塞、辞谢的意思。最有趣的是又字。

又：在甲骨文中，又象一只张开的右手，在金文中，又的用途很多，大致有以下几类。

一是用右手表示左右，并有保佑的意思。

二是祭祀名，是祭祀文字的简化。

三是同祐，含有受祐的意思，即受福之意。

四是用于有无的有。有时还拿又来代表整个人。甲骨文、金文中的许多字，用又来表示各种各样的劳作。例如耕字，象人扶一张犁在耕田，后来扶犁的人就用又来代替，只剩一只手，但又不影响对犁字的理解。

D. 尽：甲骨文的尽象一个人在使用条帚和炊具，在洗刷杯盘。尽表示器皿中的食物已用完，而可以被洗刷了。可见尽的本意是从吃中得到的。至于尽心尽力所表示的全部使出心力的意思则毫无疑问是引伸意了。

E. 拯：甲骨文的拯，象用双手救援落在陷阱和深坑中的人，金文的拯则省去了坑形，只有双手去救援人的形状。古文字的拯写作丞，有辅助的意思。从秦国商鞅开始，丞成了官职的名称，所以，以后另造一个拯字代替丞。

3. 表现下肢的文字

A. 止：甲骨文的止是一个人的脚，有脚掌、脚趾。人的脚是用来走路的，所以止含有明显的动意，这是止的本意。从春秋时代起，止示静而不示动，但那已不是止的本意。如《庄子·胠箧》："故绝圣弃知，大盗乃至。"显然取止的后起意，含有停止的意思，而与止的本意截然相反。

B. 岁：甲骨文的岁，象用斧斩断人的双脚的样子，很令人恐怖。我们知道殷商时代风行祭祀，祭祀时，不仅要宰杀牛羊，而且要献祭活人，以表示世人对上帝的诚意。所以《卜辞》说："王又岁五臣于帝……"这句话的意思是国君又向上帝肢解了五位奴隶。这句话后还有一句话，意思是还肢解了三十位俘虏。因为这类极其残忍的祭祀一年举行一次，所以也称年为岁。但岁的本意是肢解人。

C. 涉：甲骨文、金文的涉是只脚在水中蹚过的样子。涉字中的意符止在上文中就是人脚，表示向前趟过河的意思。在这里，止指示着行动的方向。

D. 步：甲骨文的步是左右两脚向前迈进、大步行走的形状。在步的旁边还有一个十字交叉路口。可见，步是沿着一定道路走动。今天所用的步，虽有行走的意思，但已失去按道路走的意思。

E. 奔：金文中的奔象是一个人在很用力气走，并又加上三只脚，以表示人奔跑的迅速。甲骨文未见奔字。奔的原意至今保存。

（三）被丑化、污辱的人的文字（特殊人形）

A. 荊：金文的荊不仅是人字的变形，而且手足都作兽爪状。这等于说荊人是人形兽爪，反映了殷周统治者对楚地民族的蔑视。郭沫若指出：楚人自称楚，不称荊与此相关。当时的统治者把所有不奉行他们的礼仪的其他地区的人都视作异类，表现出蔑视的态度。

B. 尸：甲骨文、金文把尸都写作一个弯腿的人形。殷周统治者更是用"尸方"、"淮尸"来称呼周边少数民族。《说文解字》将尸解释为："陈也，象卧之形"，显然不通。《论语》中有孔子"寝不尸"的记载，如按《说文解字》对尸的解释，就成了孔子睡觉不躺下，其实孔子并不是站着睡觉，而是睡觉时腿不弯曲。

C. 羌：甲骨文、金文的羌是长了羊角的人形。殷周时代的统治阶级很迷信，对祭祀格外重视，他们把用来祭祀上帝的人统称羌，视这些人的地位与牲畜一般无二。有些羌字象有羊角的人颈上缚以绳索和其它刑械，等待被去处置。《卜辞》中记载羌的文字有很多，其中一处记载，某次献祭就用斧头跺碎了三十个羌。《卜辞》载最多一次要用百羌献祭明岁。

D. 囚：甲骨文、金文的囚，象禁在井或洞穴中的人。我们今天常说的囚犯，就是沿用了囚的古意。

E. 童：金文的童是刀刺在眼睛上，东作声符。可见童有奴隶的意思。《说文解字》："男有罪曰奴，奴曰童。"这与我们今天所用的儿童、童年一类词的意思不知相去有多远。

F. 臣：在甲骨文中，是被刺盲一只眼的人，金文大致相似。臣就是奴隶，在殷商时代用为人牲。在周朝，则被周王任意赏赐。至于以后的大臣则是引伸意了。

G. 辛：甲骨文、金文的辛都象古时动刑用的一把刀，让人一望而知其义。在妾、童、仆等字中，这些人头上都有一个辛，以表明他们是低社会地位的人。辛也代表雕、刻、刺等小形工具。现在辛的本意已渐隐晦，人们习惯于说的辛苦、辛酸、辛辣早已不是辛的本意了。

三、表现人的生活的一组汉字

（一）表现食物、器皿的文字

A. 豆：在甲骨文、金文中，豆象盛食物的器物，同一只高脚杯。这表明豆的本意是吃饭用的器物，而不是今天所说的食品。豆这种食器最早用木头制成，以后又流行陶制豆器。古代不用豆称大豆，后才借豆声来称指大豆。

B. 香：甲骨文用香表示放在豆器中的食品所散发出的香味。现在，我们使用的香字已脱离在一定器物中的意思，而专指一种好闻的气味了。

C. 爽：在甲骨文、金文中，爽象一个人手提两个豆器，表示一种和谐。和今天所说的爽朗、爽快有极大差别。

D. 鼎：甲骨文、金文的鼎有腿有耳，显然是炊具。鼎在古代三足两耳，是用来烹饪的锅。开初由陶制成，后由青铜所铸，并由普通人家生活用品上升为象征统治权力的器物，作为庙堂之物而显示统治者的尊严。后来的小篆将它的两耳去掉，在足上多加了几划，使一些人误以为那几划是锅下的木柴。许慎就这样注解鼎字。

E. 曹：甲骨文、金文的曹是在一个釜中烹煮二东。东的意思是鸟的身体或植物的块根。更有趣的是春秋时代的曹国竟因从事此类生产而获得国名。由此可以推断凡曹姓在远古者，莫不于此类生产息息相关。随着社会发展，曹的本意渐渐丧失，而我曹、尔曹、功曹等后起义已与曹的本意相去甚远，很难寻见它们的联系。

还有许多字，从其最初的形状，便可知它的本义。

器，从犬，用四个口来表示犬吠的声音很大、很吵。

丧，是好多物器从好几只手中掉下来的形状。

品，是用三个器来表示器物之多。

齐，是几个整齐的肉块，表示切割的规整。

壶，是细颈，有盖，两耳状，一望而知其义。

商，是双柱，大腹，三足之器。如果从侧面看，双柱重迭，只有一柱。而古人喜欢在表示器物的物件的字上加一个类似 u（字母）的符号，所以商这个字就有了今天这样的形状。商字的本意早已不被人知，但商的地名表明那一定是一个善制商器、善于酿酒的地方。

（二）表现衣饰的文字

A. 免：在金文中可以看出免是人头上的一个圈，象征帽子。免、帽乃同源字。

B. 衣：象古代的上衣形。古代的上衣很独特，其襟部作斜长的三角形，人在穿衣时，用襟来卷腰胸一周，然后在襟角上束上带子。衣字在古文中就象一件衣服有长长的带子，带子卷曲。许多出土文物都表明古人就是着的这种衣。《说文解字》误解衣的形状象覆两人形，显然就有失偏颇。与衣有联系的字有裘，裘是衣上加毛，是有毛的皮衣。

C. 作：是衣形的局部，但加以细细描写，以表明：

一是制衣。因为制衣有个过程，那个局部只是大样，相当今日的图纸，而需照这个样子，细细剪裁。

二是表示刚刚制成一件衣服，而且仅仅是衣领部分，与初字所含有的刚刚开始相区别。

三是含有卒的意思。衣领部分有代表全部衣服的意思。这部分完成了，一件衣服就算作好了。

由上面的解释可以知道，作的本意是制衣，而从作的本意引伸的开始、制造、兴起则与作联系最密切。至于作品、发作、砍削等意思则与作的联系显然比较远了。

E. 缝：在古文中象用许许多多的线缝在衣服的缝中。其中的衣缝不是随便哪个部分上的缝，而是衣领上的缝。其中的线专指丝线。

在甲骨文中丰字象一个人顶着二个缝字，可见丰字和缝乃同源字。《卜辞》："于帝五丰臣。"意思是向上帝祭献了五位缝纫奴隶。

（三）表现交通、行路的文字

A. 车：在古文字中，车有轴，有轮，有横木，其形状类似真车。甲骨文的车有两轮、有车箱、车辕；金文的车比甲骨文的车复杂，形象，惟妙惟肖，酷似真车。

B. 津：古文的津象一人立舟上，引竿制船，撑渡划桨，后又省去人身，只留人手。津是从舟和津的合体演变来的，是会意字。上述分析表明：津的本意显然与渡船有关，以后被引伸为渡水之事和渡口名称。中国的天津靠近大海，必与渡口有关无疑。

C. 行：在甲骨文、金文中，行象一个十字交叉的路口。汉隶深得古意，把行有意写成一个很象十字路口的松散的行字。《诗经·逐豳风·七月》："女执懿筐，遵彼微行。"就取的行的本意。行人、行止、行旅中的行则已是行的引伸意了。

D. 建：甲骨文中无此字，金文有此字。金文的建，从聿从舟。在古文字中，津和建是相通的，可见建也与渡河渡水相关联。我们今天所讲的建设、建议早已失去建的本意。

（四）与传统文化有关的文字

A. 鼓：甲骨文、金文的鼓象一位手执桴（鼓捶）击鼓的力士。鼓在古文中是动词，表示敲击的意思。《左传·曹刿论战》所说的"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其击鼓之意极明显。

B. 喜：金文的喜象一只鼓放在台阶上，表示有喜庆的事用奏乐来庆贺。由此可见，当时的人们凡遇喜事，必定敲鼓庆贺。

C. 乐：甲骨文、金文的乐表示张丝弦于木制乐器上，以为乐器。这说明弦乐在中国商代已很流行了。

E. 肃：甲骨文、金文都无此字。它出现在周朝后期。象一个人手握毛笔书写，书写的地方很别致，是一种极特殊的类似瓶子的格子。这种格形被发现在青铜器上，一般画或写家徽，及与祭祀有关的事。肃的本意既然与祭祀有关，当然就有了谨慎庄重之意。

F. 在中国文字里，有许多字与酒有关，与宗教有关。如：

福：象一人捧敞口酒瓶往一种叫桌石的自然崇拜物上倒，这种桌石在古文中象一个独脚桌。

医：虽不见于甲骨文、金文，但却与调理酒有关。

祝：在甲骨文、金文中，象一个人张嘴，祷祀，跪在桌石前。

祐：甲骨文、金文的祐象一个人捧酒细碎的祭品在桌石上。以后，人的身躯被省去，只余双手。

四、几点结论

（一）中国的汉字起源于图形，具有实用性和艺术性。从甲骨文、金文至篆体、隶体、楷体、行书、草书，都遵循这条路发展下来，莫能例外。中国的汉字不仅仅用于交际、表达，而且用于观赏、品评，给人以美的享受。这是中国汉字重要特征。

（二）中国的汉字反映了中国文化的演进。甲骨文、金文这些古老的文字，记载了远古的中国人的思想观念、风俗习惯、衣食住行。古老的中国文化在古文字中得到充分的反映。从那数万千恣百态的方块字中，可以认识中国那

丰富灿烂的文化。研究中国文化，不能不研究汉字。

（三）中国汉字在结构上经历了删繁就简、变换部位、由同而异、由异而同的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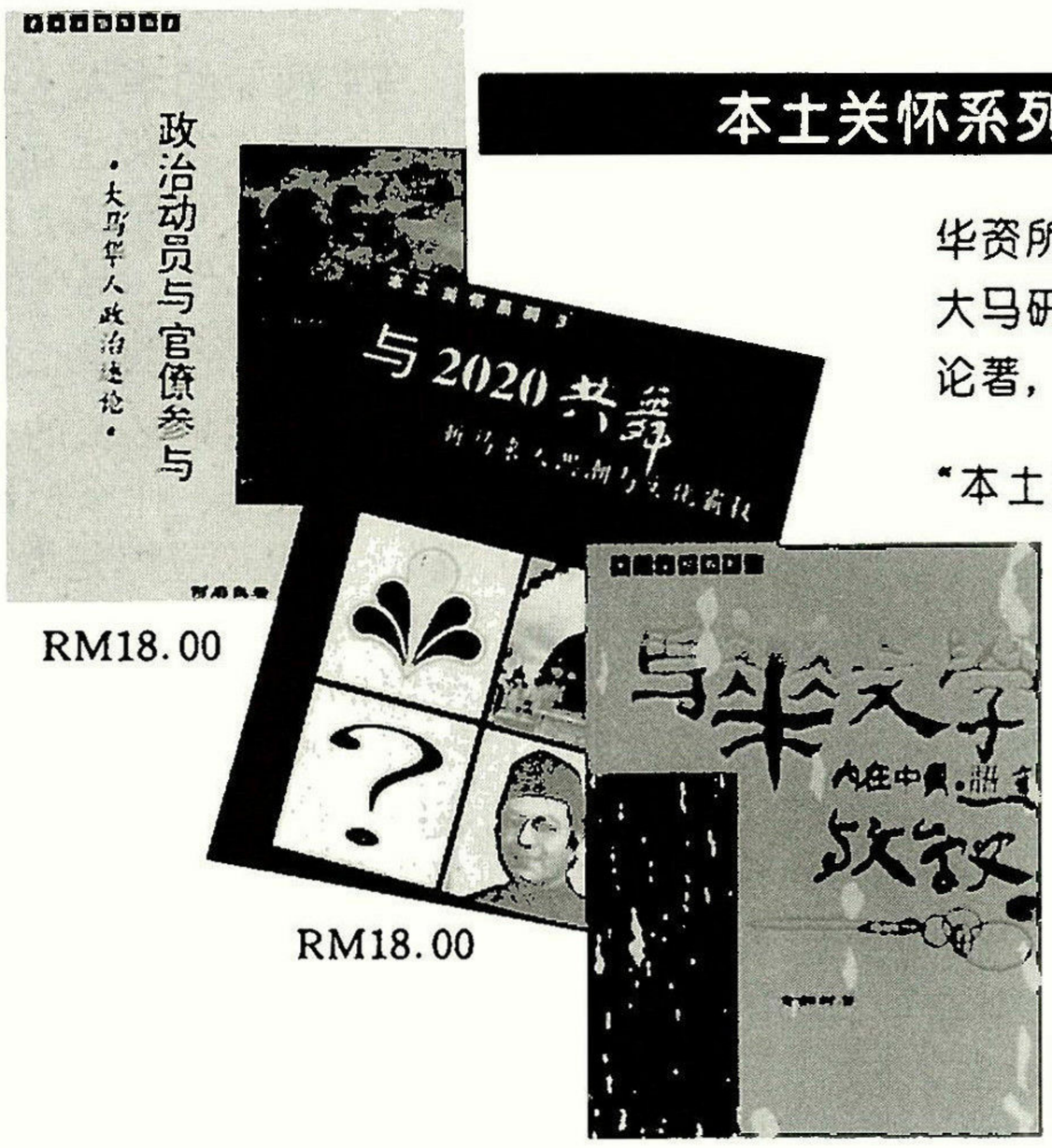
1. 删繁就简。在汉字演变过程中，许多字的重复部分被省去，写起来更简便。甲骨文的韦中间是城邑，外面是四只脚，表示保卫或包围。小篆省去两只脚，与韦的繁体字很象。甲骨文的星是五个小方块，小篆省去两个，隶、楷又省去两个，只剩一个星。真是由繁星变成单星了。

2. 变换部位。甲骨文、金文图形性强，字形随所画人和物定，小篆划一长方形，有些笔划不匀称的字，不得不打破原来的结构，以适应方块字的要求。金文的保象一个人用手臂卫护另一个人，小篆把保写成今天的样子。小篆还把一个独体字折成两部分，以适应书写；隶书是扁方形，一些由上下两部分迭合起来的字写起来不方便，就把上下结构写成左右结构。如峰、蛾等字。

3. 由同而异。在小篆中，有些偏旁不管放什么部位，它们都是一样的写法。但在隶书、楷书中，一个就变多了。如水在小篆中不论在上、在下、在左、在右都写成一样的象水流下来的样子。在隶书、楷书中，水所处的位置不同，写法就不一样了。比如：江、水、益、泰中的水有四种写法。再比如人分化成企、仁两种（人、亻）。

4. 由异而同。与上面的情况正好相反。有的构字成分，在小篆完全不同，在隶书、楷书中成了一个。例如鸟、鱼、马、然，小篆分别是写有两脚，鱼有尾巴，马有四足，然下有火苗，在隶书、楷书中全变成一样的四点，毫无区别。

（王玲，现任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现代语言研究学院讲师）



RM18.00　RM18.00　RM18.00

本土关怀系列

华资所出版的“本土关怀系列”，是以大马研究及大马华人研究为范畴的学术论著，计划在五年内出版三十本。

“本土关怀系列”丛书(1)、(2)、(3)每本定价 RM18.00，三本合购特价 RM45.00。邮购者请另付邮费 RM3.50。

邮购处：

华资企业有限公司 Huazi Enterprise Sdn Bhd

No.1, Jalan Maharajalela, 50150 Kuala Lumpur, Malaysia.

Tel: 03-2734035　Fax: 03-2738946　E.mail: huazi@huazi.po.my

马来西亚
华文华语的规范化

王介英

（一）前言

语言文字是人们表情达意、沟通思想与交流经验的工具。它们具有的社会性，决定了它会随着社会的发展与人们生活中客观需要的改变而起变化。这种变化包括旧词汇的消亡与新词语的涌现、异形词与异形字的同时并行以及句式的分歧、表达方式的互异等等。这种分歧的现象，会令语言文字的学习者与使用者感到困惑、混乱，同时也加重他们的负担。

为了减轻学习者与使用者的负担，同时也为了提高语言文字的交际功能，对语言文字进行规范化的工作，是非常必要的。

（二）何谓语言文字的规范化？

所谓“规范化”指的是按照一定的原则，包括趋简避繁、照顾语言文字的系统规律以及约定俗成的客观事实等，来进行取舍的工作，使语言文字趋向标准化，加强统一，减少分歧，从而促使语言文字充分发挥它的社会功能。例如，一个读音与意义完全相同，而用法也完全一样的字，如果有几种不同的字形或写法，我们选取其中一个较适当的作为“正字”，其余的一律加以废弃，这不论对学习者还是对使用者肯定都是一件好事。异形词的情况也一样，在“抹杀”与“抹煞”并行的情况下，选取“抹杀”而废弃“抹煞”，让学习者与使用者只须掌握其中的一个。这样既可解决分歧的问题，又可令学习者与使用者省时省力，何乐而不为呢？

（三）规范化的指导原则

马来西亚的华文华语乃源自中国，与中国的中文与普通话是一脉相承的，是基本上一致的。虽然如此，由于历史背景与社会发展的不相同，马中两国的华文华语无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相异”与“分歧”的现象。

众所周知，马来西亚的华人主要是由操福建、广东、潮州、海南与客家这五种南方方言的人所组成。方言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了华语的发音与华文的句式。此外，马来语与英语也在不同的程度上带来一些影响。

如果我们肯定规范化是必要的，那么，我们的规范化应以什么原则、什么标准作为依据呢？“跟随主流”，我想这应该是大多数的人都能接受，都会赞同的指导原则。中国自五十年代开始就汇聚全国的精英进行语言文字的规范化工作，其中语音与文字的规范化工作已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绩。他们的成果我们可以吸取，他们的经验则可以作为我们推行规范化工作的参考。然而，语言毕竟是约定俗成的，规范化的工作更不能脱离语言的客观事实。比如：“电脑”这个词在马来西亚是人人知晓，人人运用的词，而中国却多用“电子计算机”，我们是否为了“跟随主流”而以众人皆感陌生的“电子计算机”来取代富有旺盛生命力的“电脑”呢？这里头存在的问题是在“跟随主流”的基础上是还可以允许因约定俗成或其他客观需要

而出现的“相异”现象的存在。因为，马中两国国情不同，要求马来西亚华语与中国普通话同步发展是不实际的，不可能的。中国语法学家陈俭明先生在评论新加坡华语规范化问题时，所提出的看法，可以作为我们的参考。他说：“新加坡华语的规范化也不一定要完全受中国普通话规范的限制。.....对于那些虽然是从方言或外语来的，但很有表达力，而又不破坏汉民族共同语的规则，则可以接受成为新加坡华语的组成部分。”[1]依据陈先生在评论中的意见，华语的规范化应以中国的规范为基础，能与中国普通话靠拢的应尽量与中国普通话靠拢，但不一定要完全一成不变地遵循，只要是不破坏汉语的系统规律，那些来自方言或外语，而又具有表达力与生命力的词语与表达方式是可以被接受的。我非常赞同陈先生所提的这种看法。

（四）规范化的四个范围

马来西亚华文华语的规范化所涉及的范围主要有四个：（甲）语音的规范化，（乙）汉字的规范化，（丙）词汇的规范化，（丁）语法的规范化。

针对上述这四个规范化范围来说，我认为语音与汉字的规范化问题比较单纯，比较容易进行。因为中国已在这两个方面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工作，并且已拟定并发布了具体而明确的规范化标准。我们只要严格遵照中国官方颁布的这些标准，认真地在文教界进行推介工作，假以时日，应该能收到预期的成果。

（甲）语言的规范化

最近，我国“华语正音委员会”配合马来西亚广播电台第五频道广播“正音节目”，他们“正音”的依据，正是中国的“审音表”。华语教师在中小学里教导学生学习华文华语，也以“审音表”作为依据。可是，由于马来西亚华人受了方言的影响，使学生对一些方言里所不存在的语音，例如：轻声音、儿化音与卷舌音等，一时还掌握得不好，因此，还须继续努力。

（乙）汉字的规范化

汉字的规范化涉及的主要有三方面，即(a)简化汉字，(b)异体字，(c)新字形。我国教育界早在七十年代末施行 KBSR 课程时，就已决定采用中国颁布的那一套标准。所以，今天国民型中小学华文课本的用字（字形），都是规范化的汉字。南洋商报的用字基本上也是规范字形。

简单地说，所谓“规范汉字”指的是一个字如果有“简化形体”（中国于 1986 年 10 月 10 日发布的《简化字总表》里的简化字），就以这个简化汉字为规范，其繁体字形被废弃。那些没有简化形体的字（一般所谓的“繁体字”），其字形与笔画，则须符合《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中国于 1955 年 12 月 22 日发布）及《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中国于 1965 年 1 月发布）这两份文件所采纳的字形。这两个表所规范的实际上就是“异体字”与“旧字形”。由于后来中国有关当局在发布重新修订的《简化字总表》（1986 年 10 月）与出版《现代汉语通用字形表》（1988 年）的时候，对《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所采纳与废弃的一些字进行调整（涉及的有其中的 25 个字），所以要确定那一些字是不规范的异体字还须参考《现代汉字通用字形表》与《简化字总表》。[2]

语音与汉字规范化的问题，由于有中国官方正式发布的标准可供依据，所以我不想多谈。问题比较复杂、比较困难的是词汇与语法的规范化。

（丙）词汇的规范化

关于词汇的规范化，中国自 1955 年 10 月在中国科学院召开“现代汉语规范化问题学术会议”以后，就如火如荼地展开探讨与研究的工作。可是，一直以来，由于缺乏明确而具体的标准与切实可行的指导原则，因此虽取得一些相当可观的成绩，但很多问题还没有解决。

---

[1] 陆俭明、张楚浩、钱萍《新加坡华语语法的特点》，见《南大语言文化学报》第一卷第一期，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开中心，1996 年。页 63。

[2] 参见王伯熙编《汉字规范知识》，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2 年。页 25。

至少到现在，还没有类似语音与汉字规范化那样的文件的发布。

就马来西亚的情况来说，词汇规范化的范围主要有四个方面：(a)异形词汇，(b)缩略语，(c)方言词汇，(d)外来词语。

(a) 异形词汇

所谓异形词汇指的是词形不同而含义相同，并且在同一个语境之中可以互相掉换的一组词语。例如：抹杀与抹煞、交代与交待、给与与给予、化妆与化装等等。这一类的异形词为数甚多，的确有必要依据一定的原则进行整理与规划，使它们规范化。在规范化的过程中，我们对“取”与“舍”应依据什么标准呢？我认为中国学者朱炳昌先生在《论异体词的歧异和规范》一文中所提出的建议是合理而可取的。[3] 他所提出的原则有下列六项：(i)普遍通用原则（从俗），(ii)汉字简化原则（从简），(iii)标音准确原则，(iv)表义明确原则，(v)分工并存和合并归一原则，(vi)系统化原则。

(i) 普遍通用原则：

所谓“普遍通用原则”，实际上就是“从俗”。依据这个原则，在同组的两个“异形词”之中，选用人们应用得最广泛的那一个作为标准词形，另一个就加以废弃。例如：思维与思惟，保姆与保母，害怕与骇怕等等，选取前者而废弃后者。

(ii) 汉字简化原则：

实质上这个原则就是“从简”的原则。依据这个原则，在同组异形词之中，选取笔画较少的那个，作为规范词，而废弃另一个。例如：仓皇与仓惶，人才与人材，淫雨与霪雨等等，选取前者而废弃后者。

(iii) 标音准确原则：

有的复合词的其中一个组成配件（语素/字）存有多音异读的问题。例如表示“乞丐”的“花子”与“化子”这一组异形词中的“化”字，既可读 huā 也可读 huà。可是在这里的“花”与“化”只能读为 huā，因此，依据这个原则，应选用标音准确，不会产生误读的“花子”而废弃“化子”。其他类似的情况如：角色与脚色，泄漏与泄露，标志与标识等等，都一律选前者而废后者。

(iv) 表义明确原则：

同一组异形词中，一个表义明确，另一个表义不明确，在这种情况之下，应选表义明确的那一个作为规范词。例如：诬蔑与污蔑，两者词义都是捏造事实破坏他人的名誉。其中“诬”具有捏造事实冤枉他人的意思，而“污”乃泛指“脏”。因此，应选“诬蔑”而废弃“污蔑”。其他相同的例子有：留连与流连，耽搁与担搁，狐臭与胡臭，详实与翔实等等，依据这个标准都取前者而废后者。

(v) 分工并存和合并归一原则：

在一些异形词中，有时其中一个词形既与同组的另一词形具有相同的意义与用法，同时又另具别的意义，在这种情况之下，就不宜采用“取一舍一”的办法，而应采取“分工并存和合并归一”的原则。

例如：统帅与统率，在表示“统辖率领”（动词）这个含义时，两者相同，有人用这个，有人用那个。可是，“统帅”又可表示“军队的领导人”（名词）。在这种情况之下，应依据“分工并存和合并归一原则”，以“统率”表示“统辖率领”（动词），而以“统帅”表示“军队的领导人”（名词）。这意味说，表示“统辖率领”含意的词两个并为一个，只取“统率”而废弃“统帅”，可是表示“军队领导人”这个意义的词，依然由“统帅”来充当。

(vi) 系统化原则：

对于词义相关的同义语素，要尽可能取相同的字或相同的格式，使它形成一个系统性的组合，以便于记忆。例如：环球与寰球，环宇与寰宇，取“环球”、“环宇”而废弃“寰球”与“寰宇”，让它与“环境”、“环绕”等词形成一个系列。

---

[3] 朱炳昌编著《异形词汇编》，语文出版社，1987年。页 271-276。

其他如：模仿与摹仿，模拟与摹拟；鲁莽与卤莽，粗鲁与粗卤等，一律取前者而弃后者。

这六项原则之间，有时会出现矛盾，在这种情况之下，就要依据轻重与需要进行考虑。

(b) 缩略语

缩略语指的是经过压缩与简化的词语。它包括名称的简化与短语的压缩两种。

马来西亚华语中存在着许多这一类的词语。例如：马大（马来亚大学）、独中（独立中学）、筹委会（筹备委员会）、家教协会（家长教师协会）等等。这一类的词语，合乎规范吗？这是我们需要探讨的问题。

我认为缩略语是一种以最简洁的形式，省时省力地传达相对丰富信息的一种语言手段。它的出现与形成完全符合人们讲求经济简洁的要求，也符合人们趋简避繁的心理。只要它表义明确，而又没有违反汉语构词的规律，而且人们又普遍接受，就应加以采纳，予以“合法”的地位。

虽然如此，缩略语的创制，还须遵循一些基本原则，不能任意缩简。其中最重要的有下列三项：

(i) 必要性：只有使用频率高而有关的词语又比较长，才有进行缩略的必要。
(ii) 须符合汉语构词的一般规律。
(iii) 缩略后语义须明确。

关于语言文字的缩略，最忌生造硬凑。可是我常看到报章副刊一些写作人写的文章里出现一些似乎经过压缩的词语，可是这些词语语义又不明确。例如：“凉寂”（清凉而寂寥?）、“浮绵”（浮荡而延绵?）、“恣言”（恣肆地言?）、“惶愧”（惶恐而内疚?）、“自虚”（自我谦虚?）、“批责”（批评责难?）、“侵透”（侵犯渗透?）等等。[4]像这样的词语似乎有“生造硬凑”之嫌，不足为训。

(c) 方言词汇

标准的华文华语一般而言，是以中国北方方言为基础，而以北京话为核心，南方方言一直以来都受到排斥。虽然如此，在语言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也有一些南方方言词汇被接受为规范词语，例如：上海话中的尴尬、把戏、吊胃口等等。近年来，由于广东、福建等沿海省分经济发展迅速，导致许多源自粤语方言的词语在北京流行起来，例如：电饭煲、酒店、发廊等。这其中存在着一个“人们是否愿意接受、愿意使用”的问题。只要人们普遍使用、普遍接受，原本不“合法”的也会成为“合法”，这是“约定俗成”的威力在起作用。

根据我个人的观察，马来西亚的华文华语使用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将方言词语当作华语词语使用，而自己完全不自觉其不规范。例如：第五频道某播音员在介绍流行歌曲时，用“受落”代替“受欢迎”，菜市场的家庭主妇用“芽菜”代替“豆芽”，电器店售货员用“电饭煲”代替“电饭锅”等等。

马来西亚华语中有一些词语人们应用得很广泛，但却与中国普通话词语不相同，我们该如何看待它们？以下是一些应该视为规范对象的词语：冲凉 / 洗澡 / 沐浴、脚车 / 脚踏车 / 单车 / 自行车、镭射唱机 / 激光唱机、引擎 / 机器、巴士 / 公共汽车、摩托车 / 电单车、救伤车 / 救护车、太空人 / 宇航员、乘客 / 搭客、骑劫 / 劫抢等等。

一般而言，我们赞同尽量向中国普通话靠拢，采用普通话中已有的词语来取代来自方言的词汇。但是，如果普通话词汇库所没有，而有关的方言词语又具有很强的表达力，那么它应有机会被接受为规范词语。

(d) 外来词语

马来西亚华文华语使用者经常使用的词语中有很多是外来语。例如：“幽默”、“逻辑”、“刹那”等等。“幽默”、“逻辑”来自英文，而“刹那”来自梵文，像这一类有“迹”可循的词语，只要我们稍为注意，一般还能知道它们是外来语。还有一些已完全溶入了汉语词库

[4] 见何启良《知识分子独立精神的再肯定——记〈马华知识界文化宣言〉一周年》，《南洋商报·论坛》，1998 年 6 月 28 日。

中，简直无“迹”可循，我们经常使用而完全不自觉它们是外来语，例如：哲学、原子、民主、义务等等。根据刘正琰、高名凯等编的《汉语外来词词典》，上述这些词是源自日文。

总的来说，我们日常生活中所常用的外来语，有的已取得“合法”地位，有的却尚未被接受为规范词语。其中源自马来语的尤其不易列入门墙，享有“合法”地位，例如：巴杀、沙爹、峇迪、甘榜、宋谷、纱笼、尖必叻等等。

虽然如此，我认为一些只有马来西亚才有的食品或水果的名称，而本地人民已约定俗成地广泛应用的，我们应予以接受。当然在进行取与舍的时候，我们还须遵守一些基本原则：

1. 如果现代汉语中已有现成的词语可供替代，则可舍弃外来词语。例如：“巴刹”以“菜市场”取代，“罗里”以“货车”取代，“甘榜”以“乡村”取代等等。

但是一些音译地名则不能以相同的标准处理。例如：吉隆坡的“甘榜峇鲁”(Kampung Baru)若以“新乡村”取代，恐怕连当地人民也有不知所云之感。

2. 若是外来词语具有特殊内涵，且广泛为人们所应用，而现成的现代汉语中又没有适当的词语可替代，则应加以接受。例如：峇迪、沙爹、沙笼等。关于“沙爹”有人提议以“烤肉串”取而代之。但我总觉得“沙爹”这种马来食品所具的内涵，实在不是“烤肉串”所能概括得了。因为一般烤肉串在食用时并没有“沙爹酱料”以及黄瓜、大葱、米糕等与之相配。凭着“沙爹”所具有的特殊内涵，承认“沙爹”的合法地位，我认为是合情合理的。如果“汉堡包”因其特殊性而可以被接受，“沙爹”应该也能被接受。

（丁）语法的规范化

所谓“语法”指的是“语言单位的组合规律”。[5]一个语言体系，照理应该只能有一套“语法系统”，符合这个语法系统的规律的就是正确的，否则就是不正确的，当然为了达到修辞目的而采用特殊表达方法，属于特殊情况，则另当别论。

一般而言，“语法的规范化”指的是语言文字的使用者在选词句时，所采用的词语与所造出来的句式，是否符合“语法系统”的规律的问题。规范化就是要舍去不合乎规律的词语与句式。

马来西亚的华文华语中有许多表达方式，是属于方言的表达方式，不符合标准华语的规律。例如：把“你先走”讲成“你走先”，这是将修饰动词的副词状语后置（粤语句式）。再如：“上司见到属下员工迟到，就脸黑黑。”句中的“脸黑黑”（闽南语表达方式），也是不符合标准华语的规律的。像这一类的句式或表达方式，都应列为规范的对象。

到底马来西亚华语中有多少这一类的表达方式，我因为没有作过全面的调查工作，所以在这里仅能谈谈自己平日的观察，并参考以陆俭明为主的一个小组对新加坡华语所进行的研究成果——《新加坡华语语法的特点》[6]，举例略作说明。

以下是马来西亚华文华语使用者用得很普遍，而却又与中国普通话的规范相异的一些句式与表达方式：

a. 特殊副词“有”充当动词或形容词的状语：

例如：i. 他有读过这本书。
ii. 那次的比赛我也有参加。
iii. 你的病最近有好一点吗?

中国普通话里，“有”只当动词用，没有当副词用的。上述句子应去掉“有”。

b. 复合趋向动词后边带处所宾语：

例如：i. 杜维明博士已经回去美国了。

[5]庄文中《中学教学语法新编》，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年。页1。

[6]同注1。

ii. 上完体育课后，同学们又进去课室。

按照语法规则，复合趋向动词若带处所宾语，那么处所宾语应置于复合趋向动词之间，如“回去美国”应改成“回美国去”。

c. 动词或形容词带状态补语时，中间常插入助词“到”：

例如：i. 玩到很高兴。
ii. 美到令人神魂颠倒。

按照语法规则，述补结构中间只能用“得”不能用“到”。上述句子应以“得”取代“到”。

d. 动补结构后边加特殊助词“来”：

例如：i. 后面的同学，坐好来，不要跑来跑去。
ii. 政治要搞就要搞好来。

“坐好来”应改成“坐好”。

e. 用“太过”表示过分或程度变高：

例如：i. 你未免太过天真了。
ii. 爸爸太过保守了。

“太过天真”应是“太天真”或“过于天真”。现代汉语中没有“太过”这个副词。

f. 百分数多用数词加“巴仙”或“巴先”：

例如：物价涨了 30 巴仙。

规范的表达方式应是 i. 三成、ii. 百分之三十或 iii. 30%，而不能用数词加“巴仙”。

除了上述的情况之外，还有很多与中国普通话相异的句式与表达方式，恕我不一一指出。要进行语法规范化的工作，首先必须全面搜集资料，包括书面语与口语的资料，然后进行分析。这需要有足够的人力与财力。负责进行这方面工作的人员须是全职而非兼职，因为这是一项庞大而艰巨的工程。

（五）结语：

华文华语是我国华人的共同语，提升华文华语的水平更是华社一向来十分执着，十分重视的问题。因此，我认为华人民间团体应认真进行华文华语规范化的工作。若想看到显著的成绩，还须成立一个基金以支援这方面的工作计划。必要时还应聘请中国语言学家到马来西亚来，以全职的方式进行协助。此外，董总属下的“语言文字规范化委员会”应与华社研究中心及各大专中文系互相配合，拟订一个全盘的研究计划，认真去展开工作。

（编者按：作者王介英现为马大中文系讲师）

外来词与译名规范

杨欣儒

所谓外来词，是指从外国语言和国内各友族语言里吸收过来的词。也有人认为“它是指本民族语言从外国或其它民族语言吸收进来的词。”另外一种说法是“一个民族从别的民族中吸收很多的词语，这种吸取来的词语就是外来语。”有的看法是“一种语言往往从其它语言中吸收一些有用的词，这种词称为‘外来词’或‘借词’。”这些看法尽管不一，不过实质却是一样的。本文提到的外来词，也包括本地常用的马来语与英语词语。

汉语吸收外来语的历史悠久，最早的可以追溯自先秦。《楚辞》里的〈招魂〉提到“晋制犀比，费白日些”，〈大招〉里有“小腰秀劲，若鲜卑只。”这里的“犀比”（也作“师比”）和“鲜卑”都是外来词。其它借自波斯的外来词有“狮子”，源自阿拉伯的“八哥”（鸟名），等等。

吸收外来词的方式

汉语吸收外来词的方式，有以下几种：

(1) 音译

从法语吸收进来的有咖啡、蒙太奇等。汉语也从英语吸收了大量的词语，例如：芒果、可可、迪斯科、打(dozen)、雷达、巧克力等。从梵语吸收过来的多与佛教有关，例如：菩萨、刹那、罗汉、和尚等。汉语也从西域借来了不少的音译词，例如葡萄、琵琶、笳、石榴等。

有很多音译词在使用一个时期之后，往往被新产生的意译词所代替，例如：科学（取代了赛恩斯）、民主（德谟克拉西）、最后通谍（哀的美敦书）、毒气、煤气（瓦斯）、抵制（杯葛）、德律风（电话）、青霉素（盘尼西林）、维生素（维他命）等。

在我国，华语吸收了不少的马来词语，例如槟榔、沙笼、宋谷、亚答叶等。

源自马来语和英语的音译词很多，不过我国的华文报章却滥用了这些音译词，例如舍“执照”不用，却用“礼申”，舍传票不用，却用“三万”。反之，我国华文报章往往舍现有的音译词不用，却生造了一些不规范的词语，例如有了摩托车，却还要生造摩托西卡、电单车、摩哆车等。

(2) 译音兼译意

在译音时，所用汉字也兼顾到原词意义的表示。例如幽默、模特儿、扑克、绷带(bandage)、的确凉（一种布料）、乌托邦、浪漫、引得(index)、俱乐部等。

(3) 半音译半意译

一半译音，一半译意。这种外来词大都存在于复合词中，例如冰淇淋（冰激陵）、华尔街、苏伊士运河(Suez Canal)。

这类外来词有一些中国的译法和我国的不一样，例如 New Zealand，中国取半音译半意译，译为新西兰；我国的则取音译，译为纽西兰。英国的 Cambridge 译名，我国和中国都是半音译半意译，不过译名不同，我国译的是剑桥，中国译的却是康桥。

(4) 音译加表意成分

在音译词的前后附加上一个表意的成分，注明这个词所指事物的类别。例如：高尔夫球(golf加“球”)、沙丁鱼(sardine加“鱼”)、卡片(card加“片”)、芭蕾舞(ballet加“舞”)、雪茄烟(cigar加“烟”)、香槟酒(champagne加“酒”)、酒吧(“酒”加bar)等。

我国民间也有类似的外来词，例如烟叶叫罗果(rokok)草。Indah Water译成“英达丽水”，在音译的英达(Indah)后面加上表意的“丽”，的确是译得妙。

(5) 借词

汉语有相当的外来词是借自日本的，这些词一经吸收使用后，就成了汉语词汇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几乎不能让我们区分它是汉语还是外来词。例如：道具、手续、解决、目标、现象、美术、经济、舞台、积极、取缔、干部、索引、经验、幼稚园等。

最近十多二十年来，大量的日语词在我国涌现，例如：屋（发屋、美容屋）、族（上班族、有车族）、专门店（手表专门店、面包专门店）。这些外来词丰富了华语的词汇。

本地词语

本地固有的一些词语，译名已经稳定下来了，大家都可以望名知义，例如：叻沙(laksa)、亚答(atap)、弄迎舞(ronggeng，马来民间舞蹈)等。不过仍有一些词是同物异名的，例如一种食物cendol就有“煎堆”与“晶露”两种译法。显然的前者比后者逊色，因为“晶露”音意兼顾。还有一些同物异名的，如otak-otak（一种食品）、roti canai、belacan、curry puff、langsat、duku、kueh kepit、bubur caca等译法各异，我们必须对这些本地词进行规范化的译名工作。新加坡在1987年出版了《小贩中心、巴刹、酒楼餐馆和中元节常见物品名称简编(修订本)》，这本小册子对我们本地译名工作会有很大的帮助。

有些词语音译不如意译得好，比如nasi lemak译为椰浆饭，总比“拿锡鲁妈”好。

一些比较有争论性的本地词语如巴刹，我们已经沿用了好几代，是否应改为菜市，这是个见仁见智的看法。有些人认为pasar用音译的巴刹，不过pasar malam却用意译的“夜市场”，前后不一致。其它如马来人的村子kampung，也有人反对音译的“甘榜”，他们认为既然华文已经有了“村子”，就应叫马来村子，不应改为音译的“甘榜”。

还有一个区域性的组织ASEAN，亚洲各国的华文译法各异。即使是我国的两家主要的华文日报，译法也不同：南洋商报译为“东协”，星洲日报译为“东合”。新加坡将之音译为“亚细安”，中国、泰国、越南与柬埔寨叫它“东盟”，印尼与菲律宾则称它为“东协”。

我认为一个这么重要的区域性机构，各国的译法应该统一下来。1997年12月2日至7日，在加影董教总教育中心举行的“第二届东南亚华文教学研讨会”的闭幕礼上，我就曾针对这个译法提出我的建议——ASEAN应该有统一的译名。

人名的译音

我国马来同胞的名字，中国的译法与我们的有异。例如Abdul Rahman，我们译为阿都拉曼，非常简明；而中国却将之译为“阿卜都勒·拉赫曼”，几乎每个音素都译下来。这种译法不合我们的语言习惯。

对于马来同胞的译名工作，目前玛拉工艺学院(ITM)在苏维妮讲师的领导下，工作已接近完成。有了这本马来同胞的译名手册，以后各国的华文传媒翻译我国马来同胞的名字时，须按“名从主人”的原则，以这本权威手册为根据。

《马来人译名手册》出版后，我们所期待的是另一本我国印度同胞和少数民族的译名手册。

外国人名的译法，我国华文报有统一的，如克林顿总统；也有分歧的，如俄罗斯总统叶利卿（中国的译名），我国的华文报章就有耶尔欣、耶尔辛等不同的译名。我们的华文报章如果能够参考中国的译名，各报把外国译名统一

起来，相信能提高信息处理效率，也会减少读者阅读上的不便。

我国地名的译法

我国的地名译音，有一些比较稳定，各地的华文地名译音比较一致。例如：

马来文	华文	地名例子
Bukit	武吉	武吉丁雅 (Bukit Tengah)
Kuala	瓜拉	瓜拉雪兰莪(Kuala Selangor)
Tanjung	丹绒	丹绒武雅 (Tanjung Bungah)
Sungai	双溪	双溪大年 (Sungai Petani)
Telok	直落	直落甘望 (Telok Kemang)

有些译名却不统一，各地译法各行其是。例如：

马来文	译名一	译名二
Air Putih	亚亦布爹（彭亨）	阿依布地（丁加奴）
Air Hitam	亚亦依淡（森美兰）	亚依淡（柔佛槟城）
Pengkalan	Pengkalan Bukit（柔佛）	武吉榜加兰
	Pengkalan Kundang（森美兰）	彭加兰干当
	Pengkalan	孟加兰（吉隆坡）

有些马来文的地名一样，不过华文的译法却不一致，有的音译，有的意译。例如：

Simpang Ampat	十字港（四七港）	（吉打）
	十字港（四叉港）	（玻璃市）
	新邦安拔	（威省）
	新邦暗拔	（霹雳）

有些地名音译得很恰当，有些意译得很准确，例如：

Mersing	丰盛港	（柔佛）
Batu Arang	煤炭山	（雪兰莪）
Kampar	金宝	（霹雳）
Bukit Merah	红坭山	（霹雳）

我国地名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即马来文的地名，由当地华人按方言来音译，如果你根据华语来念，便会发现读音与马来文有天渊之别。例如：

Bacok	万捷	（吉兰丹）
Gua Musang	话望生	（吉兰丹）
Bruas	木歪	（霹雳）
Kajang	加影	（雪兰莪）
Endau	兴楼	（彭亨）
Pulau Tikus	浮罗池滑	（槟城）

还有些地名，华文的名字与原文（马来文）风马牛不相及，既不是音译，也不是意译，例如：

Johor Baru	新山	
Butterworth	北海	（槟城）
Nibong Tebal	高渊	（槟城）
Sungai Chuah	锡米山	（雪兰莪）
Tanjung Piandang	角头	（霹雳）

其他如避暑胜地的 Frasers Hill，华文译为“福隆港”。不知其地理位置的人会以为它位处海港呢！

有些人认为我国地名宜按马来文的念法音译。我认为这个问题并不存在，因为有些特有地名如“新山”已经约定俗成，当地华人已经沿用了好几代，不由外人任意修改。就如我住的地方“大山脚”，马来文是 Bukit Mertajam。如果你将它音译为“不吉莫打人”，相信有人管它吉不吉，先把你揍一顿。由此看来，地名的华文名称应该按当地华人的叫法。可是第五频道的地名却一律用马来文，似乎并不尊重当地的华人社会。

有些地名用了生僻字或自造字，这是违反汉语的语言规律的。例如沙劳越州的“劳”，当地华人用了“月”字旁的“劳”。字典或词典上找不到这个字，这就是自造字。槟城有一条街 Jalan Sungai Ujong，华文的名字是“胡椒埕”，另外一条街叫 Chulia Street Ghaut，华文的地名是“柴埕前”。这两条街名的“埕”是生僻字。

我认为有些地名与街名如果用了生僻字（包括方言字），应该改为通用字，即根据《现代汉语通用字表》。[1] 我们应尽量避免使用生僻字，因为这样会造成信息处理不便。

关于地名是否可以更改的问题，我们可以借鉴中国的经验。中国从 1956 年至 1964 年间，先后共批准了 35 个地名用字，同时废除了一部分生僻字。例如：黑龙江省的“铁丽（马字旁）县”改为“铁力县”，四川省的“丰（右耳旁）都县”改为“丰都县”。

中国在 1987 年 3 月 27 日颁发了《关于地名用字的若干规定》的通知，严格规定不准用自造字、已简化的繁体字和已淘汰的异体字。[2] 我国虽然没有法律条文规定，但我们希望华社和民间能自发自觉地避免使用自造字和生僻字，尤其是要为新的住宅区取名时。

其实在我国，地名的更改已有先例。霹雳州的 Chemor，已由十分不雅的“朱毛”改为“珠宝”。所以把生僻字或自造字的地名改为通用字的问题也不存在，主要看当地的华社是否能以开明的态度去接受它。

最后我要一提的是，地名要避免音译与意译重复。例如类似 Jalan Kuantan 的街名，有些地方译为“惹兰关丹律”。这种译法犯了几个错误：其一是：“律”没有“道路”的意义，这是方言翻译 road 的念法，应该改为“路”；其二是“惹兰”与“路”音译与意译重复；其三是我们的华语既然已经有了通名“路”，就不该用外语的“惹兰”，因为我们的华语词汇不会贫乏得连一个“路”字也没有吧？

参考文献

1. 罗常培《语言与文化》，1996 年 9 月，语文出版社。

2. 武占坤、王勤《现代汉语词汇概要》，1983 年 9 月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3. 史锡尧、杨庆蕙《现代汉语》，1984 年 11 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4. 马来西亚华文报刊编辑人协会《统一译名手册》，1986 年。

5. 《语文文字规范手册》（1997 年重排版），语文出版社。

6. 大庆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语言文字规范化指南》，1995 年，教育科学出版社。

[1] 中国在 1988 年 3 月 25 日公布了《现代汉语通用字表》，收字 7000 个。这个表是为了适应出版印刷、辞书编纂和汉字机械处理、信息处理等方面的需要。

[2] 这个规定主要内容如下：各类地名，包括自然地理实体名称、行政区划名称、居民地名称……均应按国家确定的规范汉字书写，不用自造字、已简化的繁体字和已淘汰的异体字。地名的汉字字形，以 1965 年文化部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联合发布的《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为准。

文章要讲究文采

李业霖

"句争一字之奇，文采片言之贵，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以追新。"——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

前人在文论中对文章提出四个基本要求，即言之有物，言之成理，言之有序，言之有文。所谓"言之有物"，指文章在立意选材方面，要有充实的内容，突出的主题，最忌夸夸其谈，空话连篇。所谓"言之成理"，指文章立论有据，持之有故，析理透辟，揭示事物的本质规律。所谓"言之有序"，指文章材料组织的安排，包括开头结尾，层次段落，衔接紧密，转换自然，结构完整。文章学家常说："文似看山不喜平"，还要有波澜起伏、风卷树摇的变化，引人入胜。所谓"言之有文"，指文章要讲究文采，"精理为文，秀气为采"，[1]对文章进行艺术加工，使文章色彩绚丽斑斓，富有感染力，读起来醰醰有味，逸趣横生。前两项是属于思想内容的问题，后两项是属于结构表达的范畴，这四者都互有联系，互有作用，共同在一篇文章内体现出来。文章具备这四个条件，才算是好文章，才称得上是合格的精神产品。

孔子是一位古代文化大师。他除是哲学家外，对文学有深湛的修养，对文质论（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形式问题）提出了卓越的论断。他重视文采，曾说："志有之：'言之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2]他表示学问和思想的传播，须要靠有文采的文章，如果文章没有文采，就缺乏生命力，流传不会广远。他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3]这段话，可阐释为孔子对文质兼备的主张，要求文章要有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他还提出了"辞达而已矣"[4]的观点，认为文辞的表达是为内容服务的。孔子这些文学理论包括文采论，成为后世文章学家和文学批评家热烈讨论的课题，成为他们发挥文论的理论基础，影响深远。

《庄子》是战国时代思想家庄周的著作。庄子借用寓言（假托故事），重言（转述名人的话）和卮言（随机应变的话）的形式，善用夸张、比喻、排比和比拟的修辞手法，来表达玄奥闳达的思想。他的文章特点是汪洋恣肆，仪态万千，在先秦诸子的著作中最富有文采，与屈原作品同具丰富想象和浪漫色彩。李白对庄周非常敬佩，赞誉他的文章"吐峥嵘之高论，开浩荡之奇言。"[5]庄子说："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6]他指出语言不过

---

[1] 刘勰《文心雕龙·征圣》。

[2]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3] 《论语·雍也》。

[4] 《论语·卫灵公》。

[5] 李白《大鹏赋》。

[6] 《庄子·外物篇》。

是表情达意的工具，并不像孔子般强调文采。但庄子是一个斲轮老手，口中不说重视文采，他行文瑰玮多变化，笔调恢谐诡谲，所以他的思想借着他的汪洋辟阖的文章广泛传播。他是最懂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的道理的人。

梁朝著名的文章学家刘勰（465-502）说：“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7]“雕缛”指辞藻文采。又说：“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8]刘勰认为古代圣贤或经典作家的文章所以光采夺目，郁郁乎文哉，是因为他们长期精心揣摩文字，所以经典著作是由富丽的文采和高超的技巧所缀成的。刘勰主张写文章要讲究文采和技巧，他是“文采论”的积极提倡者。

今天，有些人写文章不重视文采，忽视技巧修养，只有抽象的理论，枯涩而概念化，欠缺生动的形象；或只有（一）、（二）、（三）、（四）、（五）的排列叙述，把材料简单而真接地铺写出来，呆板而少变化；没有学好修辞学，文字不生动，干巴巴，直统统，效果自然不好。茅盾先生有一段评论，对纠正我们目前的文风，也许是有帮助的。他说：“我们要掌握高度的技巧，既能以金钲羯鼓写风云变色的壮丽，也能用锦瑟银筝传花前月下的清雅；揭露敌人，须针针见血，歌颂英雄，应字字珠玑；文气既要能像横槊据鞍，千人辟易，也要能像岁时伏腊，欢腾田野；既要能横眉怒目写斗争的艰苦，也要能眉开眼笑，写胜利的欢乐；既要善于塑造人物，也要善于渲染气氛；既要能写江山之多娇，也要能写厂矿的雄伟。”[9]

我们提倡写文章要重视文采，是取决内容的需求，选择妥善精当的文辞，删去干瘪的词语、刻板的句式，弃伪从真，去浮存实，做到文质兼备的地步。如果一篇文章内容空疏，思想贫乏，而一味堆砌辞藻，雕龙绘凤，华而不实，脆而不坚，这只是文字游戏，于事无补，须知“雕琢自是文章病，奇险尤伤气骨多。”这样就会陷入靡丽夸饰的形式主义的泥坑，违背形式服务内容的原则。我们认为文章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关系是统一和谐的，必须是文质并举、质先文后。在我们来说，讲究文采是要求适合内容的完美的形式。文章之须要文采，犹如鹰隼须要一对强劲有力的翅膀，才能凌空高飞。文章思想宛如一艘帆船，要靠着文采的风力，才能越洋过海。

文章是反映客观事物组成篇章的书面语言。写文章是一种艰苦的创作，需要丰富的生活经验，广博的知识、高强的思维能力和高超的文字技巧。我们写文章要富有文采，除了用字要准确、生动、鲜明、遣词要达意外，更要注意造句精练，句式多变化，善于掌握各种修辞手法和表现技巧，并能提炼警句和秀句。多读经典著作和有定评的现代名著，有助于加强文章的文采和艺术性，并在长期的写作实践中，提高语文表现能力。

（编者按：作者现为华社研究中心研究员）

[7] 刘勰《文心雕龙·序志》。

[8] 刘勰《文心雕龙·情采》。

[9] 转引刘锡庆著《基础写作学》，页 264-265，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出版，1985。

占姆斯·杰克森著《垦殖民与冒险家》
Planters and Speculators by James Jackson
赖顺吉译

第九章

欧人咖啡园

在欧洲人对甘蔗种植产生兴趣之前，华人已经发掘了发展甘蔗业的潜能。咖啡则属于另一回事，它由欧人引入，而咖啡种植园在十九世纪末在马来亚的发展，几乎完全是靠欧人的努力。一般上，咖啡园是开在其他商用作物尚未占用的地区。此外，咖啡园是由新抵马的欧籍种植人开发经营，是他们进军马来亚农业的首项事业。咖啡在马来亚西海岸日益重要，在时间上与好几种其他出口作物同期。可是，这情况却未导致竞争，因为咖啡种植业出现在不同的地区，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不同类型的劳工，并且是属于另一群种植人的事业。事实上，咖啡种植是现代商用农业发展进入最后阶段的前阶段，是马来亚农业转入由大规模欧人企业支配控制的前奏。

咖啡种植先驱与早期咖啡园

十九世纪前半叶，好些人在海峡殖民地尝试开辟咖啡园，但都不成功。只有在该世纪的最后廿五年内，大规模咖啡种植才在马来半岛取得稳固的立足点。咖啡业成功在雪兰莪，森美兰，吡叻和柔佛等马来诸邦发展；在大片土地已种上其他高盈利作物，因而土地难求的海峡殖民地，咖啡从未占显著地位。咖啡种植的成功引入和扩充，并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中达到高峰期，是跟马来亚本身和锡兰、巴西及其他著名咖啡出产国的发展息息相关。

1869 年，Hemileia vastatrist 真菌侵入锡兰咖啡园，它蔓延得很快，造成很大程度的破坏，在短短二十年内，锡兰咖啡业完全给摧毁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好些锡兰种植人开始表现出有兴趣要在马来亚开辟新咖啡园。他们特别被吡叻，雪兰莪和双溪芙蓉所吸引，英国的保护在 1874 年伸入这些州，而州内有着大片看来很适合的处女地。一些人也对柔佛有兴趣，主要是因为容易从新加坡进入，以及州统治者对开发农业的积极态度。

人们对这些地区大规模种植咖啡的潜能产生兴趣，得归功当代官方和非官方观察家的著书立说，这些人异口同声地大谈这些地区恢复和平后从事农业种植的种种优点。例如，1874 年，贝治 (Birch) 在写关于吡叻州的报告时指出“在布波山 (Gunong Bubo) 丘陵东面的地段，相信会被证明是很适合种植咖啡。”

欧洲种植人有意在吡叻开辟咖啡园始自 1877 年，在接下来的两年中，多名来自锡兰的种植人造访吡叻，主要目的是寻找适合种植阿拉伯咖啡 (Coffea arabica) 的山地。阿拉伯咖啡是锡兰最广泛种植的品种，另有一些人则选种刚引进锡兰和马来亚的利比里亚咖啡 (Coffea liberica)。

---

[1] *Accounts and Papers*, 1874, Vol. XLV, C-1111, No. 65, 'Report of the Visit of the Colonial Secretary to the Native States, 1874'.

1878 年 8 月，克里斯地 (Christie) 和亨利赛德 (Handyside) 两位咖啡种植人造访近打区。同年较后时期，亨里赛德开始砍伐金宝河边布章马六甲山 (Gunong Bujang Malaka) 的山坡。这片地段受到他的青睐，“与其说是土质适合，不如说是因为山脚下的河道提供的交通便利”(图 30)。只是，到了 1879 年初，在吡叻州进行的试种咖啡的努力已证明是“严重的失败”，而亨利赛德对当地情况的无知是造成失败的主因。他雇用 20 名刚抵达的中国劳工，却没有通译员。通过这 20 名中国劳工，再加上几名马来人和土著，他砍伐了八至十英亩森林，时值雨量最高的雨季，根本就无法用火烧芭。到了 1879 年 1 月，他的孤癖，加上工人大半造反，使他陷入“心灵极度沮丧和绝望”。不久之后，他就把园地变卖给另一个到来探虚实的种植人伯西.连纳尔.史密特 (Percy Lionel Smith)。[2]

史密特在吡叻州试种咖啡，至少有一段时间证明是取得相当大的成功。1879 年，他到乌鲁仕林 (Ulu Slim) 格里汀河 (Sungai Geliting) 谷去。他“简直就是欢喜若狂，把当地的土质跟锡兰最佳咖啡种植区奥瓦 (Ouva) 相比美”。跟同期的英尼斯.米歇尔 (Innis Mitchell) 一道，史密特开始在这儿种植利比里亚咖啡和可可(图 30)。到了 1881 年，他的尝试取得了成绩，他在下来的一年报告说：“利比里亚咖啡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功”。[3]可是，史密特在八十年代较后期逝世，他所种的咖啡就没人照顾，园地开始荒芜。只有一小批在槟城邱苏清 (? Khoo Sow Chin)手下的华人在收采日益减少的咖啡子。[4]这回在吡叻开辟咖啡园的尝试宣告失败，主要原因是交通，园地在偏远的林中，很难进出。雷德波恩 (Rathborne) 事后孔明，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指史密特的成功希望微之又微，他“根本没有认识到交通是多么的艰难”。[5]

除了苏尔兹 (Schultze) 在卡比斯 (Gapis) 种植咖啡和金鸡纳的小园丘和政府所拥有的滑特卢园这两个位于江沙县的园丘外，直到十九世纪的八十年代都没有人尝试开辟新的咖啡园[6](图 30)。因此，尽管来自锡兰的种植人在十九世纪的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有意在吡叻州置地种植咖啡，却无法如愿。事实上，大多数有意来试种的是被英国政府的苛刻拨地条件所吓跑，他们泄气后，热诚磨失了，把注意力转投到其他方面去。尽管政府后来推行较优惠的土地条例和政策来吸引欧籍咖啡种植人，早期的种植人却有着要避开吡叻州的明显趋向。这情况到了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咖啡业大好时期才有所改变。[7]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来自锡兰的咖啡种植人被另一个可能选择所吸引，他们尝试进军另外两个马来保护邦，即雪兰莪和双溪芙蓉。双溪芙蓉在 1879 年开辟两个园丘，一个在晏斗，叫林山园 (Linsum Estate)，是汤姆斯.贺斯洛伯.希尔 (Thomas Heslop Hill) 的产业，种利比里亚咖啡，阿拉伯咖啡和可可。另一个在伯连文山(Gunong Brembum) 西坡高度 1,500 英尺的地段，称安多涅园 (Antoinette Estate)，开始时它

---

[2] H.W.C. Leech, 'About Kinta', *JSBRAS*, No. 4, 1879, 25-27. 1879 年身在吡叻的伊莎贝拉·比尔德 (Isabella Bird) 指出说“爱登堡高官的一个勤奋的孩子正在尝试到吡叻以外地区种咖啡，但却跟他的工人闹出问题，而正在‘想办法脱身’”。Isabella Bird, *The Golden Chersonese and the Way Thither*, London, 1883, 357.

[3] H.W.C. Leech, 'About Slim and Bernam', *JSBRAS*, No. 4, 1879, 36 and 39; *Accounts and Papers*, 1882, Vol. XLVI, C-3428, Encl. 1 in No. 5, *A.R. Perak, 1881*.

[4] *M.R.Lower Perak*, August 1889, *P.G.G.*, Vol. 2, 1889, No. 345, 767; *A.R. Batang Padang, 1889, P.G.G.*, Vol. 3, 1890, No. 168, 226; *M.R. Batang Padang*, August 1892, *P.G.G.*, Vol. 5, 1892, No. 373, 89.

[5] Rathborne, *Camping and Tramping in Malaya*, 175. 交通困难问题，以下事实为最佳写照：1892 年，运给这个园丘工作的华人劳工的供应品是先用船沿宋溪河载到格里汀河口，在那儿上岸后，再抬约两英里的路程；结果，一包米送到园丘去，价格高达$7.50。

[6] *Accounts and Papers*, 1884, Vol. LV, C-4192, Encl. 1 in No. 13, *A.R. Perak, 1882; A.R. Superintendent of Government Plantations, Perak, 1888, P.G.G.*, Vol. 2, 1889, No. 151, 354.

[7] See Swettenham, *British Malaya*, 237.

显然是凯依 (C.E. Kay) 的产业，种了阿拉伯咖啡，金鸡纳和茶(图 30)。[8]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安多涅园转入希尔和雷德波恩这两位马来亚咖啡种植先辈手中。[9]起初，这个园丘证明是取得绝对的成功。可是，在 1884 年初，它暂时置荒，沦为小丛林，原因显然是因为当局继续在拖延把印度劳工引入马来诸邦的立法。[10] 虽然伯连文山的园丘在 1885 年重开，森美兰日后欧人的咖啡种植地带却不在双溪芙蓉内陆的山丘，而是在芙蓉和海岸之间地势较低的起伏地段，尤其是沿着宁宜路。

欧人也在 1879 年尝试在雪兰莪开辟咖啡园，虽然说有关的园地很快就置荒。同期，瑞天咸 (Swettenham) 则指欧人在白沙罗路开辟的两个园丘已经荒芜，“究其原因，我唯有说那些受委托的管理人经验不足”。[11] 锡兰来客道那尔 (R. B. Downell) 较后时在雪兰莪州作出第一项成功尝试，他在 1881 年 2 月在吉隆坡郊外东北面取得一片 194 英亩的土地 (图 30)。他把这片园地称为卫尔德山园 (Weld Hill Estate)，实验种植利比里亚咖啡、茶、胡椒和可可。[12] 仅仅在几个月后，这个园丘转为希尔和雷德伯恩的产业，其首要作物是利比里亚咖啡。

1884 年，希尔和雷德伯恩在吉隆坡稍北的黑风洞置一片地，种小量利比里亚咖啡和茶；次年，他们再取得吉隆坡东北，靠近雪彭边界云顶比带 (Ginting Bidai) 山坡的 2,500 英亩土地，种植阿拉伯咖啡 (图 30)。这项在巴生河上游淡江地带种植咖啡的尝试很快就宣告失败。园地“在可取得任何成绩前已经是相当荒芜”，土地在 1890 年就还回给政府。政府曾拨款在这个园丘建马路，由希尔和雷德伯恩承包工程。虽然希尔指政府没有维修马路而造成园丘置荒，实际原因可能还包括其他因素，包括很难把工人留在“离吉隆坡约 23 英里丛林中”的园丘。[13] 虽然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巴生区开辟了几个欧人胡椒园，雪兰莪州内相对小规模的咖啡种植活动保持集中在吉隆坡镇的邻近地带。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咖啡的试种和咖啡园的开辟并不只限于马来保护邦，来自锡兰的那位咖啡种植的行家汤姆斯.贺斯洛.希尔在 1878 年末及 1879 年初造访柔佛三个月，目的是调查在该州发展农业的可行性，他特别探测了布来山 (Gunong Pulai)，班底山 (Gunong Panti)，布鲁木山 (Gunong Blumut) 和文达哈山 (Gunong Muntahak) 带的山地。[14]

利比里亚咖啡是“在 1876 年 11 月从盆中”移殖到柔佛的土地栽种。1879 年，希尔在柔佛海峡的乌宾岛开辟一个咖啡园。[15] 柔佛的统治者很快的就认识到鼓励欧籍种植人进入州内所能带来的好处，因而表达说希望“柔佛将成为重要的咖啡生产中心”。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柔佛开辟多个咖啡园，一些如德尤 (Dew) 和麦肯兹 (Mekenzie) 在班台山 (GunongPantai) 开辟的园丘种阿拉伯咖啡，但大多数园丘却选种利比里亚咖啡，如布来山的先驱园 (Pioneer Estate) 和地不佬 (Tebrau) 的卡索勿德园 (Castle-

---

[8] *Accounts and Papers*, 1881, Vol. LXV, C-3095, Encl. 3, in No. 1, *A.R. Sungei Ujong*, 1879 and No. 4, Weld to Kimberley, August 1880, *Report of a Tour Through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Protected Malay States and Kedah.*

[9]希尔是在 1880 年 7 月获得双溪芙蓉拿督格拉纳发给伯连文山地段的农业租契。N.S.S.F, Land 4012/1905。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希尔和雷德波恩也开辟西廖园 (Siliau Estate) 和取得在双溪芙蓉的 560 英亩的地段，取名热拉园 (Jerah Estate)。热拉园的开发工作从未展开。*N.S.S.F., Land 1471/92 and Land 1472/92.*

[10] *A.R. Sungei Ujong, 1884, S.S.G.G.*, 1885, No. 171, 392.

[11] *Accounts and Papers*, 1881, Vol. LXV, C-3095, Encl. 1 in No. 2, *Audit Report on the Selangor Accounts, 1879.*

[12] *Selangor Journal*, Vol. 1 No. 18, 19 May 1893, 292. 很多年纪较大的吉隆坡华人还继续把卫尔德山称为咖啡山。

[13] *A.R. Selangor*, 1890, Appendix F; *Selangor Journal*, Vol. 1 No. 15, 7 April 1893, 238.⊖

[14] T.H. Hill, *Reports on Johore*, 1879.

[15] Ibid. 16.

wood Estate)。[16]

柔佛早期的咖啡园都在南部，一般离柔佛海峡最多只是 20 英里。柔佛之受青睐，主要在于它接近新加坡，再加上人们相信，在开发了大片土地后，苏丹将“就预期中的项目，如道路的建筑，提供一切合理的协助”。可以肯定的是，柔佛拨地的条件，比起马来保护邦，并不显得特别优惠。[17]

柔佛欧人咖啡种植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日益重要。到了 1888 年，估计有 1,500 英亩的欧人园丘种上利比里亚咖啡，而种植面积据说每年都在增加；有几个华人也在柔南种植小片的咖啡园。[18] 这时，阿拉伯咖啡的种植面积剧降，“原因是土质差和不适合，土地高度不够（只是几百英尺），劳工供应困难和气候不宜”。[19] 因此，种植人都专种利比里亚咖啡，在新山和巴株巴辖几乎清一色是这品种。

伦敦是马来亚欧人咖啡生产者的属意市场，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伦敦咖啡的价格猛降，1885 年的价格只是 1876 年的四成。这项发展打击了欧人向马来亚丛林进一步开发园丘的雄心。在 1885 和 1888 年之间，欧人未在马来亚开辟任何新咖啡园，虽然格拉默.阿宾斯顿爵士 (Sir Graeme Elphinstone) 曾在 1886 年向吡叻政府买下部份种着咖啡的滑特卢园。[20]

市场情况改善，配合早期种植人的成功经验和政府日益关注及鼓励欧人开辟园丘，促成欧人咖啡种植业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取得显著的扩展，尤其是在雪兰莪。同期间，吡叻开辟了一个新园丘，但在森美兰却没有新的进展。这时，马六甲有些华人种植利比里亚咖啡，通常是种在置荒的木薯地。[21]

1888 年，作为赏识希尔在带动欧人种植园农业的贡献的回馈，政府在江沙县拨给他一片面积 10,000 英亩的土地。这片地成了甘文宁 (Kemuning) 园，其中部份地段种了利比里亚咖啡和小量的胡椒[22]（图 30）。这个拨地给希尔的作法，反映出马来亚的政府官员日益希望能吸引更多的欧籍种植人。因为，在 1887 年，总督费德力克.卫尔德爵士 (Sir Frederik Weld) 批准把公款借给希尔，让他能发展这片新地段。卫尔德的继任者塞西尔.史密特爵士 (Sir Cecil Smith) 显然是准备把相同的特惠扩充到其他人身上。但是，一直到下一个年代为止，吡叻州都没有开辟任何新咖啡园。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欧人咖啡种植最明显的扩充是在雪兰莪。1888 年，多格尔 (Dougal)，汤恩比 (Toynbee) 和柯里 (Currie) 在吉隆坡东北文良港谷取得面积达 1,500 英亩的三片土地，分别命名为贺桑登园 (Hawthornden)，林肯园 (Lincoln) 和罗斯林园 (Roslin)。下一年，R.S.和 C. 梅克勒 (Meikle) 在附近开辟沃地本德园 (Wardieburn)（图 30）。所有这些园丘的主要作物都是利比里亚咖啡，虽然也种上小量的胡椒。1889 年，哈登巴哈 (Huttenbach) 取得吉隆坡附近两片已经种了利比里亚咖啡的地段，其中一片是从一名前土地局官员，另一片是从一群爪哇人手中取得。这两片地分别取名雪兰莪园和巴都园(Batu)。一年后，在南印度有种咖啡经验的格拉斯福特 (Glassford) 兄弟在同一地

---

[16] Winstedt, 'History of Johore', 117; *S.F.P.*, N.S., Vol. 2 No. 5, 31 January 1885; *S.F.P.*, N.S., Vol. 1 No. 12, 20 December 1884 and Vol. 3 No. 3, 18 July 1885.

[17] Hill, op. cit. 3. 在柔佛，种植人可申请面积总合达 1,000 英亩的森林地，分成每片少过 300 英亩的各个地段，租期 99 年。Ibid. 17.

[18] *S.F.P.*, 3rd Series, No. 58, 31 August 1888.

[19] Rathborne, op. cit. 15-16.

[20] *A.R. Superintendent of Government Plantations, Perak, 1888, P.G.G.*, Vol. 2, 1889, No. 151, 354.

[21] 例如，朱云逢 (? Chee Hoon Bong) 和朱林逢 (? Chee Lim Bong) 在巴都伯连当种咖啡，陈昆源 (? Tan Hun Guan) 在榴连东雅的前木薯园有一个“很棒的”利比里亚咖啡园。*Malacca Weekly Chronicle*, Vol. 1 No. 1, 7 January 1888 and Vol. 1 No. 6, 11 February 1888.

[22] *A.R. Superintendent of Government Plantations, Perak, 1888, P.G.G.*, Vol. 2, 1889, No. 151, 356.

区开辟新园丘，称山峰园 (The Mount)。[23] 到1890年，雪兰莪开辟了十个欧人咖啡园，虽然其中云顶比带的园丘已经荒芜和土地还回给政府。这些园丘仅限于吉隆坡邻近周遭，特别是鹅唛和文良港谷一带（图30)。各个园地的面积相信不太可能超过350英亩。

这一个欧人咖啡园明显集中在吉隆坡市之北和东北的现象，有必要特别加以说明。显然，园址的选择必须考虑到从附近城镇是否能进入到园里，也要兼顾到是否方便的问题。在雪兰莪州内可用的道路寥寥无几的当年，交通便利无疑是很重要的考虑因素。但是，如果注意到这些园主也兼干其他事业，特别是如希尔、雷德波恩和汤恩比那样承包建造马路和铁路，就可看出这选择其实是有更新的特殊意义。显然，他们选择园址，是方便他们住在或靠近吉隆坡，可兼顾咖啡园和维持他们的其他生意。[24] 此外，在选择这些地点时，他们也考虑到那时的采矿活动是集中在市镇的东部和南部较平坦的地区，由安邦到八打灵。假如他们选择北部和东北的山丘地段，就不需要担心采矿和种植之间会产生利益的竞争。最后，卫尔德山园所取得的成功，也为在相同地带设立新咖啡园提供强大的动力。

拓荒阶段的一般特征

在进入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昌盛期前，或许应该先来探讨拓荒时代建立起马来亚咖啡种植业的一些特征。必须谨记的重要点是，利比里亚咖啡的种植“还处于实验性阶段，... 根本还无法确定它是否能适应土壤和气候，或是不是会象锡兰一样，最后失败告终”。[25]锡兰的咖啡园原本是种特别适合山地的阿拉伯咖啡。可是，当虫类袭击园丘时，所摧毁的是阿拉伯咖啡树。1872年，约瑟.福克爵士 (Sir Joseph Hooker) 转种相信比较能抵抗真菌的利比里亚种。这个品种在十九世纪的八十年代在锡兰进行试种。虽然有一种说法指是一位名叫里奥波德.查斯里奥 (Leopold Es. Chasseraiu) 的法国人把利比里亚品种引入马来亚，一般上却是归功给被人们称为“马来亚咖啡种植之父”的利奥纳德.威雷 (Leonald Wray)。不管功劳谁属，利比里亚咖啡种是1875年抵马来亚。[26]

以上描述的情况解释为什么最初期的欧人咖啡园会种上不同种类的作物。他们在锡兰的惨痛经验，加上他们对当地情形认识有限，造成大多数种植人在开辟新园地时都得小心翼翼。一些在高地园丘种阿拉伯咖啡，但好多其他人却选择对疾病有免疫能力的利比里亚种。他们都在新园丘内的部份土地种其他作物，如可可、茶、金鸡纳和胡椒，以便当锡兰的经验再度降临的话，将有其他东西作为依靠。

利比里亚咖啡源自非洲西岸的低地区，比较适合在马来亚的低原种植。利比里亚种的产量比阿拉伯种为低，所生产的咖啡子“很大粒，在要求较小咖啡子的市场中很难讨好；而其外形参差又相当大”，比较上也不那么香浓。[27] 无论如何，到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马来亚的咖啡业已经越来越依赖利比里亚种，其种植其时已取得成果，而阿拉伯种则由于种种原因，种植量一直下降。主要种植阿拉伯种咖啡的锡兰种植人的经验，一般上都倾向选择内陆的山地来开辟咖啡园，直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为止，欧人都不曾在西马来亚的沿岸平原开辟大片的咖啡园 （图30及31)。

最后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华人对咖啡种植表现了非常有限的兴趣。抛开豆蔻和丁香不谈，

---

[23] *A.R. Selangor, 1889, 18; Selangor Journal*, Vol. 1 No. 15, 17 April 1893, 238-9.

[24] See for example 'Interviews with Celebrities-F.A. Toynbee', *Selangor Journal*, Vol. 3 No. 13, 8 March 1895-209.

[25] Rathborne, op. cit. 46.

[26] J. de Morgan, 'Historique de la Presqu'ile Malaise', footnote 1, page 15, in J. de Morgan, *Exploration dans la Presqu'ile Malaise (Royaumes de Perak et de Patani)*, Paris, 1886; S.F.P., 3rd Series, No. 489, 8 December 1896.

[27] Burkill, *Dictionary of the Economic Products of the Malay Peninsula*, Vol. 1, 624 and 627.

在马来亚园丘农业发展史上，其早期发展未涉及华人者首推咖啡。促成这种情况的一个原因是华籍种植人已经投身种植好几种利润不错的作物。再加上，咖啡种植需投下相当大笔的资金，至少要等上五年才开始有很少的回收，跟当时华人农民和融资商人所属意的作物有着根本上的差别。[28]那就是说，咖啡种植是长期性投资，而华人也还不确定它是否真的会带来比现有作物更高的利润。木薯、甘蜜，甚至甘蔗种植涉及的短期投资，或可迅速回收，或可迅速改种其他作物，比较适合十九世纪马来亚华人融资方式的要求。从长远来看，华人对咖啡种植的谨慎态度证明是对他们有利的。

拓荒阶段的劳工问题

前面已经指出政府官员日益希望能吸引更多欧籍种植人前来开辟园丘。可是，单单简化拔地条件还不够，投身其中的种植人也需确保劳工的供应。咖啡种植的劳工相对密集，早期雪兰莪的园丘，每 100 英亩需要四十至六十位劳工。[29]利比里亚咖啡树的根相当浅，因此得跟杂草竞争，园地因而必需是寸草不生。其他需要大量劳动力的包括剪枝和收割。咖啡子用手工采集，虽然主要成熟期是五月至六月及十二月至二月，全年却一直都有较小量的咖啡子成熟。

瑞天咸点出了种植人在这段拓荒期所面对的劳工问题。他在 1889 年指出：

"...当地原住民不太致力于工作，简直就是拒绝以任何种植人可接受的条件受雇。矿场把华人吸引去了。华人宁愿去冒风险，不愿在园丘领稳定酬劳，安稳地工作。种植人可依赖的劳动力，唯一的机会就剩下南印度的居民，唯却必须依据某些条例，花上几个月的时间，才能把他们引进来。"[30]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时，抵马印度劳工的人数总是不足够；他们作为劳工的素质通常都很差，而招募和运载来马费用却很重。更何况，咖啡种植人必须跟其他大规模的雇主，尤其是政府竞争那数目有限的印度劳工。

起初，对于印度劳工短缺，好多先驱咖啡种植人尝试以雇用马来人，爪哇人或华人来解决。于是，柔佛卡索勿德园是雇爪哇工人开辟，保罗在 1882 年双溪芙蓉的报告指种植人已作巨大的努力，以"朝向雇用马来劳工，而有大量的劳工正从附近地区到来寻找工作，或在班黛，或在晏斗"。[31]

无论如何，由于大多数咖啡种植人是来自锡兰，他们无疑比较喜欢雇用淡米尔劳工，随着更多土地种上咖啡树开始结果，劳工短缺问题更形严重。事实上，劳工短缺是阻止欧籍种植人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进一步扩充的重要因素。伯连文山园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关闭，就归咎于劳工问题，而雪兰莪的希尔和雷德波恩园丘的作物"在 1884，1885，1886 和 1887 年因为找不到劳工而告完蛋。"虽然林山园在 1888 年扩充，"寻求劳工的难题却阻碍了更大规模的扩充"，在 1890 年，甘文宁园的部份土地"因找不到劳工而暂时置荒"。[32]

一些官员认为劳工短缺的说法，只不过是土地垦殖者无法在固定时间内把拨给他们的土地种植到所需的面积，才提出来作为借口。可是，以上提出的实例并不是个别的个案，而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扩充生产是直接跟劳工状况的改善有关。

（未完）

---

[28] 'Liberian Coffee', *Kew Bulletin*, No. 47, November 1890, 248; 伊莎贝拉·比尔德估计：在马来亚开辟咖啡园的资本介于£2,500 至£3,500。Bird, op. cit. 248.

[29] J.C. Jackson, 'Population Changes in Selangor State', 47.

[30] *A.R. Perak, 1889, P.G.G.*, Vol. 3, 1890, 468.

[31] *S.F.P.*, N.S., Vol. 1 No. 12, 20 December 1884; *Accounts and Papers*, 1884, Vol. LV, C-4192, Encl. 3 in No. 13, *A.R. Sungei Ujong, 1882.*

[32] 'Liberian Coffee in the Malay Native State', *Kew Bulletin*, No. 71, November 1892, 279; *A.R. Sungei Ujong, 1889, S.S.G.G.*, 1889, No. 357, 1091; *M.R. Kuala Kangsar*, January 1891, P.G.G., Vol. 4, 1891, No. 87, 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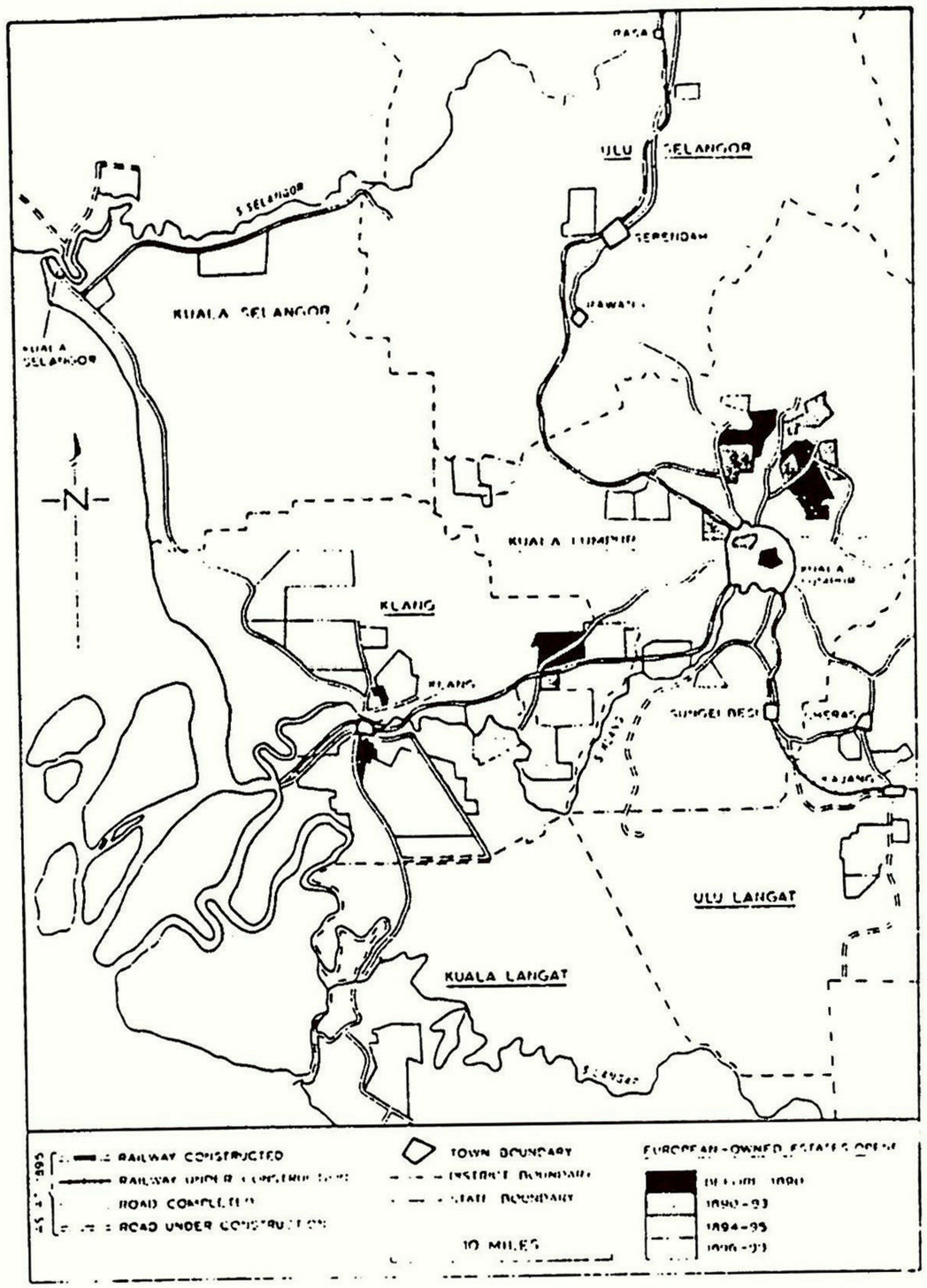


FIG. 31. EXTENSION OF EUROPEAN ESTATE OWNERSHIP IN SELANGOR, 1890–1899

Based on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official repor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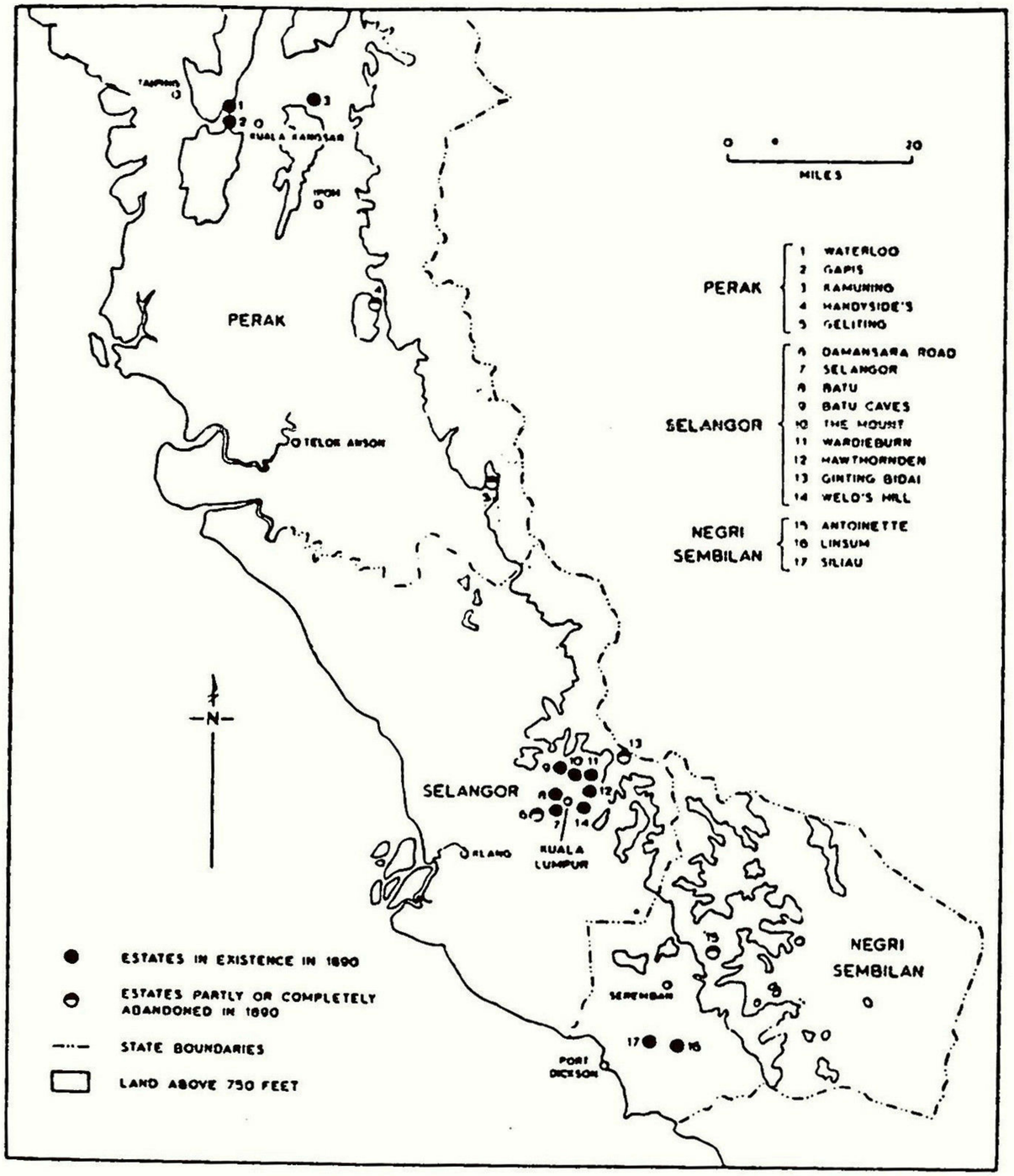


FIG. 30. PIONEER COFFEE ESTATES IN THE WESTERN MALAY STATES, 1877–90

Based on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official reports.

时局省思

陈亚才

这里有个时事问答比赛的题目："请问安华为何被革除副首相和财政部长职位，以及被巫统开除党籍?"答案的选择是:

(a) 涉及出卖国家情报;

.(b) 涉及贪污 6 千万;

(c) 涉及同性恋及 / 或性丑闻;

(d) 在治国方针及经济的政策方面，与首相有歧见;

(e) 锋芒太露，功高震主;

(f) 有夺权的野心;

(g) 最高层次阴谋的牺牲者;

(h) 《50 个安华不能担任首相的理由》一书的诬陷。

请问答案是什么? 单选? 复选? 还是"以上皆非"?

这其中或许夹杂了流言、指控和证据，恐怕只有当事人和相关人士最明了。然而，普罗大众应该做何判断呢?

"领袖可来可去"、"没有任何人是不能被取代的"等等都是一般人耳熟能详的话语。就法治的观点而言，人民有权利知道安华被革除两大内阁要职的真正原因。这不仅仅是内阁的"家务事"，而是影响国家的大事。从开始的种种猜测，到最近突出"安华有不道德的行为"，显然已经有一定的差异。

15 个民间组织、国民醒觉运动、回教青年运动、华总青等团体曾发表文告或通过议案，吁请首相公布其重大决定的理由。在一片声浪中，这些团体的呼吁显得声音过于微弱，就维护法治精神具有特定的意义。

倘若安华涉嫌不道德的行为，他有必要像美国克林顿总统一样上法庭接受法律程序的考验。与其让谣言和指控满天飞，不如通过法律程序去厘清流言、指控和证据。

关于权力

当"权力"和"政治"挂钩时，一般人对权力的看法往往会偏向狭义的界说，也就是强调权力的强制性(Coercion)。这种权力所反映的结构或社会关系就是建立在"命令——服从"的基础上。

政治权力的强制性，自然地将社会成员截然二分为有权力的少数人，及没有权力的多数人；一方是行使权力，颁布号令，另一方则服从命令，顺应指示。这种权力关系的基本特征就是由上而下的单向、直线的权力运作，欠缺一种良性互动和制衡的机制。

在有权力的一方，成员之间相互靠拢，在权力层峰中又再复"命令——服从"的模式。

然而，"强制性"是权力运作的唯一形式吗?

表态主义

这是柯嘉逊博士创造的名词。最近朝野政党和一些华团对这个名词以行动作了最佳的诠

释，同时也把表态主义的功能发挥的淋漓尽致。

每当某项争论或冲突表面化后，团体的成员（尤其是担任要职者）都必须表明自己站在哪一边，否则只好自我孤立或被孤立。

表明立场原本无可厚非，因为每个人都对有关的事项或争议具有本身的看法和判断。问题的症结在于这种表态的要求往往过度简化到“赞成——反对”、“支持——不支持”的非此则彼的二元对立，容不下第三种声音，也无法对赞成和反对有更进一步的诠释和讨论。

过度突出简化的表态，容易陷入僵化和盲从，当然不排除投机的心理，久而久之形成一种“想一想要站在哪一边比较好”的赌注。

表态主义的最大好处是带来行事的便利，一个口令一个动作，步伐一致，枪口一致，甚至可以凭借庞大的声势和势力来合理化一切的所作所为。但其最大致命伤是往往扼杀百花齐放和言论多元的可能性，强制的表态更加突显集权的色彩；如果再策略性的配合应用一些“大帽子”，例如“爱国——反国家”、“爱党——反党”、“团结——搞破坏”等等，人性不被扭曲者几稀。

省思

不论个人、团体或国家，利用甚么手段来达到甚么目的，固然有其特定的思考和用心；领袖人物在特定的时间和状况固然有所更递，然而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权力运作的模式和权力转移的游戏规则，是一套大家认可的原则和伦理，还是纯粹只是成王败寇的丛林规则？对于民主法治的追求，我们是渐行、渐远、渐无声？还是我们越来越靠近理想国？

（星洲日报 13/9/98）



华研出版的书刊。

文摘特区



拿督斯里安华依布拉欣

安华被革职

声明全文

首相署发表有关拿督斯里安华被革职的全文如下：

“谨此通告：尊贵的拿督斯里安华依布拉欣已被革除副首相和财政部长职位，以及其他与副首相和财政部长相关的职位。

这项革职于今日，即 1998 年 9 月 2 日下午 5 时 30 分起生效。

最高元首已获得通知这项革职的通告。”

安华被革职

首相署昨日（2/9/98）宣布，拿督斯里安华已经被革除副首相与财政部长职位，但是是否保留巫统署理主席则尚待进一步证实。至此，争议多时的副首相辞职事终告尘埃落定。对于副首相被革职的背景起源，以及掺杂其间的诸多是非混淆的传言，诚然令人感到世事无常，特别是若干方面加诸于安华个人的评论，更令人深感政治现实的无奈。

首相马哈迪医生昨日在大马广播电视台接受访问后受记者询问时说，他与安华的关系良好，并说若有好理由才会接受安华的辞职。事实上，安华被革职的确令人感到吃惊，但从整个事件演变看来，安华被革职似乎又是预料中事。

安华于1993年10月接替嘉化峇峇出任副首相，这期间历经党选、全国大选与经济危机，安华始终负起辅佐首相，巩固政府领导中心的艰巨任务，使巫统及政府安然度过重重难关。当然，这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功劳，是全民共同智慧与努力的结果，是在首相马哈迪医生正确而有力的领导下所获致的，也是巫统党内各领袖团结一致所致的。但是如果没有安华坚定的支持，这些党国事务是否能顺利化解，也不无疑问。

政绩纪录斑斑可考，安华过去出任副首相5年来对国家的贡献，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

若说安华是一个不受重视的领袖，在巫统其他领袖崛起以及在步入一个关健时期后获得让位，则征诸事实，也不全然是如此。在面对这次金融危机时刻，始终未曾听说安华有主动求去的传闻，而首相马哈迪医生昨日才否认安华呈辞的传闻，可见安华5年来都获得首相的信任，而本身也未有中途萌去之心。当然，在党内派系矛盾日益表面化，此及安华与马哈迪医生对经济问题处理看法似乎未完全一致的情况下，安华难免也要正视政治观实。实际上，中行正副总裁辞职对安华来说是一个颇大的冲击，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安华已有时不我予之感。接著，安华辞去或被革除副首相职显然已在许多人的预料之中。接下来，谁是安华继承人则备受注目。

无可讳言，安华与马哈迪医生对若干政务处理看法的不完全一致，一直是引起议论的焦点，特别国外媒体经常借故渲染两人之间的不和，一些人甚至认为他不是马哈迪医生的适当接班人；尽管，安华的学历与思想都符合作为接班人的条件，但因主观的看法并未及时随客观环境的变化而调整，而致中途被迫离开这一辆跨世纪列车。至于安华是否还有机会再挤上接班梯队，这要看他个人的造化了。在这个经济衰退时期，如果安华一旦卸任即投闲置散，则国家流失长才固然可惜，而巫统流派之争难平则事关重大。

1997年10月29日，安华在第十四届全国华人文化节开幕礼上，特别以华语发言，引述和解释孔子的《论语》名句“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劝勉人民以此作为提高道德准则和克服经济难题的挑战，意义深长。

在政治转型进程中，风潮所至，形势逼人，人世间之是非，在党争与政治歧见下，往往晦而不彰。惟历史自有公道，只要自己肯牺牲、奉献、亦无愧于国家人民。安华之被革职亦可从这个角度解读。

（星洲日报 3/9/1998）

安华终于被革职

拿督斯里安华依布拉欣被革除副首相兼财政部部长之职，虽然来得有点突然，不过却不令人感到震惊，因为有关安华可能辞职的消息，最近甚嚣尘上，虚虚实实，在经济风暴的阴霾中，国人对内阁的重组或部长的调动，心理上早已有所准备。

首相马哈迪医生前日(1/9/98)在国家银行宣布实施严厉外汇管制措施后，针对国行前总裁阿末顿辞职表明，如果国行总裁的经济决策不能和政府一致，就须辞职，政府绝对不能让国行独断独行，国家经济决策是由政府决定的。首相的这一段谈话，加上他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如果安华“提出很好的理由他将会接受其辞职”的表态，已经是安华可能不再担任副首相兼财长的前奏。

最近的各种迹象和传言显示，安华已经不是首相的接班人，已成为“第3号人物”，其地位已被出任首相署特别任务部部长的敦达因所取代。自达因出掌国家经济行动理事会执行主任负起拯救国家经济的重任以来，安华的实际权力已经旁落，对很多经济事务只扮演陪衬的角色，显示出他对振兴国家经济的主张和达因相左。虽然安华前日对国行宣布实行新外汇管制措施的决定表示全力支持，不过却难以掩饰无奈的神情。

安华在1982年3月29日加入巫统时表明，他选择加入巫统，因为巫统让他有继续斗争的空间，而且他也支持首相和他所领导的政党。经过11年的积极斗争和活动，安华终于在1993年巫统党选时，打着“宏愿队伍”的鲜明旗帜当选为巫统党署理主席，顺理成章地出任副首相之职。马哈迪首相本人在巫统会议和其他场合上也多次表明，安华是他属意的首相接班人。

对拯救经济危机持有不同方案，是对策和经济思想的分歧，但实际上来说，如果“三头马车”的其中一头朝不同方向而走，或不愿意同步而进，车子必将翻覆，倒不如让走不同方向的马脱缰，改成“双头马车”或以后再增添为三头或四头马车经续前进，拉动经济复苏的车子朝同一个方向前进。

国家银行前日宣布实施严厉的外汇管制措施，以隔离越来越坏的环球经济体系对我国经济所造成的不利影响。首相拿督斯里马哈迪医生随后在电视接受访谈时宣称，我国将制定市场所能支持的固定货币汇率，在过渡时期，零吉的币值将由市场因素决定。新的管制措施是在于稳定汇率，使商界知道实际的物价，而不必受上下波动的汇率影响。新措施实施之后，马币将不能在国外交易而只能在国内交易，因此可免去受狙击时要保卫马币的做法。

政府实施严厉的货币措施，主要是在于迫使留在海外的马币回归，同时也阻止投机炒家积累巨额马币伺机炒作，并减低短期资金流动对国内经济所造成的打击。根据马哈迪首相的估计，目前存放在国外银行的马币大约有250亿零吉，如果这笔巨款能在短期回流，对拯救国家经济将会发挥巨大的作用。

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博士(Paul Krugman)在马哈迪宣布货币管制措施后立即发表一封《致马哈迪首相的公开信》，对首相的果敢措施表示激赏，并希望新措施能为我国带来转机。不过，作为一位经济学家，他还是三句不离本行地提醒说，这只能是暂时措施，在于争取经济复苏的喘息空间，不宜使大马经济长期脱离国际资金市场。

安华被革职，其中原因仍然有待首相公布，不过，就治理国家经济问题而言，或许是统一国家经济策略的转捩点。我们可以企望，首相委任的新副手和财长，必然是与马哈迪政府的立场一致，同时会在政局稳定下来后汇集群力，率领全民迈上振兴经济的坦途。

(南洋商报 3/9/98)

安华失足落马

政坛10年最大地震

郑丁贤

安华曾经形容他和马哈迪的关系说，“他（马哈迪）善于骑马，我喜欢水上摩哆，不过，我们仍然有其它共同点。”

然而，安华为了学骑马，结果摔了一跤，休养了几个星期。上星期他为二项骑术活动主持开幕时更说，“我虽然骑得慢，但是我会坚持下去。”

但是，安华的坚持并没有持续多久，3次否认“谣言”之后，“谣言”成为事实，安华终于跌下马来。

与马哈迪关系非比寻常

马哈迪和安华的关系非比寻常。从1982年安华被马哈迪赏识，从回教青年运动中拉拢进入政府，马哈迪与安华就有如政治上的师徒，乃至于父子的关系。前任副首相慕沙希淡在1988年辞职，2M领导解组之后，安华的地位更迅速上升，虽然他当时不是副首相，但其影响力超过当时的副首相嘉化峇峇，后者被认为只是过渡时期的人物。

长期以来，国内外政治观察家都认为马哈迪和安华是绝佳的搭配。也是世代交接的最佳组合。72岁的马哈迪，有着第三世界传统政治领袖的特质，包括坚强的战斗意志、敢怒敢言的作风、反帝反殖的理念。马哈迪在80年代末期加速大马的现代化步伐，改变经济结构，稳定政治及社会秩序，带领大马来到先进国的门槛。

而51岁的安华，具有国际视野，政治性格温和，兼具哲学家的谈吐，因而被视为21世纪智慧型的政治人物。

虽然两人的政治风格不同，但是，这被视为一种互补作用。马哈迪的刚强，需要安华的温和来协调；而安华的委婉，需要马哈迪的推动。如果将马哈迪形容为大马的今日，则安华则是大马的明天。

可是，这种被美化的功能角色，在现实中未能充分实现。马哈迪和安华经过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的蜜月阶段，往后逐渐显现裂痕。

1993年巫统改选，嘉化峇峇的署理主席职位，受到安华的挑战。马哈迪原本希望党的职位不要出现变动，因此倾向于维持现状。但是，以安华为首的“宏愿队伍”认为机不可失，而执意上阵，结果造成嘉化峇峇黯然引退，间接的，也让人感觉巫统少壮派已经自成一个阵营，对党内元老形成压力。

党选之后安华接任副首相，在巫统和政府的职权均扩大，而从当时起，就传出马哈迪和安华产生矛盾的传言。尽管两人不断澄清，但是并未真正消除国内外人士的种种臆测。

安华从担任巫统副主席到署理主席期间，厚植了基层力量，更在党内高层安置了许多亲信。自从“宏愿队伍”在党选中取得胜利后，这些支持者对“更上一层楼”充满雄心，对党内元老形成强大压力，也加剧了马哈迪支持者和安华支

持者的矛盾。

去年年中马哈迪出国渡假两个月，安华被委任代首相，许多观察家认为这是安华接班的一种部署。也显示马哈迪对安华的信任。

经济风暴使关系产生变化

但是，接下来发生的经济风暴，使两人的关系产生重大变化。马哈迪对西方投机客和金融体制严厉指责的同时，也表示将限制大马的货币交易。这番谈话轰动国际金融社会，也招来梭罗等人的抨击。

安华隔天在香港出席世界银行的会议，很婉转地为大马的立场作出解释。他一方面表示马哈迪的意见值得重视和研究，另一方面则表示大马不会限制货币交易。

从当时起，两人对克服经济问题的看法明显出现分歧。安华倾向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方案，认为必须实行紧缩政策，包括停止大型工程、提高利率、克服赤字；而马哈迪则要纾解企业界困境，主张放松资金、降低利率和恢复部份大型工程。

在6月的巫统大会，被视为安华阵营的巫青团团长阿末查希举起反对朋党和裙带的旗帜，结果招来马哈迪强力的反击。数天之后，敦达因入阁，被委任为应付当前经济问题的特别任务部长。此后，一连串的发展，让人感觉安华的权力被削弱，包括经济政策转向，两家马来报章总编辑和电视台高层易人等等，乃至安华辞职的传言甚嚣尘上。

直到上星期，安华所信任的中央银行正副总裁阿末顿和邝荣柏呈辞，显示马哈迪和安华的政策理念，已经未能协调，两人的关系，也已经无法修补。

马哈迪宣布管制马币的措施，显示他已经完全控制了局面，而安华虽然身居副首相兼财长职，不过，在重大的财经政策中，他已经失去决策权力。

面对大马历来最严重的经济困境，马哈迪所要的，是能够和他完全配合的队伍；安华并不能够做到这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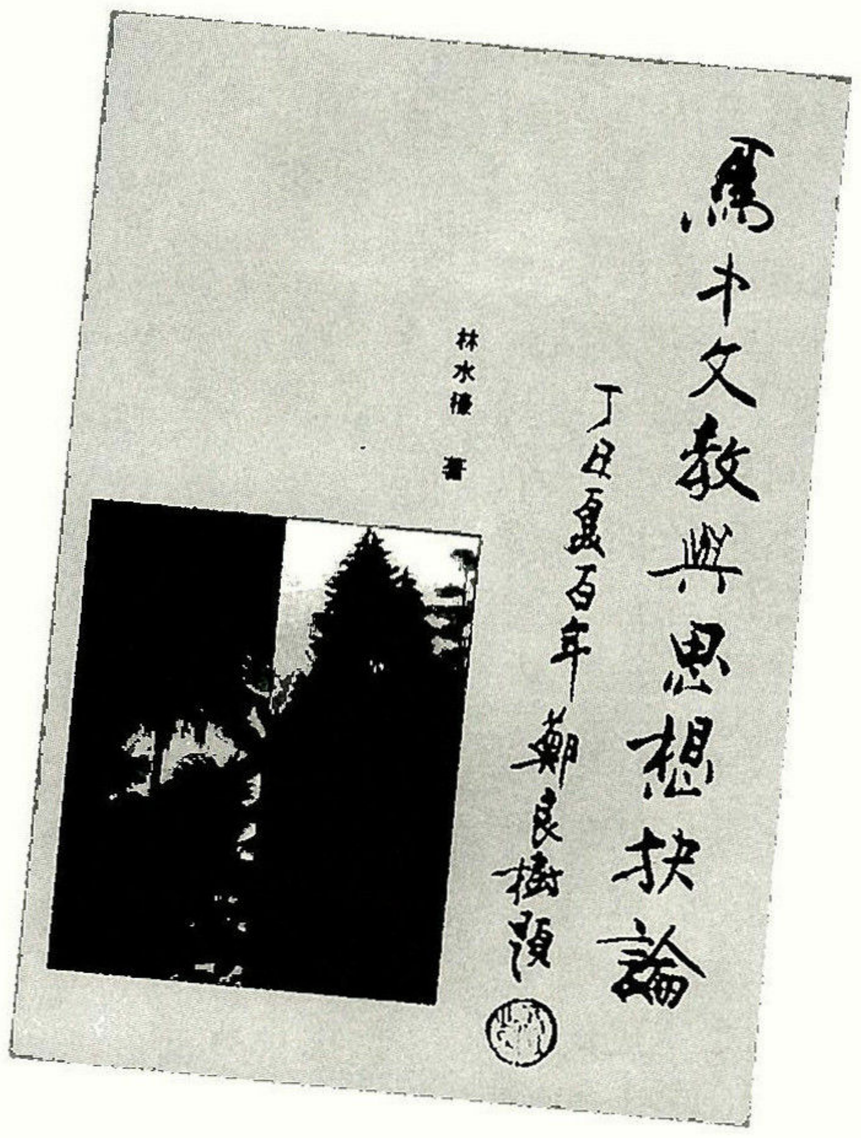
过去10年来由马哈迪和安华联合主导的大马政治生态，从此改观。两人是平静分手，或是互相对抗以见高低，将由日后发展决定。

(星洲日报 3/9/98)

马中文教与思想抉论

林水檬著

每册 RM14.00
会员折扣 30%



欢迎邮购请联络：

华社研究中心(华研) (271806-T)
HUAZI RESOURCE & RESEARCH CENTRE BHD.
No.1, Jalan Maharajalela, 50150 Kuala Lumpur, Malaysia.
Tel:03-2734035 Fax:603-2734037
E-mail: huayan@huayan.net.my

安华二度致函首相

针对诽谤作出解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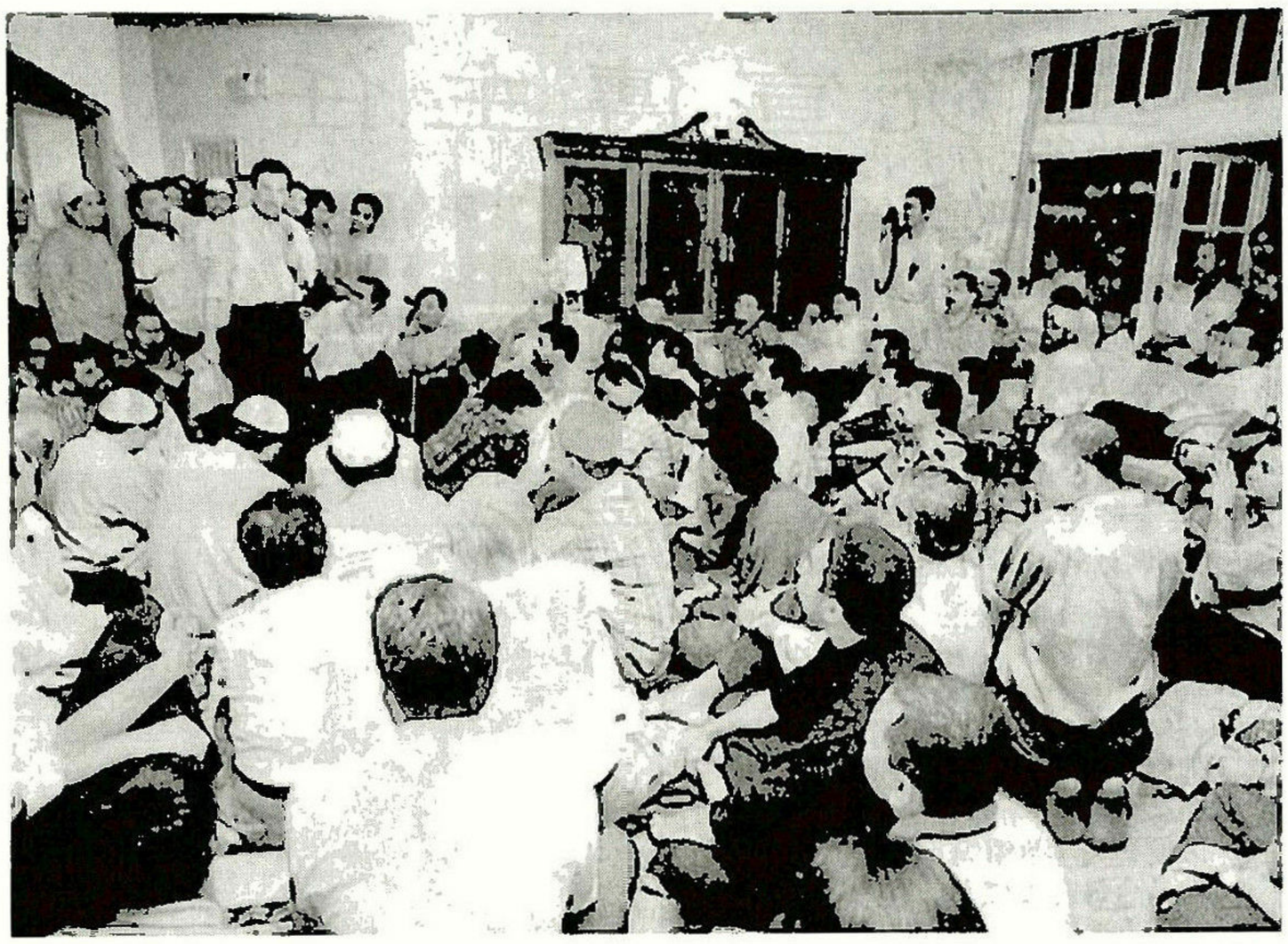
安华声明全文

“大马正在面对一项非常艰幸的挑战。迄今以来引以为豪的经济已经成为一项美丽的幻觉。如今我们因为苦涩的事实而感到震惊。

人民将会因为经济不景气面对悲惨后果。许多人将会失业。贫穷人数将会增加，所以我们必须凝集力量及人民的耐力来克服危机。

但是相信经济不景气只是我们所面对的其中一项挑战。我们面对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文化问题、道德问题。每一个问题如果被置之不理的话，将会越趋严重。所有问题都需要关注以及必须以智慧及依据先后处理。

我们也面对一组在新时代里产生的问题。经济不景气不是导致悲剧的主因，而是由于我们无法适应新时代。我们已经进入新的时代，环球化的时代，资讯新纪元。如果不作出改变的话，我们可能无法克服这项挑战。



安华家的客厅挤满了支持者，专心听他演说。

目前已经到了推行改革的时候。我们必须拥有一个明确的议程。我们也将会确定改革的速度、方法、方式和步骤。改革是由内产生的诉求，而不是来自外面的压力。

抗拒外来阴谋

因此，最好不要有任何团体尝试或企图指责它是一个来外的阴谋。我们抗拒任何阴谋。我们是大马的爱国者。我们抗拒外来的阴谋。我们也将从内部对抗外来阴谋。我们对抗外来的残暴，但是我们也有责任对抗国内社会的任何残暴。问题是不是东方或西方，北部或南部，而是正义。我们必须对抗残暴，无论它是来自东方还是西方。

人民促请改革，改革的声音是人民的声音。来自回教徒内心深处的呐喊。但是有一些人对改革的浪潮感到紧张。他们是害怕本身所干下的罪行被揭露的贪污者。

不要受到这群害怕改革浪潮的人士蒙骗和唆摆。他们已经江郎才尽，一再旧调重弹，他们害怕新时代的来临，所以他们制造鬼怪来恫吓人民。只有孩子才会被这些鬼怪吓倒。我们已经独立41年，已经是一个成熟的独立族群。

人民应该团结面对新时代。但是人民的团结来自领袖的团结。人民站在领袖的背后。如果领袖之间没有争斗的话，他们不会分裂。如果领袖时常强调团结但是任由争权夺位的份子为所欲为的话，国家不可能达到大团结。

时常重复对主席忠心

自从我被选为巫统署理主席，我时常重复我对主席的忠心。我相信以巫统党员的智慧，当他们被要求作出决定时，特别是在关键时刻，他们会作出明智的决定。他们要巫统稳定和团结，他们也要党时常加强，以及通过重新安排领导层新旧交替给予党新的力量。

对我来说，党的稳定和团结不能受到阻扰。所以自从我被选为署理主席，我时常重覆对党主席的忠心。我在最高理事会和巫统代表大会上都有这么做。有的同僚抨击及认为这项重申做得太多的话，它将会失去意义。但是我的立场是：我将会为党的团结作出一切。

但是团结是为了什么？它肯定是为了加强力量，以便使到提高回教徒的阶级和地位的议程达致成功。我们面对新的世界，新的气氛。我们有潜能进入新的纪元。新的挑战来临时，我们将无法以旧的方法克服它。我们必须改变。我们必须实行改革。和解是一项要求。所以在我被选为署理主席那一年的大会上作出总结时，我强调会和其他同僚坚决支持主席，以便为提高回教徒的地位而作出改变。

可是僵化的集团以及觉得自己受到改革浪潮冲击的一群，从来没有停止过阻止改革的努力。由于他们已经无法应对改革的索求，所以他们制造了诡计和分心来转移人民的视线，以及对需要关注的实际问题制造混淆。

对他们来说，要求改革是可以通过破坏支持者的个人名誉达到毁谤的目的。当他们无法支持改革的浪潮，更开始利用肮脏的手段来破坏支持者的个人名誉。

被迫上法庭讨公道

我所面对的毁谤是一项政治阴谋。他们知道我不能够在民主程序的政治竞技场上被打击，因此他们利用下流的手段革除我进入竞技场的资格。我在一年前就知道这项阴谋的存在。它是由不正确的谣言开始，然后是匿名信，最后是在书本上作出卑鄙的指责。这些书本和匿名信被广泛的散播到巫统支部。回教堂也成为流传毁谤信件的目标。我并没有选择，除了到法庭申请庭令禁止它的发行。和匿名信不同的是，有关书本拥有作者和出版人，他们仿佛勇于面对一切指责负责。如果不采取行动的话，它的内容会被认为真有其事。这个毁谤课题也在国会下议院中提出来。

这些为了破坏我个人名誉的毁谤行动受到一些在改革浪潮溺毙的有钱人所操纵，它涉及了感觉被排挤及边缘化的富人，甚至是政治高层和领导机制。

我只是凭著理想主义个人威望进化政治竞技场。道德和人格是最重要问题，没有这两样的话，我的理想主义将如同虚构。所以当我的个人格受到攻击时，我不纯粹把它视为一种政治游戏，所以我针对有关毁谤才向警方报案。当调查展开时，它显然涉及数名人物。首相要求我勿要把事情闹大。为了维护党的稳定，我遵从首相的劝告。我也感谢他在当时为我辩护。我以为首相当时的解释代表事件已经告一段落。当有关毁谤卷土重来，并且有过之而不及时，我感到吃惊。匿名信被钉成册，并且加上新的毁谤之后，在最近的巫统大会中广泛流传。我不单止被指控涉及不道德行为，而且还被指涉及谋杀及成为外国的代理员。我毫无选择，除了把这件事带上法庭讨回公道。

随着决定不把事情闹大之后，我以为事情已经结束。不过，当我在巫统代表大会开始几天前接到消息指出有一名叫卡里杰菲里的人士，已经将毁谤信中所有的指控出版成书，而且数以千计的书本已经在大会中流传后，感到震惊不已。

我从一开始就把这个事件

的发展告知总检察署，但是总检察长显然不满我申请庭令和采取民事诉讼的行动。我的解释是，这个书本与匿名信不同的地方是，它拥有作者和出版商，无论如何，我对总检察长确保进行严密调查以将作者在毁谤罪行下控上法庭的保证感到满意。

某方面不同意采法律行动

我也向警方保证会和他们合作，全国总警长则委派一名高官率领调查队伍，他重申有关书本的内容是“渣滓”和“垃圾”。

我承认一些方面不太同意我向警方报案和诉讼的行动。他们认为有关书本应该以不合理的理由完全被推翻，不过我觉得有必要采取行动，因为有关书本不止重复匿名信中的毁谤，而且也将我和谋杀案，外国代理员以及要使首相下台的阴谋牵涉在一起。甚至作者和出版商公开发表声明，并表示如果他们的指控不正确的话，为何我不采取行动对付他们。他们公开表明我不敢把他们带上法庭，是因为我担心所有秘密被公开。

我的律师强调，警方报告的调查应该根据正常的程序进行，它应该不是件难事，因为涉嫌者已经身分大明，而且他们所有指控都在书本上列明。他们才是应该最先受到调查的人。根据目前的证据法令，他们有责任证明他们所作出的指责，把证据提呈给法庭，而不是以谣言、诽谤、第三者的供证或捏造出来的故事为根据。

警方集中发掘隐私

但是，当警方调查了两个星期后，我发现到警方的调查并非集中在收集证据，而是集中在发掘我的隐私。我似已经成为了受怀疑的人物，我的律师劝告我向全国总警长以及总检察署寻求解释，但是我向我的律师强调，我对全国总警长以及总检察署的智慧充满信心。

或许我不应该期望任何人同情我，但是我有权利受到公平的对待，同时我相信我能够受到政府机制的公平对待，如果这些政府机制遵守他们的专业道德和操守。

从他们的行动看来，似乎对我有敌意。他们调查的重点不再是书本的内容，而是他们从谣言制造厂中所收集到的各种故事。这些故事是由那些企图破坏我俩关系的政治人物和有钱人所制造出来的，他们希望推翻我。书中的故事已经渐渐被遗忘，取而代之的是新的故事。警方似已经失去了理智，他们强迫证人发表足以让我在众人面前蒙羞的谈话。

我已经在志期 8 月 25 日和 28 日致给首相的函件中，针对几项诽谤作出详细的解释。我相信现在又出现了新的谣言，散播到国家的每一个角落。

未曾要求受特别对待

我为文明社会、司法统治和条例的透明而斗争，所以我遵照每一个程序和步骤。我并不要求受到特别的对待，我只要求公平，对执法和司法机构有信心。

我不曾对各种指责害怕过。我曾经被指责贪污，所以我邀请反贪污局前来调查我。如果我没有贪污，为什么我要害怕？也有谣言指我利用财政部长的身份发股票给我的家庭成员，因此我指示发股的部门如果发现我的家庭成员申请股票，必须自动拒绝他们。

我将继续斗争，我已经斗争了超过 30 年。从一名学生，到大学生，再到一名青年团员和巫统党员。我面对过无数次的挑战，没有一次不是艰辛的。我曾经领导学生为贫穷人民斗争，也为马来文的地位斗争，灌输青年回教意识和道德观。

矢言继续斗争

我为了捍卫华玲农民的命运而被扣留两年，我不要同情的眼泪，我要的是斗争的火炬继续烧下去。我要我的后辈们高举斗争的火炬，我不要我的下一代，我的孩子活在恐惧中。

命运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我们的责任就是继续斗争。公正并不是上天赐予的，而是斗争得来的。上苍不会改变一个民族的命运，他们的命运必须靠自己的努力来改变。如果我们的体内流着害怕的血，我们将活在恐惧中。如果我们在胸膛燃起斗争之火，我们就能有伸张正义、消除残暴的力量。我们必须拥有铲除贪污的力量，我们必须对抗裙带风、朋党、贪污和残暴。

我们才庆祝独立 41 周年，但是独立并不是用来庆祝的，而是必须用来付诸于行动。我们必须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独立，我们必须从外来的暴力中独立，但是，如果外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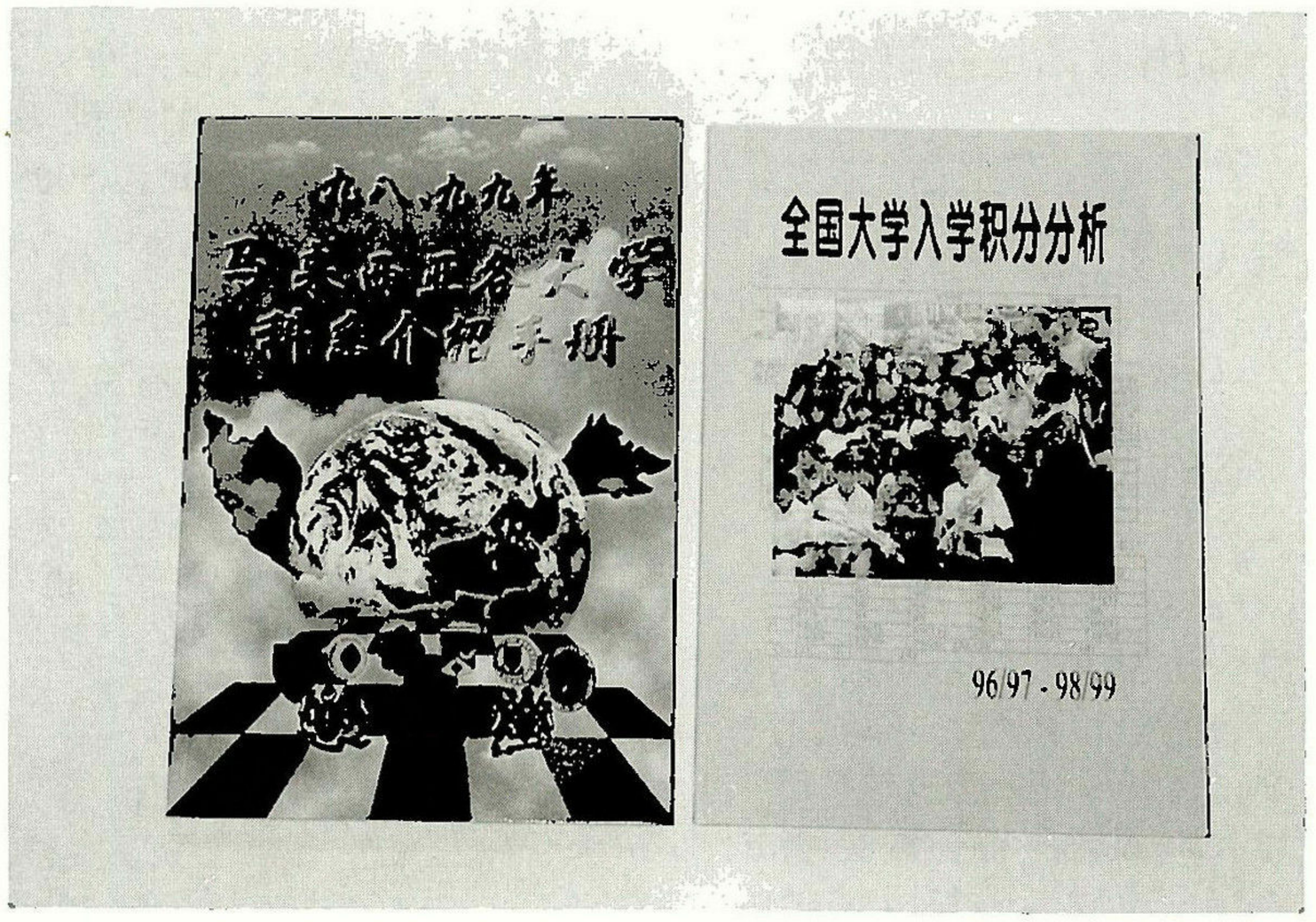
残暴和施压已经被自己民族的残暴和施压取代，独立还有何意义可言?

政治上的独立是不够的，我们还要精神和思想上的独立。我们全部都是上苍的奴隶，我们必须从一切占领的正式中寻求独立。

我们必须从卑鄙、个人的欲望以及掠夺他人财富的行径中走出来，摒弃诽谤他人的作风。

我促请所跟随巫统和其他政党的马来西亚人民，少年、青年和成人以及所有团体都以上述精神为依归。只有这种精神才能使我们在迈向21世纪时有更光明的前景。”

(星洲日报 4/9/98)



迈向大专院校指南

◆ 96/97 - 98/99《全国大学入学积分分析》RM9.00

◆ 《马来西亚各大学科系介绍手册》RM13.00

出版了！

欢迎购阅参考
作出最佳选择

合购两册特价优待 RM20.00

邮购请另付邮资 RM 2.00

订购处:

华社研究中心 (271806-T)

Huazi Resource & Research Centre Bhd.

No. 1, Jalan Maharajalela, 50150 Kuala Lumpur, Malaysia.

Tel:03-2734035 Fax:603-2734037

安华从革职到被捕演变

连日来国内政经两坛迭遭巨变，瞬息万变，教人目不暇给。

从吉隆坡股票交易所在国庆日宣布所有大马上市股票须通过中央存票制度在本地进行交易、中央银行宣布多项激烈的货币新措施，而至前副首相兼财政部长拿督斯里安华先后遭革职和开除党籍，以及被逮捕，近日来因之而引发的种种政局演变，端的是层出不穷。

本报把种种事端加以整理，方便读者温故知新，了解整个事件的演变。

首相谈话透露端倪

*8月31日：隆股票交易所宣布，在中央存票制度下，所有大马上市股票必须在本地进行，一切在场外交易的股票买卖一概不受承认。

这项宣布对新加坡场外交易是大打击。

*9月1日：中央银行代总裁拿督洁蒂宣布马币管制新措施，包括马币1个月不移回国作废、居民出国只能携带马币1千元和1万元外币、购买隆市股票交易所股票的外国股友必须持票1年才能脱售等措施。

*首相拿督斯里马哈迪通过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向全民解释货币管制新措施的原因，同时宣布高面额的1千元和500元面额钞票将停止流通。

*马哈迪重申与安华关系良好，不过，如果后者有良好理由辞职的话，他会接受。

*安华在绿野仙踪国际展览馆主持建筑业大会开幕，再度否认辞职。

9月2日
传言炽热丢官成真

安华辞职传言满天飞，直至下午，传言愈加炽热，闻风而至的国内外逾百名新闻从业员、以及多名巫统领袖不约而



安华被革职22小时（3/9/98）后，现身召开记者会，反驳各种指控。左为夫人旺阿兹莎。

同涌往安华官邸探听实情。

* 中行宣布马币兑换美元汇率固定在3.80零吉的水平。

* 安华在官邸召见马来西亚国民大学学生会领袖，内容不详。

* 首相署发出革除安华要职的简短通知书，由政府高级官员在傍晚7时许亲临副首相官邸传递。

* 晚上8时，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正式宣布，由即日下午5时30分起，安华被革除副首相和财政部长，以及与这两职相关的职位。

* 国阵领袖虽然对安华革职一事分别感到震惊、伤心，但都表示尊重首相的决定；霹雳、森美兰、雪兰莪、彭亨、玻璃市等各州州务大臣纷纷表态支持首相革除安华。

* 巫统全国宣传主任拿督尤索夫诺吁请党员冷静看待安华革职事件，不要太过情绪化。

* 深夜11时30分，全国总警察长丹斯里拉欣诺召开紧急新闻发布会，声明截至此时为止，安华并没有被捕，不过，却因为《安华不能当首相的50个理由》一书而被调查。

* 安华表示，他在被革职当晚向支持者发表的演讲，将会录制成发音带和录影带。

9月3日
安华声称逼害下台

下午3时，安华向记者揭露，首相给他两个选择，一是自动辞职，一是被革职，而他遭革职是高层要他垮台的阴谋。不过，他不敢肯定这项针对他而策划的阴谋是否由马哈迪亲自指示或设计。



我国著名诗人奥斯曼阿旺前往安华私邸慰问安华。

* 安华声称脱氧核糖核酸测试经证明，《安》书所指的他“是一名私生子的父亲”指责并不正确。

* 安华指出，他曾分别于8月25日和28日两度致函首相，针对数项有关诽谤他的事件作出解释。

* 安华表明，他曾在志期8月25日致给首相的私函中，表示对接获其本人将在官方机密法令下被提控的通知感到十分惊讶。

* 安华表明准备面对会加诸他身上的任何控状，他要求支持者保持冷静。

* 全国刑事调查助理主任拿督慕沙哈山在高庭入禀宣誓书，指他在调查《安》书时发现，安华涉嫌被外国颠覆分子利用，借以威胁国家的治安与安宁。他也指出安华涉及多项鸡奸、不正当的性行为。

* 国际贸易及工业部长拿督斯里拉菲达说，内阁赞同革除安华，人民应支持马哈迪的领导，客观地看待问题。

* 各州国阵领袖支持首相革除安华要职。

* 彭亨州务大臣丹斯里耶谷指出，首相革除安华必有原因，人民应对首相有信心。

* 森美兰州务大臣丹斯里依萨向森州巫统联委会解释革除安华的事件，会议并一致通过支持首相的决定。

* 国阵秘书长拿督莫哈末拉末指出，安华被革职并不会对国阵造成负面影响。

* 槟州副首席部长拿督沙

力奥玛呼吁人民不要听信谣言，在人民支持下，首相将会妥善地使国家经济早日复苏，而槟州巫统也不会闹分裂。

* 国阵青年团重申支持首相立场。

* 柔佛州、吉兰丹州巫统联委会、马六甲首席部长拿督斯里阿布查哈表明全力支持首相。

* 巫统总秘书长拿督沙巴鲁汀指出，巫统有能力解决安华被革职后所引起的问题。

* 涉嫌拥有三百七十多枚子弹的万能公共事务执行董事拿督那拉的辩护律师曼日星亲临安华官邸，会谈约一小时。

* 警方在隆市多个地区作出戒备，以防好事之徒滋事。

* 聂阿兹表明对安华丢官事件不喜反悲。

* 国民觉醒运动呼吁政府向人民解释革除安华事件。

* 美国国务院对安华被革职事件反应谨慎，并表明这是大马内政，而安华所担任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展委员会主席职位将受影响。

* 晚上7时，安华接受CNBC的电话访问，并为本身作出辩护。

* 巫统最高理事会原定于8日举行的会议提前在3日晚上召开，历时逾四小时半。

* 约两千名安华支持者涌往巫统总部，以示支持安华。

9月4日
开除党籍抗辩到底

凌晨零时40分，在巫统会议结束前15分钟离席的安华向聚集在巫统总部的两千名支持者指出，他在出席巫统最高理事会会议时被告知会被开除党籍。他也矢言将为自己的公正抗争到底。

* 凌晨约1时，巫统主席马哈迪公布会议结果，宣布巫统最高理事会一致决定开除安华党籍。

马哈迪同时宣布，他本人目前暂时代摄财长职位。

* 安华指责巫统最高理事会开除他的党籍是错误的决定，他并再次形容这纯粹是一项政治阴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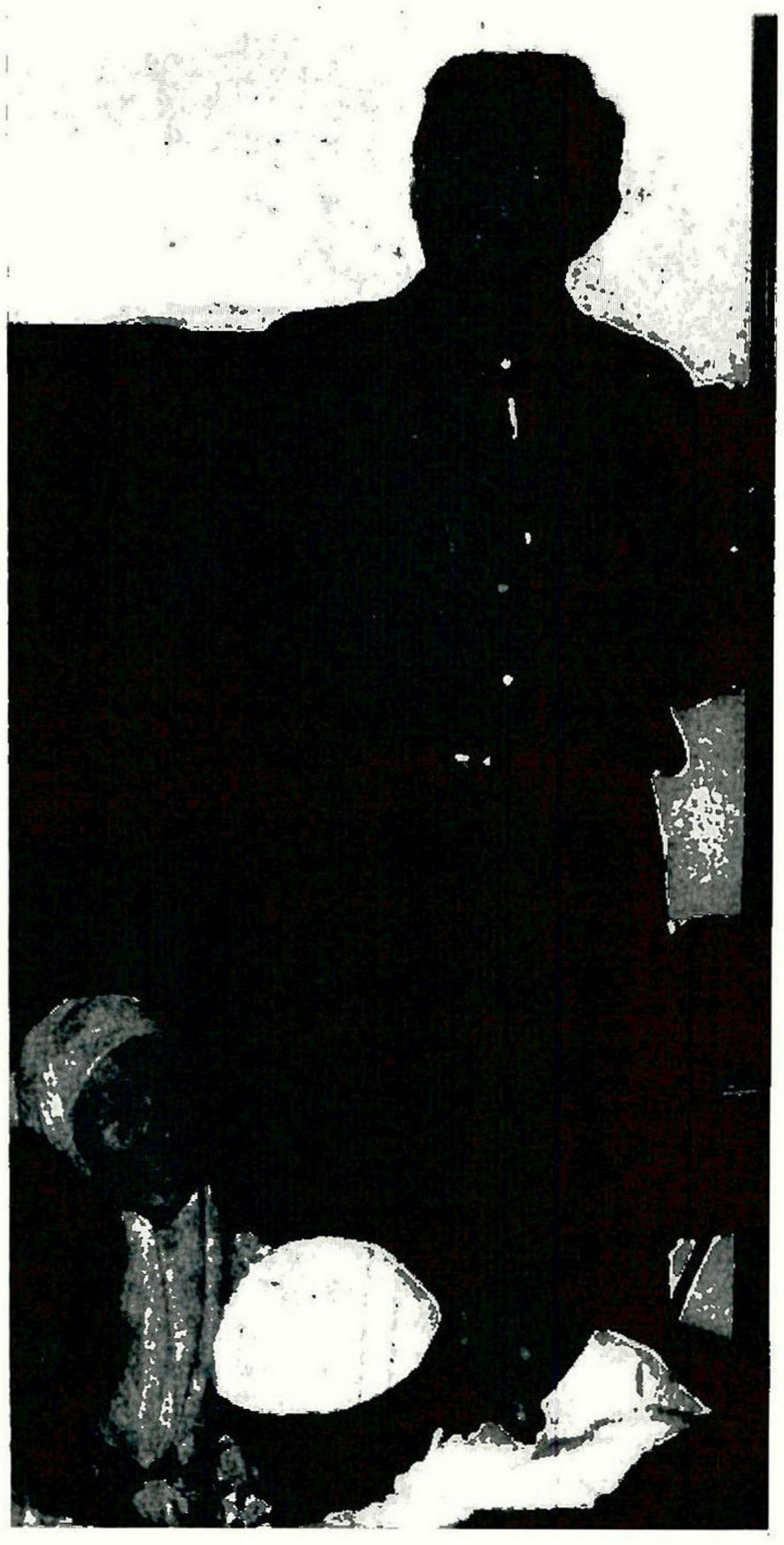
* 安华说，他是因为揭发政府高层滥用政府机关而被开除党籍。

* 安华指出，慕沙哈山在宣誓书中对他所作的指责未在法庭宣读，就已成为公开的文件，是非比寻常的。

* 安华在白沙罗高原回教堂祈祷后，向约两千名支持者表示，他将会继续斗争下去。

* 安华接受澳洲一家传谋访问，表明准备会晤首相，以进一步澄清所面对的指责。

* 安华支持者在网际网络开设网站，以反驳一切有关对



安华被革职后，在私邸向支持者发表演讲，其夫人旺阿兹莎一直陪伴在左右。

安华所作出的指责。

* 安华说，印尼总统哈比比及其他区域领袖纷纷致电慰问他。

* 安华证实在3日上午会晤回教党主席法兹诺。

* 安华搬离副首相官邸、入住白沙罗高原私宅。

* 民政党全国主席拿督斯里林敬益医生表明，民政党全力支持首相开除安华。

* 马华公会总会长拿督斯里林良实医生指出，马华尊重首相革除安华，而不委任副揆并不影响内阁操作。

* 印度国大党主席拿督斯里三美威鲁以“我们不允许对国阵其他成员党的决定发表谈话”为由，拒谈巫统家事。

* 前四六精神党主席东姑拉沙里全力支持首相革除安华。

* 国内贸易及消费部长拿督美格朱聂吁请巫统党员冷静看待安华革职事件。

* 霹雳州务大臣丹斯里南利表示将会见23个巫统区部，以解释巫统最高理事会开除安华党籍的决定。

* 马华总秘书长拿督陈祖排希望巫统妥善处理和尽快解决安华的事件。

* 彭亨州务大臣丹斯里耶谷指出，安华今后将以个人身份为自己辩护。

* 山努西指安华被革职事件并不影响巫统复苏国家经济的努力。

* 丁州大臣丹斯里旺莫达指出，马哈迪是在与巫统最高理事会协商后，才达致开除安华的决定。

* 巫统副主席拿督斯里那吉驳斥安华指责国家机关，如总检察署、警方等已被人利用的言论。

* 山努西认为，吉打人将再度出任财长。

* 国阵巫统议员俱乐部一致支持首相和巫统最高理事会开除安华。

* 马来保险代理员协会支持首相革除安华。

* 马哈迪指出，副首相和巫统署理主席职位将会悬空，不加填补。

* 国会反对党领袖林吉祥呼吁政府成立皇家调查委员会，以调查安华所面对的各项指责。

* 消息指出，巫统副主席拿督斯里阿都拉巴达威将重新掌管槟州巫统联委会。

* 青年及体育部长丹斯里慕尤汀指出，他虽然对安华被开除事件感到悲伤，他希望各有关方面支持国家和巫统领导层的决定。

* 4名巫统国会议员漏夜拜访安华，他们是巴力士隆区议员罗哈尼、瓜拉庇劳区议员阿布查哈、打扪区议员阿末胡士尼，以及四加亭区议员阿都拉曼。

9月5日
各界人士陆续探访

国内各阶层人士陆续探访安华，表达支持和关怀心意，慰问者包括民主行动党秘书长林吉祥和副主席陈胜尧博士、回教党主席法兹诺、人民党主席赛胡先阿里。

* 全国总警长拉欣诺指出，由于安华被指责在位时滥用职权图阻警方调查《安》书所揭露的事件，因此，警方将在必要时把这宗阻差办公的个案带上法庭。

* 总警长证实《安》书作者指安华生下私生子的事件是没有有根据的，因此，警方便控告作者阿都卡立。

* 拉欣诺强调，安华迄今仍未对“高层领袖阴谋推翻安华”的指责向警方报案，

因此，警方并没有法律地位评论或反对安华的阴谋论，他也表明警方在处理安华事件时，绝对大公无私。

* 一名公众人士指安华在接受外国电视台访问时指本身是政府高层阴谋的受害者之言论有诋毁政府之意，因此，向警方投报要求警方介入调查。

* 阿都拉斥责安华采取对抗巫统和政府以及把个人的问题政治化以寻求人民支持的行动，是不负责任的做法。

* 安华表示对总警长增加对他的指控至11项之多的做法不感惊讶，因为他每发表文告和采取行动，都可能引起新的指控。

* 安华促请警方以专业的态度办案，不要沦为政府的工具。

* 林吉祥指安华赞同他的建议，即政府应设立皇家调查庭，以调查安华所面对的指责。

* 巫青团副总团长拿督希

山慕汀呼吁团员效忠巫统，团结一致，不要听信谣言。

他指责非政府组织，尤其是大马回教青年运动利用和影响一小撮大学生和知识份子以遂本身利益。

* 峇东埔巫青团对安华被开除党籍感到惊愕，并指责这不公平。

* 行动党全国署理主席卡巴星指安华应该通过法律还自己清白，他也希望安华有机会向人民解释所面对的指责。

* 安华预测他自己将会被提控，并丧失国会议员资格。

* 安华表明暂时不会回返大山脚老家，他也改变初衷，没有出席外甥的婚礼。

* 槟州首席部长丹斯里许子根博士表示，安华丢官，并不影响槟城州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关系。

* 巫统最高理事会成员拿督威拉莫哈末阿里吁请安华遵守国家宪法和法治精神。

* 霹州大臣南利指示州内国、州议员和各政府部门首长向基层人民解释安华革职事件。

* 玻州大臣拿督斯里沙希淡促请公务员接受安华被革职事件。

* 马华妇女组支持首相革除安华官职。

* 雪州大臣拿督阿布哈山说，雪州巫统17个区部一致支持首相开除安华。

* 安华扬言将不惜一切代价寻求正义获得伸张。

* 安华指出，在巫统最高理事会于周五凌晨作出开除其党籍的决定之前，全体理事会成员便已收到有关对他作出诸如性丑闻、卖国和鸡奸等指责的宣誓书，而最高理事会便假定这些都是指控。

* 安华表明同意首相对管制国际资金流动的新措施。

* 安华在被问及管制货币措施是否为解决方案的问题时表示，他与前同僚的歧视是他们把问题症结归咎货币狙击客，而他却认为应该对国内的整个经济形势作出一些调整，不要只是认为自己是对的。“我就是在这个课题上不同意首相的看法。”

9月6日
众叛亲离划清界线

安华表明将从9日开始展开全国巡回演说，向人民解释真相，并发动一项为寻求公正、合理和自由国家的改革运动。槟城将是巡回演讲的第一站。

他也揭露，他的义弟在今日下午遭警方逮捕，相信用意是协助警方调查其事件。

安华批评其政坛和企业界朋友因为害怕当局的恐吓而离弃他。

* 联邦直辖区、雪兰莪、丁加奴、马六甲和吉打州青年团公开促请巫青团总团长阿末查希下台。丹州巫青团表明尊重巫统最高理事会开除安华党籍的决定。

* 3位巫青团执委对阿末查希支持安华所倡议的改革运动表示失望。

* 首相拒对安华事件发表评论。这是首相自安华革职事件以来，第一次就此事发表谈话。

* 丹州大臣聂阿兹表明回教党无意加入安华所倡议成立的组织，以在国内进行改革运动。

* 巫统槟州联委会议决全力支持开除安华。

* 巫统总秘书长沙巴鲁汀表示，首相将在这一两天内召见巫统基层领袖包括区部主席、署理主席、巫青团和妇女组执委等，以向他们解释开除安华的原因。

* 巫统妇女组主席拿督茜蒂莎哈拉表明不支持安华巡回演讲，因为这会影响国家和巫统的团结及稳定。

* 国防部长拿督斯里赛哈密提醒安华不要利用政府机构和反对党来达致个人的利益。

* 峇东埔区部代主席拿督阿末沙阿指出，该区部将派代表劝告安华放弃成立其他政党或组织的念头。

* 巫统最高理事会拿督慕斯达化指出，安华被革职是自食其果。

* 玻州大臣沙希淡表示将以好友身份劝请安华利用正确管道来自我辩护，不要作出违反法纪行动，以致影响国家的良好治安。

* 巫统最高理事会成员美格朱聂指出，虽然安华在8月25日致给首相的函件中指他是推翻安华的人士之一，他并不打算起诉安华。

* 砂劳越州国阵主席丹斯

里泰益玛目指出，首相开除安华是要确保国家政治稳定。

* 教育部副部长拿督冯镇安促请大学当局一旦发现学生涉及安华革职后的政治风波，便须设立调查小组，制止他们继续活动。

* 林吉祥认为，首相应委任副首相，避免国家陷入宪法危机。

* 全国妇女组织理事会代表前往慰问安华。

9月7日
安华：不入反对党

战友旧友如诗人奥斯曼阿旺、槟城巫青团团长拉欣、大马回教青年运动的查卡利亚等陆续上门慰问。

* 安华表明既不会加盟反对党，也不会成立新政党或组织。

* 安华强调，由于面对1806年开始有西方文明法律以来最严重的指控，包括挑唆和出卖情报等，他必须为自己辩护。

* 安华促请首相凡事只针对他个人，不要骚扰他的家人。

* 迄今，在安华失势后前往探访他的巫统国会议员只有寥寥7人，其中包括青年及体育部长丹斯里慕尤汀、财政部副部长拿督阿菲夫汀，以及巫青团总长查希。

* 共有7个非政府组织宣布加入安华所发起、大马回教青年运动领导的“改革运动。”

* 在1993年重投巫统怀抱的前46精神党副主席玛丽娜尤索夫宣布退出巫统，以抗议安华遭革除。

* 巫统宣传主任尤索夫诺促请安华基于国家面对经济不景打击和共运会举行在即，搁置个人问题，不要令国家蒙羞。

* 巫统副主席兼教育部长拿督斯里那吉促请学生不要作出抵触法律的行为，避免沦为别有居心者的政治工具。

* 巫统副主席阿都拉斥责安华自称将在内安法令下被捕，是意图制造混乱，使人民误以为他是政治逼害下的牺牲者。

* 巫统最高理事会拿督威拉莫哈末阿里透露，巫统最高理事会将在下次的会议上，决定对查希违反党记、继续出席安华的改革运动集会事件采取纪律行动。

* 来自巫统的消息指出，美格朱聂是安华的证婚人，指其涉及推翻安华的指责是不确实的。

* 查希表明不会辞去巫青团总团长职位。

* 甲州巫统联委会、柔佛州巫青团、霹雳州巫统3机构等全力支持最高理事会开除安华。

* 查希特别助理辞职，以抗议查希在安华事件上立场不鲜明。

* 全国副总警长诺利安麦证实警方已逮捕安华的义弟苏玛达玛旺。

9月8日
安华永不能回巫统

马哈迪在主持巫统区部代表汇报会后指出，安华没有任何重返巫统的机会。他说，即使安华最终获得裁决无罪，也没有可能会重回巫统。这是首相自安华事件爆发以来，第一次发表评论。

* 马哈迪说，他在去年听闻有关安华的谣言时，选择不相信，甚至不加理会，如今，由于证据确凿，使他不得不信。

* 首相表示，出席汇报会的约5千名代表显然都接受他的解释，没有任何疑问。

* 马哈迪指出，安华指政府机制被滥用来拉垮他的指责全是谎言。

* 马哈迪说，如果他遭遇不测，巫统党员将会从现有的两名副主席之中推选新领导人。

* 首相重申不会委任副首相或代副首相，也不会提前举行党选以填补巫统署理主席空缺。

* 马哈迪指出，安华是因为行为不检被革职，他不认为大马人民需要道德败坏的国家领袖。

* 马哈迪指出，安华不应该举行全国巡回演说，他根本没有理由这样做。

* 马哈迪说，政府是否会逮捕安华，决定是在保安单位，他本身并不会发出逮捕令，因为这不是他的职责。

* 马哈迪表示，他原本打算在今年退休，却因经济风暴而被迫留下来协助国家渡过难关。

* 巫青团执委会21名执委议决以行动支持首相的领导，

以及信任最高理事会开除安华。该团也不支持安华的改革运动。查希并没有出席会议。

* 巫统宣传主任尤索夫诺指出，查希必须对安华被革除事件表态。

* 巫青团执委卡立诺汀非议安华事件不应被政治化，也不应该将之与巫青团和查希牵连在一起。

* 第二财长慕斯达化非议安华展开全国巡回演说，他也说，安华是因道德和私人问题被革职，并非如安华所说的是在政治阴谋下推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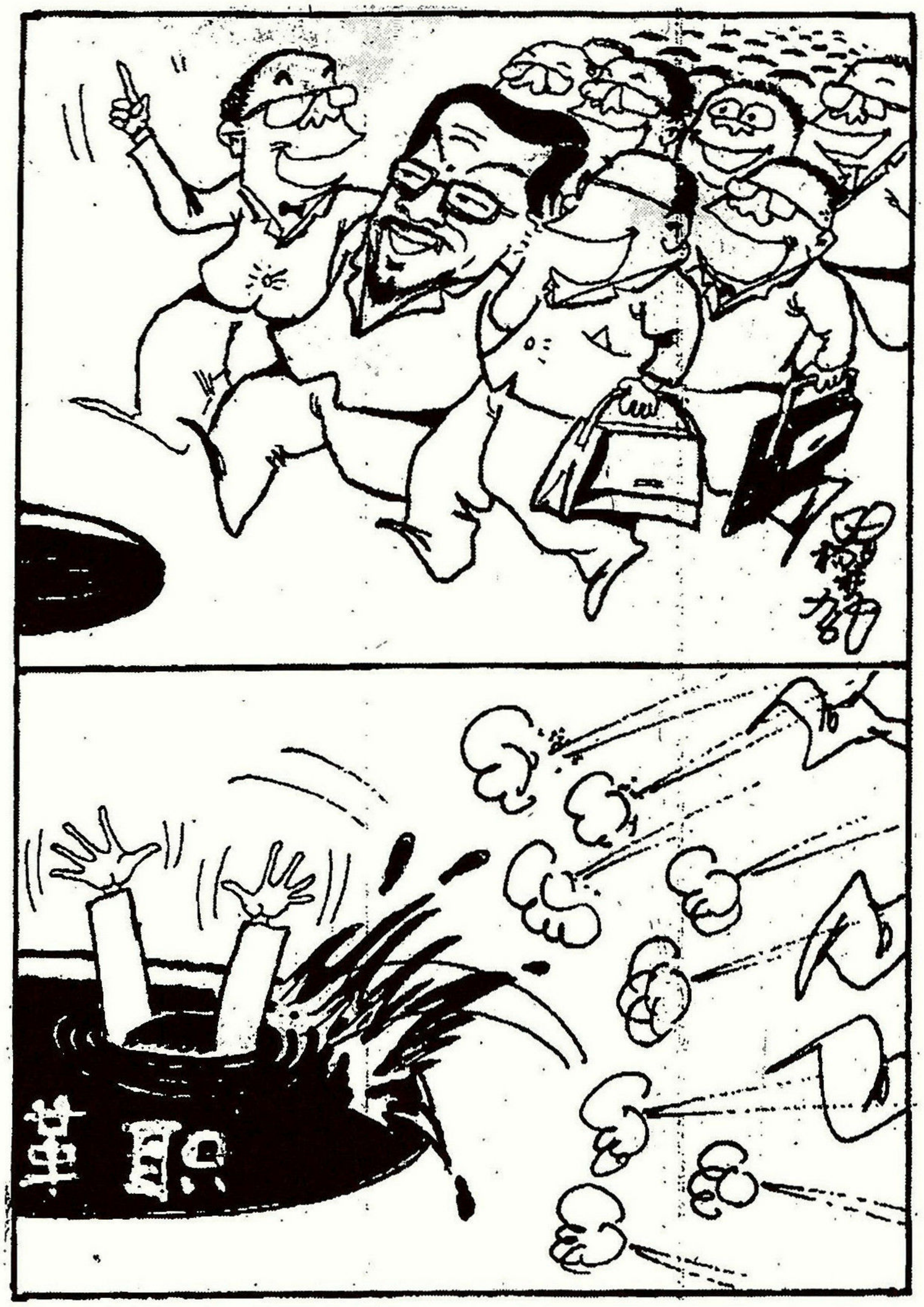
* 教育部长那吉说，教育部将征询法律顾问的意见，以确定安华所担任的国际回教大学董事主席的地位。那吉形容，安华被革职后，巫统将再度团结起来。

* 马来西亚理科大学校长拿督依萨淡比哥吉说，理大已采取数项措施，防止外来份子把政治带入理大校园。

* 美国大使馆参赞否认美国驻马大使约翰马洛或大使馆干预大马政治。

* 安华相信自己将会在内安法令下被捕，因为在他担任官职最后一天当天，当他询问首相本身会否在此法令下被提控时，首相不作任何答覆。

* 安华接受《时代周刊》专访指出，他与马哈迪最终分道扬镳，起因是两人关系恶化。这种微妙的关系变化源自去年7月，即首相结束两个月的长假回国开始。“当时也出现攻击我的匿名信，我开始觉察到事情出现变化。”



杨振昌绘

* 安华宣布听取支持者指这几天将会更多群众到其住家的意见，不会在这几天内到槟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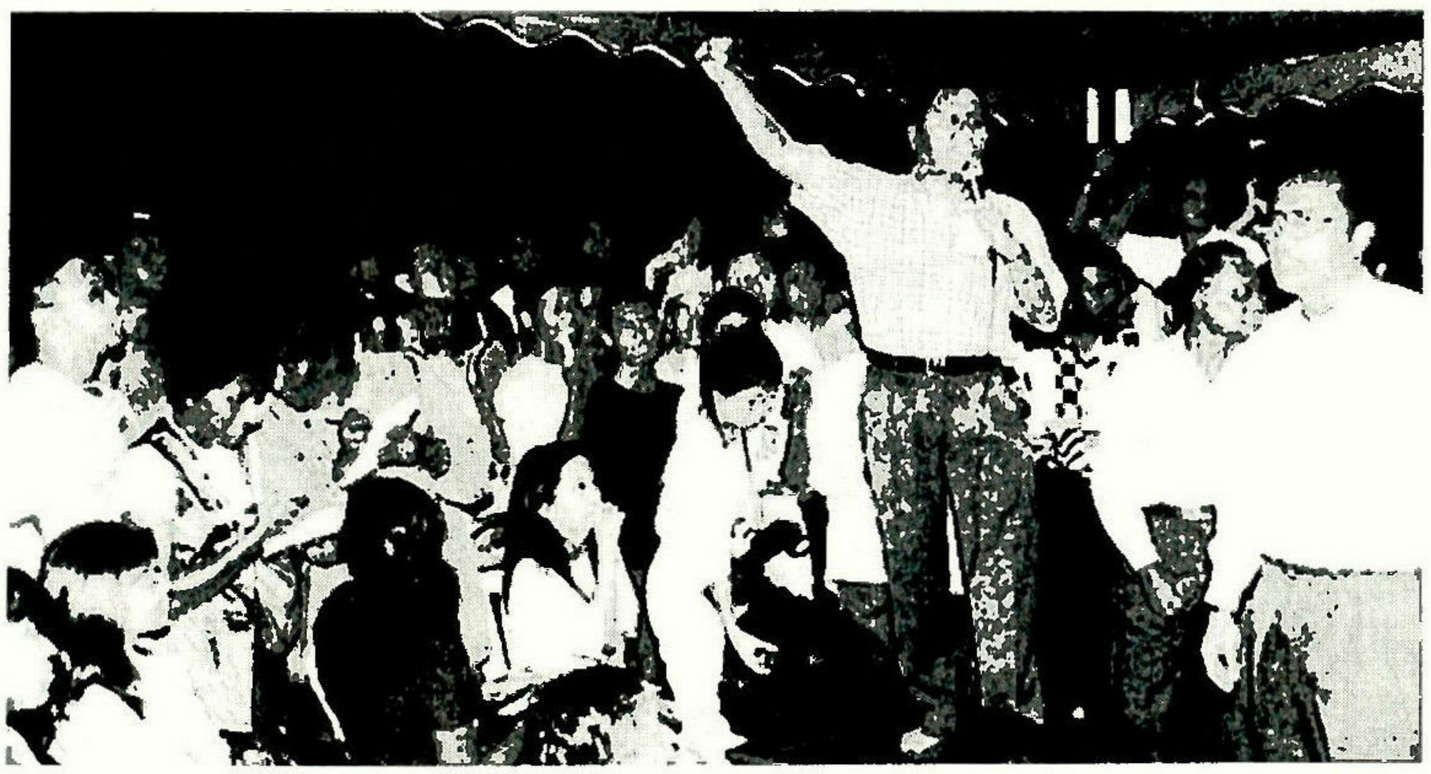
* 安华与支持者称兄道弟。

* 面对安华80岁的中学老师梅格洛特拉的亲切慰问，安华太太旺阿兹莎禁不住掉下多日来的第一滴眼泪。

* 旺阿兹莎表明，她和6名孩子都不相信安华鸡奸司机，以及与其他女人通奸。

* 聂阿兹说，回教党随时欢迎任何要通过回教斗争延续斗争，以达到改革愿望的人士入党，包括安华。

* 安华声称4名著名诗人和文学家鼓励他继续“斗争”下去，并向他承诺结集成社，以文字推广改革运动，他们是奥斯曼阿旺、沙末赛益、莫哈未沙礼和沙姆沙末。



森美兰州巫青团团长罗斯兰卡欣在安华私邸发表激昂演讲。

9月9日
首相亲自盘问证人

彭亨巫青团长慕斯达化揭露，首相是在亲自盘问与安华有染的男女之后，才确信安华涉及不道德的行为。

* 安华胞弟拿督苏海米对安华道德沦丧大表震惊，虽然他非常尊敬安华，但仍相信首相所言，即安华道德有问题。

* 巫统元老敦嘉化促请安华控制支持者的言论，不要挑起人民的恨意。

* 柔佛州巫统联委会主席拿督阿都干尼指安华批评巫统、警方、政府和国家安全制度的言论已引起社会不安。

* 新闻部长拿督莫哈末拉末非议外国传媒报道安华革职新闻别有居心，意图推翻马哈迪，让安华上台。

* 茜蒂莎哈拉说，巫统妇女组深信和满意首相就开除安华所作的解释。

* 慕尤汀指出，在安华事件上，巫统党员已承诺以党的利益为重。

* 甲州立法议会通过紧急动议，支持首相革除安华。

* 槟州青年理事会对安华的遭遇提出抗议。

* 巫统峇东埔区部代主席拿督阿末沙阿表示，他将展开签名运动，收集约1万3千名党员的签名，请求首相让安华复职。

* 巫统升旗山区部要求首相让安华重新成为巫统党员。

* 安华在接受澳洲《The Age》专访时，对首相进行猛烈的攻击。这是他在接受外国传媒访问时，第一次指名道姓攻击马哈迪。他也矢言将展开宣传运动，以反击首相将他革职。

* 安华向《时代周刊》揭露，在本月2日的内阁会议过后，他由于拒绝听从首相的指示辞职，而与首相激烈辩论，过后便接获革职公函。

* 安华说，他是在听闻首相要援引内安法令逮捕他而会晤首相，但首相回称要他辞职。

* 安华坦言从不后悔加入巫统，并自认已为巫统贡献良多。

* 安华指出，如果首相掌握确凿的证据证明他是因为道德问题而被革除，就该采取法律行动对付他。

* 安华声称一切对他所作出的指责全属冤枉，而所谓的证据也完全不正确。

* 安华指政府高层之中有人妒忌他的成就，因而设下政治阴谋来扼杀他的政治生涯。

* 安华的前机要秘书阿兹敏遭警方传召问话。

* 安华因丢官而失去担任共运会嘉宾的资格。

9月10日
首相斥安华制造动乱

马哈迪指责安华每天号召群众围绕身边，意图在警方将之逮捕时制造动乱，其实如果安华相信可以通过法律途径洗脱指控，就不应该利用人群来制造问题和混乱。

* 首相说，警方仍在调查安华的各种罪行，一旦掌握足够的证据，就会把他控上法庭。

* 马哈迪批评外国传媒报导安华谈话的篇幅比他本人的更多，对他不公平。

* 总警长拉欣诺警告公众人士不得兜售、收录或记录安华演讲的录音带。

* 总警长指出，警方只是传召阿兹敏问话，并没有逮捕他。迄今，警方共逮捕两人（那拉和苏玛达玛旺）以协助调查《安》书。

* 武吉安曼刑事调查总监拿督耶谷阿敏说，警方已传召马化控股首席执行员林天杰及多名公众人士问话，以协助调查《安》书。

* 巫统彭亨州联委会表明全力支持首相开除安华。

* 国阵后座议员俱乐部主席罗哈尼表明，他同情安华一家的遭遇，但支持首相所作的决定。

* 查希表示不会引退或辞职，而交由党主席和最高理事会决定他在巫青团的地位。

* 安华表示定于11日（周五）晚上到万宜镇西化医药中心展开第一站的巡回演讲，周六下午1时移至槟城直落卓坤，晚上在华玲，星期日到马六甲、周一和周二留在白沙罗高原住家。

* 安华私邸人潮不绝，邻居投诉影响生活起居。

9月11日
首炮巡回演说被禁

内政部副部长拿督达祖罗士里指出，安华每晚在私宅举行集会是否属于非法集会，将交由警方决定。

* 巫统最高理事会将在10月3日召开的会议上决定查希的命运。

* 安华在万宜的巡回演说被禁，第一炮打不响，改为祈祷会。

* 安华大学时代的教授赛莫哈末那曲认为安华并没有犯错。

9月12日
发表《峇东埔宣言》

安华在老家直落卓坤宣布以其选区峇东埔国会选区作为推行改革运动的起点，并发表涵盖6大要点的《峇东埔宣言》。

*《峇东埔6宣言》是1.唤醒人民的尊严、赋有权利和负责任意识；2.为捍卫全民的公正进行改革；3.通过民主程序捍卫人民权益；4.全力为均衡分配经济成果而奋斗；5.铲除贪污及反滥用权力；6.加强及发扬纯洁和传统民族文化；7.引导大马人民迈向资讯及大同世界。

* 马哈迪斥责查希是机会主义者，应该自动辞卸巫青团总团长职位。

* 嘉化及阿都拉在甲州回教堂汇报巫统政局发展。

9月13日
查希坚持不辞职

安华指出，如果查希因支持他所提出的改革运动而被革除巫青团总团长职位，是不合理。

* 查希坚持不辞职，把其巫青团总团长职位的问题交由巫统最高理事会处理和决定。

* 巫青团基于查希拒绝听从首相劝告自动辞职，正酝酿“倒查希”运动。

* 马六甲爱极乐永久展览馆电流中断，安华在黑暗中向一万多名支持者发表演说，表明将斗争到底。



安华中学的老师梅洛特拉（右）到安华私邸慰问，旺阿兹莎感动流泪。



安华于 12/9/98 返回大山脚直落卓坤的老家，将近一万名的乡亲与支持者涌往集会，听他演讲。安华挥手向他们致意。

* 森州大臣丹斯里依萨强调，首相是在掌握充份理由和证据后，才决定革除安华。

9 月 14 日
若被捕妻子接棒

安华呼吁警方深入调查，揪出接受那拉 6 千万元的人士，不要冤枉他（安华）。

* 柔佛州巫青团促请全国副总团长希山慕汀取代查希，领导巫青团。

* 警方上门劝请安华不要再集会，以免影响邻居的起居生活。

* 那吉指出，安华巡回演说可能会导致局势不稳定。

* 安华说，如果他被警方逮捕，旺阿兹莎将接棒继续展开改革运动斗争。

* 嘉化表明巫统向来都在进行改革，希望人口民不要轻信安华。

* 民主行动党主席曾敏兴指出，安华的峇东埔 7 点宣言立场与行动党立场有很多共同点，具有合作潜能。林吉祥则认为 7 点宣言值得支持。

9 月 15 日
秘书及好友被捕

安华在财政部的机要秘书莫哈末阿末及出版商好朋友慕那哇博士分别在刑事法典和内安法令下被捕。

* 安华所担任的国际回教大学主席职位已被革除，由那吉代摄。

* 安华抨击内安法令抹煞人权与自由，违反宪法。

* 安华预料本身会在共运会过后被捕。

* 安华首次获得警方准证，在雪森交界处的京江举行改革运动巡回演说。

* 那吉指出，教育部密切关注安华事件对大专生的影响，

并促请大专生不要触犯校规和法律。

* 国阵议员将到各自选区向选民解释安华革职原因。

9月17日
安华促首相下台

* 安华晚上在瓜拉丁加奴举行集会时，促请首相马哈迪医生下台。

* 全国总警长丹斯里拉欣诺证实，警方逮捕了安华的前机要秘书阿兹敏。

* 吉打州务大臣山努西否认他是策划推翻安华的幕后黑手，他说，安华利用“高层政治阴谋”掩盖自己的罪名。

* 4年前因性丑闻下台的马六甲前首席部长阿都拉欣表示，他的下台是有阴谋造成的，他还未被调查之前便被传媒形容为罪犯，而人们也知道谁是传媒幕后的控制者。

* 安华表示，他已将可以证明他的清白的录影带收藏在国内外30个地方，包括印尼。

* 安华到关丹展开东海岸第一场的巡回演讲，场面几乎失控。

9月18日

* 首相拿督斯里马哈迪医生表示，他并没有向安华透露有意在今年退位。他认为没有必要事事相告安华。

* 安华在瓜拉丁加奴及哥打峇鲁发表演说时，直接挑战马哈迪医生。他表示，如果他还是一名巫统党员，他一定在明年的党选中竞选党主席职。

9月19日
2人承认与安华肛交

* 安华的义弟苏玛和出版商朋友慕那哇博士被控上地庭，他们分别承认曾与安华发生不正当性行为，即肛交，两人各被判坐牢6个月。

* 安华在峇株巴辖一名支持者住家发表政治演说。

9月20日
安华在住家被捕

* 安华计划在首都独立广场发表演说，但是不成功，临时转移到回教中心发表演说，之后再带领支持者步行到独立广场。

* 晚上9时55分，安华在住家被警方援引刑事法典第377B条文逮捕。

(星洲日报 21/9/98)



安华 12/9/98 下午返抵老家，逾万名乡亲与支持者蜂涌聚会，支持者抬起安华，并高喊“安华万岁!”。

安华9宗罪

鸡奸控状

(1) 控状指安华于1993年3月的晚间，在联邦直辖区武吉白沙罗的住家，和慕纳华阿末阿尼斯进行违反自然的性交行为，即被告把生殖器插入后者的肛门，因而抵触刑事法典第377B条文。

(2) 控状指安华于1994年4月晚间，在联邦直辖区武吉白沙罗的住家，和海拉尼莫哈末纳菲斯进行违反自然的性交行为，即被告把生殖器插入后者的肛门，因而抵触刑事法典第377B条文。

(3) 控状指安华于1994年5月的晚间大约7时45分，与阿兹占阿布巴卡在孟沙Tivoli公寓进行违反自然的性交行为，即被告把生殖器插入阿兹占的肛门，因而抵触刑事法典第377B条文。

(4) 控状指安华于1998年4月晚间，在联邦直辖区白沙罗副首相官邸，和苏玛达马迈进行违反自然的性交行为，即被告把生殖器插入后者的肛门，因而抵触刑事法典第377B条文。

舞弊控状

(1) 控状指安华1995年5月24日下午5时30分，在大使路财政部，身为行政人员即副首相及财政部长，却犯下舞弊行为，这宗罪行与反舞弊局官员调查其机要秘书莫哈末阿兹敏阿里有关。

阿兹敏被怀疑涉嫌舞弊，因为阿兹敏的财产与收入不符合，被告因而插手并影响反舞弊局总监拿督沙菲益敏耶雅，以便后者停止调查行动，被告此举并没有请示主控官，因此违反反舞弊局调查程序。

被告的目的是要保护阿兹敏免受刑事对付，因此可在1970年紧急（必需权力）条例第22号第2(1)条文下被判刑。

(2) 控状指安华1997年8月12日至18日，在吉隆坡联邦直辖区白沙罗路的副首相官邸犯下舞弊行为，即指示政治部主任拿督莫哈末赛阿旺和该部第二副主任阿米尤努斯获取阿兹占阿布峇卡的自白书，以否认他所犯下的鸡奸行为。

控状指被告的目的旨在保护本身免受刑事对付。结果，阿兹占在1997年8月18日按照指示，把自白书交给首相。安华因而抵触1970年紧急（必需权力）条例第22号第2(1)条文，并且可以在同一条文下被判刑。

(3) 控状指安华从当时身为副首相兼财长，在1997年8月12日至同月18日，在吉隆坡联邦直辖区白沙罗路的副首相官邸犯下舞弊行为，即指示政治部主任拿督莫哈末赛阿旺和该部第二副主任阿米尤努斯获取乌米哈菲达的自白书，以否认他所犯下的鸡奸行为。

控状指被告的目的是为保护本身免受刑事对付。结果，乌米哈菲达在1997年8月18日按照指示，把自白书交给首相。安华因而抵触1970年紧急（必需权力）条例第22号第2(1)条文，并且可在同一条文下被判刑。

(4) 控状指安华1997年8月27日在副首相官邸舞弊，指示政治部主任拿督莫哈末赛阿旺以及第二副主任阿米尤努斯，迫使乌米哈菲达书写自白书，以否认安华涉及性丑闻与鸡奸罪名。

控状指被告的目的是为保护本身免受刑事对付，而乌米也在1997年8月29日作出上述自白书。被告此举触犯1970年紧急（必需权力）条例第22号第2(1)条文。

(5) 控状指安华1997年8月27日，在副首相官邸舞弊，指示政治部主任拿督莫哈末赛阿旺及第二副主任阿米尤努斯，迫使阿兹占阿布峇卡书写自白书以否认被告涉及性丑闻与鸡奸事件。

控状指被告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本身受刑事提控，阿兹占最后也依安华的指示，书写上述自白书。被告因而触犯1970年紧急（必需权力）条例第22号第2(1)条文。

(南洋商报 30/9/98)

危机中的亚洲：
风险和机会

李光耀

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在杜塞尔多夫针对亚洲经济前景发表演讲，深入分析亚洲各国地区目前面对的经济问题和未来的发展趋势。本文是李光耀的演讲录。

亚洲金融危机在1997年7月爆发的一年后，世界经济从未如此脆弱。东亚，包括日本，正在面临经济衰退。美国经济已经连续第七年享有经济增长，它正依靠高度消费开销来维持，也轻易受到股市暴跌的影响。欧洲正继续增长，但它的复苏过程是以出口为主，国内开销继续被高失业率所抑制。

东亚的前景

随着俄罗斯卢布在8月中崩溃，金融危机已经感染了所有新兴市场。拉丁美洲看来不是朝向经济大放缓，就是即将面临经济衰退。由于金融市场互相联系，危机也蔓延到欧洲和美国的经济脉搏。显然，随着紧张的投资者从那些在新兴市场有业务活动的企业和银行抽出资金，转移到更安全的资产，导致世界各地的股市大跌，“亚洲”危机已经环球化。

就如前几年东亚的安逸情况并不合理一样，目前的情绪也过度悲观。亚洲危机虽然把受危机影响国家几年来的增长和发展一扫而空，但我们过去30年来在东亚所看到的发展却也不是海市蜃楼。它们在出口工业的强劲增长，已把它们的农业社群转变成工业国家。东亚的勤劳、为未来牺牲、好学和重视教育以及企业家的精神，都是能协助东亚人民渡过眼前危机、重新恢复经济动力的基本力量。久而久之，投资者将恢复对东亚的信心。

过去几十年来的发展建立了基础建设、科技和管理技术，它们将能经得起危机的考验。过去一年里，东亚国家在国际经济竞争力调查中的排名滑落了，可是东亚仍然处在其他发展中地区和过渡经济的前端。洛桑国际管理与发展研究院所出版的1998年世界竞争力常年报告书，将新加坡、香港和台湾列入世界上“仍以革新、能赚取利润和负责任的手法管理企业”的10大经济体当中。危机虽然揭露了东亚经济体的结构性和机制性弱点，但这些国家与地区过去30年来所建立起的经济基础建设依然完整。

外在环境必须改善

东亚要如何才能复苏并回到以前深具增长潜能的道路？东亚本身的前景有赖于日本和中国这两个东亚最大经济体的表现。可是，经济危机目前已扩散到亚洲以外的区域，而环球通货紧缩的危险性也已增长。美国和其7大工业国必须采取果断的措施来应付危机，确保世界经济不会陷入衰退局面。

如果作为东亚最大经济体的日本一天不复苏，整个区域也将停滞不前。日本吸收12%的区域出口，并自80年代中就几乎是东亚各国的最大直接外来投资来源。日本对亚洲危机作出了慷慨的反应。它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给韩国、印尼和泰国的援助配套中拨出了最多款额，并且主动提供人道援助。日本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议上宣布提供一项新的300亿美元援助配套，以帮助受影响的东亚国家在国际资本市场中筹足资金。日本所能作的最佳贡献，其实就是重新启动本

身的经济。

日本是个强大出口及净债权国。它的金融问题，即银行业的坏帐问题，并不是向国外大量借贷而造成的，而是属于国内性质。通过其政治意志力，日本将能解决国内棘手的坏帐问题，使经济开始复苏。

中国也因为东亚的出口增长率放缓以及来自东亚的投资减低，而受到危机的影响。不过，中国的外在地位仍然坚固，它拥有 1400 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和大量的经常项目盈余，而它对开放资本项目的谨慎也让它在经济危机中受到较小影响。

中国要维持长期的经济增长，它就必须坚持对银行和国有企业的重组改革，它的政治领袖也致力于这么做。中国的稳定经济发展将加强东亚区域的吸引力。短期来说，中国承诺不让人民币贬值对东亚是个稳定因素。

外在环境是个肯定的因素。欧洲联盟和美国作为世界经济的推动力，它们可以，也必须在处理危机时起带头作用，不能让金融危机蔓延并削弱本身的经济。庆幸的是，美国和欧洲领袖都了解到环球金融危机的严重性，并已呼吁七大工业国研究如何改善国际金融市场的运作。

各国须整顿本身经济

外在环境的改善是促成东亚经济复苏的先决条件。这将使亚洲经济能够像几年前的墨西哥一样，通过出口和增长摆脱危机。可是，复苏的步代将根据不同国家问题的性质和严重性，以及它们在处理这些问题时有多坚决，因国而异。

泰国和韩国

泰国和韩国正在努力实行国际货币组织配套下所制定的经济改革，以便应付国际投资者所关注的课题，并取得他们的信心。它们在重组银行和企业界方面有了显著的改善。泰国已经开放金融业，允许外来投资者持有当地企业的股份，而韩国也开放了之前受保护的行业给外资者参与。

这些改革虽痛苦，但也取得了明显的成果。两国的国内利率已经下降，虽然东亚的主要市场的疲弱需求使它们的出口量仍不强劲。由于泰韩政府都以行动显示它们改革的决心，这让外国投资者安心，而资金也开始回流。

印尼

相反的，印尼因为最初没有遵守同国际货币基本组织的协议，结果损失了不少宝贵的复苏时间，也导致局势恶化，恐慌加剧本身已引起的混乱。到了今年底，印尼 2 亿人口的一半将生活在贫困水平之下，这是个可悲的局面。国际社会能够通过人道援助给予帮助，但是只有印尼人本身才能解决经济危机所产生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印尼目前正勇敢地努力实行国际货币基本组织配套计划，也在稳定货币、改革银行体系和重组债务方面有些改善。但投资家还是采取观望的态度，直到他们看见印尼企业家本身对在 5 月暴动之后对自己国家恢复信心，并重新投资。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的问题不同于泰国、印尼和韩国。马来西亚经济基本上是相当健全的。虽然马国企业不曾过度从国外借贷，外债也不高，但由于国内银行过度放贷，这形成了同资产泡沫的症状，也造成马国在不具生产力的项目方面过度投资。

马哈迪首相为了想推助马国经济重新启动，他通过实行资本管制，使马币免受投机者狙击。资本管制措施对刺激和改革经济有短暂的效益。马国政府已经大幅度减低利率，削减银行储备条例，以及指示银行将借贷增长率维持在 8%。

资本管制不能取代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它允许一个经济体不会在不稳定的兑换率迫使中央银行提高利率和放缓经济的情况下，有时间进行银行业改革和企业重组。危险的地方就是国内需求可能过度扩张，导致贸易收支出现赤字，进而造成外汇损失和资金外流。

新加坡

任何一个国家无论拥有多稳固基础，都无法确保自己免受金融风暴的影响。不过，同其他东亚国家相比，新加坡在亚洲危机中所受的影响较小，主要因为我们拥有完善、健全的金融体系，还有一个不过度依赖债务的企业界。

新加坡的问题是危机蔓延所造成的。因为贸易与投资的关系，新加坡的经济同马来西亚、印尼和其他受危机影响的经济体是紧密相连的。来自韩国、日本和东南亚的旅客人数已减少，我们同区域内的进出口量也已下降。

然而，新加坡之所以避过

了危机的主要冲击，是因为我们保持了紧密的宏观经济政策，同时时刻监督银行体系。由于我们拥有健全的宏观经济政策，我们的利率比美元的利率低，新加坡企业没有多少需要以美元借贷。我们的银行基础稳健，并获得良好的监督。因此，即使我国的金融体系比邻国的开放，我们在应付危机时受到较小的伤害。

新加坡也实行措施削减商业成本和提高生产能量。我们将继续进行经济重组和策略性计划，以把新加坡发展成区域和国际商业中枢。我们将进行基础建设和教育的投资，包括培训和再培训工人。新加坡已经全面检讨金融业，同时在政策上实行了主要的改变措施，以便提升新加坡作为亚洲地区主要金融中心角色。

这些措施不会马上见效，但它们将加强新加坡的竞争力，并让我们在东亚复苏后，更有长期的优势。

德国企业的风险和机会

也许亚洲目前似乎是生意风险很大的地方，可是当区域还蓬勃增长时，风险是最大的。如今，投资者最坏的忧虑已经实现了。尽管短期内的经济前景仍不乐观，但它继续恶化的危机性是有限的。相反的，中期至长期成长潜能却是巨大的，因此那些有资源和魄力而又能在这次危机中把握机会的公司，将能在东亚复苏后受益。

杜塞尔多夫和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地区是许多主要的化学、工程、传播和媒体公司的所在地。从事这些行业的企业对风险、长的项目准备期间以及经济周期起伏并不陌生。它们在知道最好的机会往往发生在经济周期陷入低谷，成本降低，及以同基础稳固的企业形成关键性伙伴关系的机会出现时；这些企业往往需要跟国外企业合作所带来的市场和资金流入。企业如果不在经济放缓时进行关键性投资，将可能无法在需求恢复时赶上其他业者。

德国企业不应该毁灭它们在东亚建立的良好商业关系和所作出的资本投资。单是两个星期前，经济部长雷克斯罗特在复兴信贷银行(Kreditanstalt fur Wiederaufbau)的“印尼日”活动上致词时，强调的字眼是“延续”——延续商业关系和资本投资。德国政府明白这一点。上个月，赫尔佐格总统率领了一个商业代表团到韩国去。东亚复苏时，这些长期投资将取得丰富的红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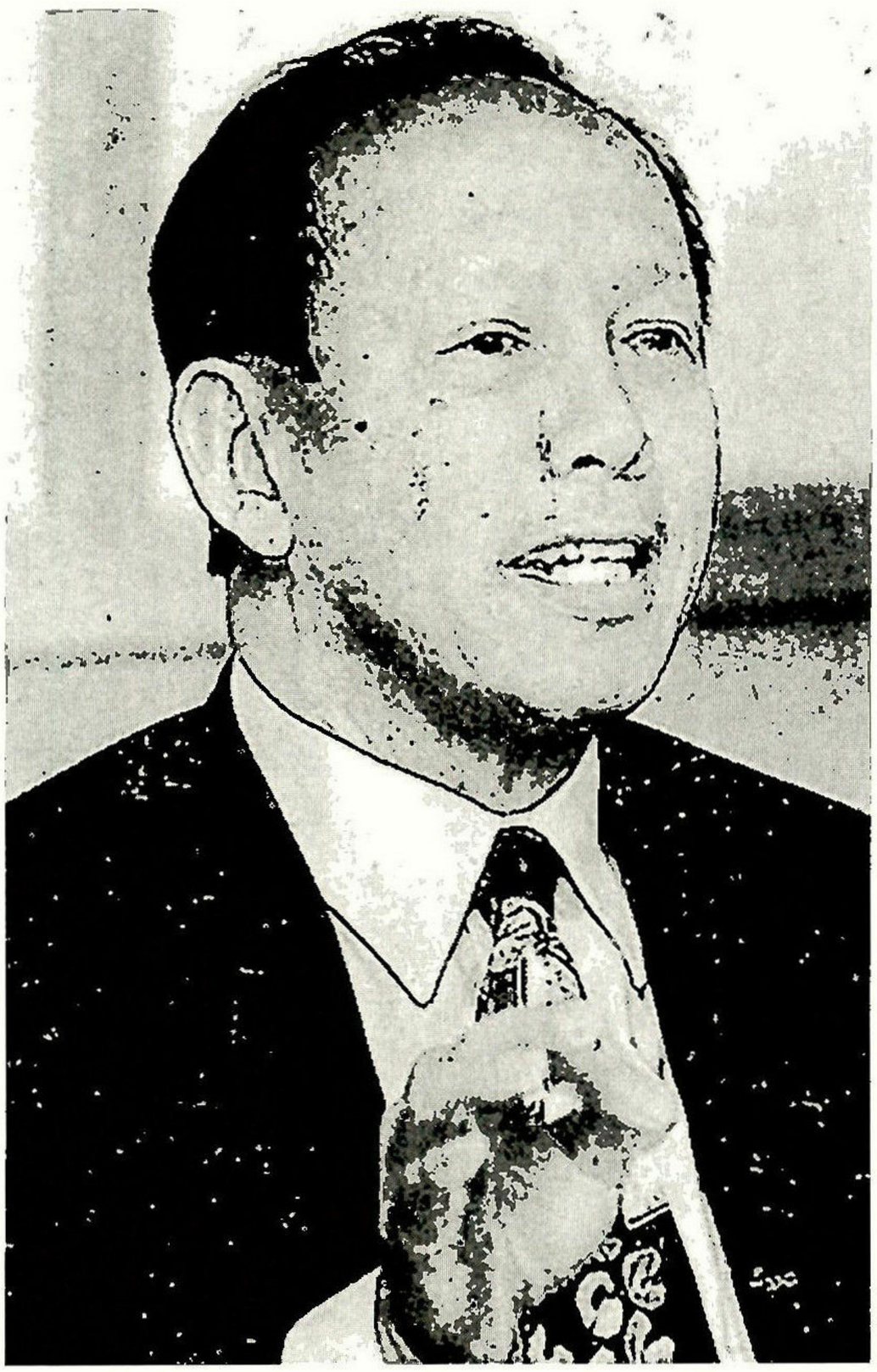
久而久之，持续性的机制改革将让外国投资者觉得东亚是个友善的投资环境。公司帐目的透明度和保障小股东利益等课题在股价上升时被忽略，如今也成了重要课题。在目前的高风险环境里，更大的透明度将是说服国内外投资者在当地企业投资的关键因素。东亚政府是务实的，它们明白自己必须改善企业方面的管理和法律架构，才能吸引外资。

这些结构性改革也将让本地和外国商家、大型和小型企业都能在公平的制度下竞争。就如世界各地的小型企业一样，企业的灵活性往往弥补了规模方面的不足。德国活跃的中小型企业如果现在在东亚起头，它们将能发挥超越本身规模的力量。同样的，东亚的中小型企业受大财团的问题影响可能较小，因此能较灵活性地应付这次危机。

西门子总裁皮尔博士今年2月向东亚协会致词时说，不进入亚洲的危险比留在那里的危险更大。当亚洲经济体重新增长时，而有朝一日它们一定会如此，那些将业务移出亚洲的企业可能难以取回本身的市场地位。为了显示这不只是空话，西门子今年在新加坡设立了一个新的表面滤波器制造厂。尽管本区域面临经济问题，其他的德国企业已经在新加坡投资，或正考虑在这里投资。曼内斯曼(Mannesmann)在新加坡现在的德国中心隔壁设立新的区域中心。德国后勤公司劳传(Logtrans)开设了一家耗资2千400万新元的区中心，以便为客户，包括有意从新加坡扩大业务的中小型企业，提供后勤支助。这些投资计划显示，德国工业在计划业务时并不受到当前问题的局限。

我鼓励你们探讨东亚所提供的机会。新加坡仍然致力于促进邻国的复苏。最近宣布的德国——新加坡加强伙伴关系的行动，将加强两国商界的合作。新加坡是德国工商界进入亚洲的门径，就像德国是亚洲商家进入欧洲的门径一样。我们欢迎你们来新加坡，一个让你们进入东亚的跳板。东亚复苏时，我们将分享利益。

(星洲日报 18/10/98)



慕沙谈论“改革运动”

慕沙希淡接受《马来西亚前锋报》专访。

11月1日在接受《马来西亚前锋报》专访时，慕沙希淡畅谈了他对改革运动的看法、现代马来社会不安、领袖的度量、马来人应该“缺乏教养”、他与安华的关系、马哈迪的领袖素质，以及巫统的当前急务。

自安华被革职以来，这是慕沙希淡首次公开谈话，而且是综合了国内数个重大课题，发表有别于他人的精辟见解。

访谈全文

坦白的说，对于现在所发生的一切，我把它当成现代马来社会的不安。

这情景清楚的显示，现代的马来人不再是属于过去的传统、保守和封建式的。过去的马来人恪守传统风俗、畏敬君主、尊敬领袖。

在过去，他们倾向于依从领袖的言论和指示，但是，目前情况已经变了。在过去，这一切是事实，不过，这些元素不再完全存在。

感谢上苍，我看到继1969年五一三事件后推行的新经济政策，有着本身秘而不宣的用意，即加强种族团结，以及把马来西亚提升成为一个国际社会崇敬的国家。

它消除贫穷，推行财富均分，使得曾经一度落后的马来族群，得与其他种族平起平坐。我们已经在数项领域取得了成就，在取得成就后，马来社会已经有着诸多的改变。

现代马来人要思想成果

在我看来，现代的马来人不只是要求物质生活及生活便利，他们要更多的想法和思想成果。肯定的是，他们不再要全盘接受领袖给予的一切。我们必须接受这个事实，才可以去理解最近推行的改革运动。

我觉得，如果我们了解这个发展趋势，那么我们不难去分析今日所发生的一切。

针对拿督斯里安华的支持者所推行的改革运动，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它可被诠释成正面的行动或负面的行动，这得胥视谁是发起人。

目前在我国，改革的字眼被发起人用在负面方面，明显的，它的意图是反抗政府。我

这话是摊开来说，政府以及高层领袖也看到这个事实。这不能被否认。

若社会大众想知道我的看法，我要说的是：我们是需要改革。我认为，若改革运动是非情绪的、非压力的或偏帮一方的，为什么我们不能推行改革。

暴力不能解决问题 人民不应街头示威

我们必须接受，改革是所有政府都必须推行。我认为，一个发达的社会是一个有动力的社会，而不是一个静止的社会。

如果我们向来都是处于静止的状态，我们不会达到今天的成就。在马来西亚，人民已经取得成就，而他们要继续争取成就。因此，改革以及富有动力的更替将持续下去，也必须持续下去。

目前，我们必须思考的是，我们要何种的改革形式。不管你接受与否，这场辩论方兴未艾。

我认为，每一个人或每一个群体都有权力要求改革。我所指的改革，不是目前许多人跟从的改革运动，而是有助于社会前进的正面改革。

我们需要的改革不是使用暴力的，而是能自由表达本身的看法，以及拥有选择的自由。在巫统也是一样，党员必须拥有选择领袖的自由权利，而不应该受到压制。

我认为，人民不应该通过街头骚乱及破坏公物来反抗政府，现有的政府是在全国大选胜出的民选政府。首相之被委任，因为他是赢取得多议席的政党领袖。如果他们对他不满，他们可以在来届大选挑战国阵。

基于这个理由，生存在民主国度、思想成熟的国民不应该参与打著“街头暴力式的人民政治力量”旗帜的骚乱行动。

根据我的经验，骚乱和暴力并不能解决任何政治问题，它只会为人民带来不便，使得情况进一步恶化。如果以暴力的方式来推行改革，将导致局势动荡不安，对国家构成负面影响，最终吃亏的是所有人。

但是，如果只是在街头高喊改革的口号，或是高举布条，这只是平常事。对我来说，这是与改革有关的示威。

被指倾向安华 慕沙：狭隘看法

我是很诚恳的提出此事，我并没有偏帮任何一方。我要解释的是，我和安华的关系，一直是维持在一名前副首相和副首相的关系。

我知道，有人指我倾向安华一方。对我来说，这是最狭隘的看法。他们做出这样的指责，就只因为安华数次到我家中来，我也曾被邀请到他家。

人们却不知道，我也常常和首相拿督斯里马哈迪医生会面。我认识马哈迪，我也认识安华。

正如同我所说的，马来社会已经改变，他们现在敢于针对某一个课题，以严肃和果敢的态度提出质询。这一切对社会来说，都是好的。

慕沙：勇于发问及勇于质疑

我也曾经呼吁马来人表现得“缺乏教养”。当我在政途上遇到难题时，这一番言论被人错误地引用。从中立的角度来看，我所说的“缺乏教养”是一种勇于发问和勇于质疑的概念。

勇于发问和勇于质疑，是证明某个人仍活跃和“活着”。要取得进步，我们必须发问和批评。这才是民主的精髓。

与此同时，我要提醒国家领袖，尤其是巫统领袖，维持真正的民主制度，不要质疑个人发言的权利。这就是我所说的民主；第二个人和其他人的意见是很重要的。

在患病时，我们常常可从其他医生获取第二种不同的意见。何况是社会的疾病，我需要第二个人、第三个人，甚至是其他人的意见。

我觉得，只要我们能够给予个人一些空间和自由，让他们去诠释第二种意见及其他的意见，那我们做为一名领袖的可信程度将保持不变。

对我来说，全面听取个人自由的声音，以及听取社会所有阶层的意见是重要的。我们得表现主动，这好过被动。

若指出错误可带来好处，但指无妨。在我看来，若有一些想法是领袖未曾想过的，它就不可被深入研究，以及用来应对现有的挑战。

就因为如此，我要提醒新进的领袖，尤其是巫统的领袖：

职位愈高，胸襟应该愈大。容忍的态度是衍生出正面思潮的主要因素，可栽培出行动一致的马来西亚民族。这同时必须注入自由主义和开阔的视野。

领袖须持积极态度 勇于面对批评挑战

根据我个人的观点，缺乏容忍的态度以听取批评的胸襟，是导致诸多政治纠纷的因素，最后演变至今天的局面。

为此，每一名领袖必须持有积极的态度，勇于面对来自国内外的批评及挑战。

不要忘了，我们的社会已经迈入了新纪元，而且我们已经在资讯工艺纪元取得了成就。这得感谢提倡资讯工艺的马哈迪医生。

我仍然记得，马哈迪医生在初入政府执事时，就不断提起资讯工艺的先进，它将进入每一户家庭。这些话是我们初入内阁时，马哈迪所说的。马哈迪给“讲课”，而我们就讨论要如何掌握这个课题。

时至今日，马哈迪医生所说的果然实现了。大家使用资讯工艺，因为没有其他管道获得“第二种意见”，这就是有关于网际网络的故事了。

我的个人观点是，在网际网络上流传的讯息，有些是正确的，有些则是大谎言。我必须承认网上一些谣言是恶意的，譬如说我是一个基督教组织的首领。我一直以来都没有做出反应，乘此机会，我要澄清那是非常大的谎言。

我知道自己没有办法阻止这类诽谤的言论散播。做为一名奉行民主的人民，我能够做什么?

国家面对政治困境 领袖须寻解决方案

谈到国家现在面对的政治困境，我认为高层领袖有必要改善及纠正现有的情况。减少对抗、不要互相指责，最重要的是高层领袖必须坐下来讨论，如何寻找解决方案。

与此同时，我觉得高层领袖应该把集中点放在恢复国家经济。但我必须坦白的说，我个人不赞成目前所采取的措施。

我鲜明的个人立场不意味著我反马哈迪医生、反巫统或反政府。我必须诚恳的说，马哈迪医生是一名勇敢的领袖、非正统的。他所采取的方法或许能够成功。

希望巫统大选获胜 劝马来社会团结

虽然我不赞成国家恢复经济所采取的措施，但我祈祷它将会成功。我不想成为一名破坏者。反之，做为每一名爱国的公民，我们全部都应该给予支持。

我真诚希望马哈迪医生能成功。如果我们清楚马哈迪医生的历史，他多次从失败中取得成功。

我们应该把重点放在经济课题上。倘若经济情况得以纠正，真主允许的话，国阵将获得人民的信任。

照我看，如果经济情况回复，大民重新信任首相，国阵要在来届大选取得大多数席位是没有问题的。

我不希望看到巫统在来届大选遇到任何问题，我要巫统获胜、我要巫统继续统治国家、我要巫统继续取得成就。要达到这一切，巫统必须从现在开始做好准备。

与此同时，我要提醒马来社会珍惜团结，切莫忘了团结是国家进步的支柱。

(星洲日报 2/11/98)

从印尼暴乱受害者看华人受凌辱的历史

范俊登文/沈维河译

在反苏哈多声中，印尼5月中发生血腥暴动，暴民对印尼华人展开的攻击行动，已受到世界许多人的抗议，主要是来自中国、香港、台湾、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其他地区的华人。

根据估计，在印尼暴乱期间有超过160名华裔女性被强奸，其中一些被奸杀。甚至联合国也已抗议这类暴行。

当然，这并非印尼华人遭暴民攻击的第一次。过去也曾发生多次这类攻击事件。

例如，在1965年流产政变过后，正在蚕食苏卡诺总统权力的苏哈多在印尼展开行动，有数以万计的人被疑为共产党分子或共产党同情者而遭杀害。

该项恐怖运动在1965年10月、11月和12月持续发生，并且由爪哇迅速蔓延至峇厘岛、苏门答腊、婆罗洲（加里曼丹）、龙目、帝汶和其他地区，估计在那场大屠杀悲剧中的受害者，大部份是华人。

在爪哇，印尼共产党总部于10月8日遭到攻击和焚烧，知名的共产党分子被谋杀。暴民也对华人展开暴行。许多无辜者包括妇孺被杀害。

迫害华人的历史

迫害华人的事件，在世界一些地区具有漫长的历史，而不只是在印尼发生而已。例如，在1880年代，美国即曾发生许多对华人具有偏见的事件，甚至是在被认为忠实的基督教徒间。

宋耀如（中国著名宋家姐妹的父亲）年轻在美国求学时，必须面对对华人具有偏见的局面。根据斯特林·西格雷夫所著的《宋氏皇朝》一书，宋耀如在美国田纳西州的基督教徒老师在与长者的私人通信中，对宋耀如以恩人的姿态自居，并且发表具有种族主义语气的言论。他常被贬称为“中国佬”。

1885年12月，在太平洋西北部，排华暴动在西雅图引起大恐慌，以致当时的美国总统克利夫兰被迫采取行动。

斯特林·西格雷夫在其精心研究的这本书中指出“美国的蛮荒西域猖狂地展开排华行动”，华人“被在长满果树的平原上的白人削掉头皮”。

西格雷夫继续写道：“随着白银业的崩溃，经济萧条横扫西海岸，工作难找。厂商转而聘请华籍劳工，因为‘他们要求较少’。

他补充：“为了报复，失业的白人被卑鄙的编辑和政治人物煽动而陷入‘黄祸’狂潮。许多华埠被人焚烧。

“白人警卫队队员举行‘剪猪尾派对’，他们不只剪掉中国

佬的辫子，还扯掉他们的头皮。

在一些地方例如远至蒙大拿，也发生砍头的事件（这并非美国的特征）。西格雷夫提醒我们，“有成千上万名华人逃避美国的白祸”而回国。结果，在美国西部的华裔人口由1800年代末期的11万降至只有6万。

1885年，在怀俄明州（所谓的“平等州”）洛克史布林斯镇的白人暴民劈死了28名华裔居民和烧死其他人，而该镇的淑女则站在旁鼓掌大笑。

看来这些“文明”人只是听从《蒙大拿州人》一书编辑的忠告，他写道：“我们不在乎听到中国佬不时被杀的事，但是，这种事最近发生得太密了。不要杀害他们，除非他们该死；而当他们该死时，为何要分批来杀他们。”

排华的法律

在美国，有越来越多的地方法律，以致美国国会开始限制华人移民该国——这是美国首次限制某个国家国民进入其领土。

本来，中国的满清统治者是禁止中国人离开自己的国家的。然而，某些外国尤其是美国却需要廉价劳工。第2次鸦片战争（1856年—1860年）的其中一项结果是满清被迫让中国人移民。美国是大力鼓吹“卖猪仔”的西方列强之一。

通过1868年的伯林格姆条约，美国国会核准中国与美国人民自由来往的权利。然而，当美国内的铁道完成时，廉价劳工却变成了一项负担而非对白人的一项赐予。

美国国会便大修改伯林格姆条约；1882年，它通过“排外法律”，除了教师、学生、商人和游客之外，禁止所有其他华人入境。

已在美国境内的华人不准成为美国归化公民。来自中国的移民人数由1881年的4万名剧降至1887年的只有10名而已。

后果如何？西格雷夫这么总结：“中国的反应是剧烈的。小群暴民攻击美国和欧洲国家的使馆。在某些郊区，外国人的旅行是冒着极大的风险。在西方报章和历史书籍中，大部份的注意力是投注在那个时期白人在中国所遭受到的耻辱，而忽略了在美国发生的同样可怕和组织好得多的排华暴力事件。这种歪曲事实的做法，让西方列强能够对北京的脆弱帝国政府施加新的压力。为了平息洋人的怒气，中国军队被派镇压当地的抗议行动。在外交压力下，北京发表声明，呼吁所有中国人与基督教传教士和平共处。然而，华盛顿方面并没有作出同样的努力，以控制美国的黄祸暴民。”

排华的战争暴行

有关在第2次世界大战前和大战期间日本人对华人所展开的大胆种族主义暴行，国际历史学家和学者都有良好的记载。

由于篇幅有限，我不能在这里详谈日本人在1937年至1938年期间所犯下的南京大屠杀事件，只能提醒我们在日本侵占南京的第一个月，估计有25万名中国男人和妇孺被杀害。那时约有2万名妇女和最年轻只有10岁的女孩被强奸。这些战争罪行和不人道的罪行，至今还未受到日本当局的完全承认，而许多当时的日本领袖包括已故日本天皇裕仁并未受到足够的惩罚。

我们也应记住在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新加坡、马来亚和香港的华人如何被挑选出来受尽折磨和奸杀。

我们可以看出，沉溺于排华暴行的不只是印尼的党徒和流氓，许多白人和日本野蛮人也犯下同样罪行。

这项事实当然并不会减轻印尼暴民的严重罪行。他们必须受到最强烈的谴责，而印尼当局也必须立即采取具有诚意的步骤，确保罪犯被捕和受到最严厉的惩罚。

这不只是由于经济理由而诱使印尼华人回去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身为人类和印尼公民或居民，印尼华人享有基本人权，他们必须像其他印尼人一样受到彻底的尊重和保护。

更广阔的视野

在这方面，一些印尼分析家的观点似乎有些优点，他们认为国际的抗议（主要是来自华社）不应只集中于5月暴动的印尼华裔受害者的困境，也应关注所有受害者的困境，而不管他们是属何种族或宗教。

今年9月21日来自雅加达的一项路透电报道，分析家已警告，国际的抗议可能会进一步激怒情绪而扩大当地印尼人与少数民族华人之间的裂痕。

一名独立的政治分析家和报章专栏作者苏惹迪兹旺多诺说："外来的反应似乎于事无补。"

他说，国际的叫嚣已使到一些回教徒相信国际的反应是一种要他们丢脸的运动。回教徒在印尼人口中占了绝大部分。

兹旺多诺说："他们可能把这件事归罪于华人，而激起更多的排华情绪。要挑起群众的种族和宗教情绪，是非常容易的事。"

另一名分析家莫哈末希甘说，暴动和强奸的问题应被视为滥用人权的问题，每个人都要面对这项问题，而不只是某个族群而已。

他说："否则，你最终将协助一些狂热分子、保守分子或不民主分子加强有关指外界正企图使印尼和回教徒丢脸的阴谋论。"

莫哈末希甘补充："如果他们方便的话，他们就可能会怪罪予华人。"

我相当同意上述2名分析家的见解。然当，指出在暴动中的强奸受害人印尼华人占多数（超过160名），这并没错。然而，我们也必须记住，在暴动中被杀死的1千200人当中，大部份是本土印尼人。

我想，更好和更有效的策略是：（一）与进步的印尼人团体包括回教徒团体和非政府组织联合起来进行抗议，并且坚持要求当局针对5月印尼各地发生的强奸和杀害事件作出全面和公平的交代；（二）尽量动员人权团体、非政府组织、国际团体和甚至世界各地的政府而非华族团体来支持有关的抗议，并呼吁印尼政府坚决保证这类事件不会重演，以及罪犯将受到严惩。

再者，这项策略可尽量减少可能引发暴民对印尼华人展开新暴行的风险。

（南洋商报 4/10/98）

印尼华人留下的空位 任何人都可以填补？

湛焕义

7月中旬，印尼总统哈比比接受《华盛顿邮报》的专访，对逃离印尼的华人迟迟不敢回国的问题发表了"高见"。

一、"如果华人因为不信任自己的国家而不愿回国，我不能强迫他们回国，任何人都不能强迫他们"；

二、"华人与土著印尼人之间的紧张关系是属于社会性质的"；

三、"华人不回国，印尼不会完蛋"，"他们的空位将被其他人填补"。

稍有一点常识的人只要加以分析，就会发现，哈比比总统的说法实在有失水准。对于印尼华人与印尼政府二者到底谁不信任谁的问题，人们只要了解华人反对荷兰殖民者所进行的斗争、华人为印尼独立所作重大贡献、华人为归化所作的努力，了解印尼历届政府对

华人所实行的种族歧视与种族压制政策，答案就一目了然了。

随着印尼民间组织及政府的调查机构对华人受害的调查的展开，华人与土著印尼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到底是属于社会性质，还是属于政治性质的问题的答案也将不难得出。对于这两点，是用不着费一点笔墨加以驳斥的。

至于第三个论点："华人不回国，印尼不会完蛋"，这是千真万确的。但是华人的空位是否任何人都可以填补呢？如果由其他人填补华人的空位，印尼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进程会怎样呢？这倒是值得深思的。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华人在东南亚获得经济上的成功的原因及印尼华人在经济中的重要作用，恐怕就会得出与总统先生截然不同的结论。

背井离乡的拓荒者

东南亚华人大多是十八世纪以后从中国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渡海而到东南亚的。他们背井离乡到东南亚后面临的环境比北美早期的拓荒者所面临的环境还要恶劣得多。

他们没有从本国政府获得任何保护，受着土著的排挤，处在一种不安定的、充满危险的状况之中。因此，作为"弱者"的华人一边适应本地环境，一边为了生存和发展而进行各种冒险，艰苦地创业。

由于在政治上得不到半点保护，享受不到一点权利，经济保障对他们来说意义极为重大。因此，他们不断地进行智力和物质上的投资，以求获取较大的利润，积聚一定数量的财富。企业家获得成功所必需的冒险精神地就深深地植根于华人的心目中，这为他们经营企业获得成功提供了精神支柱。

东南亚华人企业家获得成功的另一原因在于他们继承了古代古国商人的传统，按行业、按地缘，甚至将行业与地缘结合起来，建立起企业网络。

华人通过这些网络，既可以相互帮助，提供商业机会，也可以将华人团结起来，与共同的对手抗争，这无疑增强了华人企业家的整体竞争能力。

进了90年代后，华人企业网络不仅数量增加，而且趋于国际化和现代化。据统计，二战结束后，世界上有华人网络3975个，到90年代增至9500个，跨国华商网络达60个左右，每两年召开一次世界华商大会。1995年，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开创了通过交互网络提供华人企业数据库的服务。

领先一步
构筑全球性网络

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家奈斯比特对此做了一些评述："当世界从单一的独立国家经济向网络经济转移时，华人已经领先一步构筑起最初全球性的种族网络。""由于华人网络具有交互网络的特征，同什么地点联系都行，在什么地方联系也可以。因此，可以选择一个对此感兴趣的伙伴，例如可以与相同行业的企业，或者同中国、马来西亚或印尼直接地相连结。"

可以肯定地说，这种网络会巩固和扩大华商在各地的地位和影响。

华人的投资意识和冒险精神，华商网络显然是土著印尼人所不具备的。更何况，华人控制着印尼70%左右的经济活动。滞留海外的印尼华商手中掌握着200多亿美元的财富，这更是印尼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本源。

如果我们把印尼的国民经济比作一座框架式的现代建筑物的话，印尼华人并不是建筑物内可以任意搬动、填补的墙壁，而是建筑物赖以高高耸立的框架。框架不存在了，这座建筑物也就倒塌了。

最近一段时间内，哈比比总统的态度似乎有了一些变化，一再表示自己是印尼华人的伙伴、朋友，保证归国华人的生命与财产安全。但是华人仍然疑虑重重，因为他们只听见打雷不见下雨，印尼政府还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的行动严惩暴徒，立法保护华人的利益。

（作者是中国广西师大历史系教授，现为新加坡东亚研究所访问学者）

（南洋商报 4/10/98）

印尼同化政策

走进死胡同

黄昆章

1998年5月印尼发生的反华暴乱至今已四个多月。种种迹象表明，苏哈多政府从1967年推行的强迫同化华人运动已陷入死胡同，处于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

强迫同化＝种族歧视

所谓同化，指的是“一个民族（或其一部分）失去一个民族特点而成为另一个民族。历史上有两种民族同化：一种是强制同化，另一种是自然同化。”

早在60年代初，印尼即已出现同化派。他们主张在政治、文化、经济、社交及婚姻等五个方面对华人实行同化。1961年1月15日由30人署名的《同化宪章》指出：“对华裔公民来说，同化意味着一个华裔被吸收到单一的印尼民族中来，使其原来具有自己的特点的集团最终不复存在。”不过，由于当时的苏卡诺政府对此持中立态度，加以华人社会强烈抵制，因而同化运动只能缓慢进行。1965年由中国籍华侨主办的华文学校有629间，学生有27万多人，华文报纸有13家。还有众多的华侨社团。因此，以中华文化为主体的华人文化仍保留了下来。

1966年苏哈多政府上台执政后，同化被列为既定国策，而且利用政府力量强制推行。1967年成立处理华人事务特别小组负责实施，1977年10月成立促进民族团结联络机构，加快同化运动的步伐。因此，它已演变为强迫同化运动。

强迫同化运动既以消灭华人特征为最终目标，因而首要任务是消灭中华文化。为此，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取缔所有华文学校、华文报刊及华侨社团（为使不识印尼文的华人了解政府政策，由政府开办一家一半印尼文一半华文的《印度尼西亚日报》）。禁止在印尼出版及进口华文读物。禁止在公众场所讲华语。有些地方甚至禁止用电话讲华语。不准在大众场合有华人文化、风俗习惯的表现形式。万隆当局甚至曾禁止华人墓碑刻写华文文字，后因遭华人强烈抗议而作罢。60年代，孔教被承认为六种合法宗教之一，后来被认为来自中国有碍同化运动，于是被排斥在外。1988年政府下令清理华人寺庙中有中华文化的标志（龙、凤及华文文字等），并禁止新建华人庙宇。禁止上演有中华文化内容的文艺节目。流行于民间的中国太极拳被改名为“印尼疗法操”，配上印尼音乐。等等。

为增强华人的归宿感，政府从1980年起，连续数次简化入籍手续，鼓励华侨加入印尼国籍。以达到政治同化的目标。

60年代以前，印尼社会称华人为“中国人”(Orang Tiongkok)或“中华人”(Orang Tionghoa)，1967年7月25日，政府宣布用带歧视性的“支那”(Cina)来代替“中国”及“中华”。

一些地方召开华人改名大会，掀起换名运动。政府还认为异族通婚以及皈依伊斯兰教是达到同化目的的有效手段，

因而鼓励华人同印尼人结婚，提倡华人信仰伊斯兰教。

在抓紧同化工作的同时，苏哈多政府却实行了一系列歧视华人的政策。例如，把华人诬蔑为“经济动物”，胡说华人控制了印尼70%以上的经济，成为反华事件的诱因之一。限制华人学生在国立大学深造。禁止华人从军从政。30多年来，没有一位华人进入内阁，1998年3月，郑建盛(Moh. Bob Hasan)任贸工部长，5月即下台。华人的身份证上被打上特别记号。等等。

90年代以来，政府从经济利益考虑，有限度地放松了华文政策。允许旅游部门开办华文补习班。印发华文旅游小册子。娱乐场所可以上演中国歌舞。但是，政府强调，必须警惕文化侵略。同化华人的方针未变。

国际法规定，世界各民族地位一律平等。印尼宪法第10章第27条也指出：所有公民在政权和法律上的地位一律平等。但从上述种种情况可知，强迫同化运动无视国际法和印尼宪法，已成为种族歧视运动。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一旦各地发生政治骚乱，就很容易演变为反华事件。华人成为里外不是人的二等公民，过着忍气吞声无可奈何的日子。

正义的抵制

应该说，强迫同化运动是收到了一些成效的。例如，90%以上的华人选择了印尼国籍，在政治上已认同主流社会。45岁以下的华人由于丧失了学华文的权利，绝大多数已不谙华文。对中华文化知之甚少，对祖籍国感情淡漠。他们已决心世世代代在印尼生活下去。

然而，华人又从亲身经历中体会到自己被歧视被排斥的下等地位。许多华人尽管无奈，仍然表现出种种强烈的不满和抵制。例如，华人仍喜欢聚居一处，讲家乡方言或普通话。有条件者将孩子送到外国去上学、工作。请家庭教师为孩子补习华文。坚持使用华文姓名。在一些聚会上唱跳中国歌舞。小摊上的华文报刊很畅销。华人青年一般在同族内结婚。信仰伊斯兰教华人比例很小。在婚丧喜庆典礼中，仍坚持华人的生活习俗。许多土生华人青年经常对种族歧视发泄不满情绪，等等。

5月反华暴乱是种族歧视的大暴露。华人生命财产受惨重损失。更有上千华裔妇女遭强暴。一些人致死。在中爪哇一些地方，一些原住民挖掘华人坟墓，弃尸荒野，盗走陪葬贵重物品，使墓主家属悲愤莫名。“赶走支那人”、“血洗支那人”的传单和流言到处流传，愤怒的华人为保身家性命，被迫和印尼邻居一起拿起武器自卫。十几万华人到外国避难。许多华人和同情华人的印尼人纷纷通过各种途径向联合国以及各国政府控诉。暴徒的行径遭全世界人民的声讨和谴责。

按照同化论者的如意算盘，华人群体将在较短时间内消失，融入主流社会之中。实践证明，华人由于受歧视受压迫，他们已对政府失去信任。有的对前途悲观失望，已到外国定居，还谈什么融合或同化？这真是对同化运动的莫大讽刺。

改弦更张方为上策

当今世界，人民觉悟空前提高。种族歧视、民族压迫已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追求民主、人权和民族平等已成为世界主流。

强迫同化运动逆世界历史潮流而动，因而是反人权、反平等的反动政策。世界上一些过去曾实行这一政策的国家早就加以摒弃，转而实行多元文化或自然同化的政策。如今，在这些国家生活的各族人民，仍可保留本民族的文化习俗，大家和睦相处。安居乐业。

一些有远见的印尼人及华人很早就批评强迫同化政策行不通。例如印尼大学讲师安妮·苏集多1989年12月认为，实践证明，全面同化、企图消灭中华文化，清除中国人的特征是非常困难的。1990年3月内政部长鲁迪尼承认，同化华人的步伐进展缓慢，华人的思想态度没有多大改变。5月暴乱更使许多人清醒过来，1998年6月，印尼学者沙尔里托·威拉宛指出，同化政策走错了方向。

哈比比政府唯有重新检讨华人政策，顺应人民的呼声，制订反歧视法，放弃强迫同化华人的方针，真正实行民族平等的政策，承认华人是少数民族，才是唯一的出路。只有这样，才能恢复华人对政府的信任。

(南洋商报 20/9/98)



所罗门史密特巴尼公司
主席德利摩根

委任政府财务顾问
海外筹资
为银行解困

杨名万

首相拿督斯里马哈迪医生宣布委任美国投资机构，所罗门史密特巴尼(Salomon Smith Barney)为财务顾问，以协助政府重组银行系统，显示政府关注金融风暴打击下的银行系统状况。

该投资机构的主席德利摩根已表示，该机构将协助大马到海外去筹资，以供注资人我国有需要的银行机构。

有问题银行须注资

很明显的，政府委任这家美国投资机构主要是为国家资本基金公司筹资，该公司的任务就是在银行机构有任何资金不足问题时，注资入该银行以承担其需要。

首相在宣布委任这家投资机构时指出，该机构将负责提供有关重组银行业的咨询劝告。这意味为资本基金所需资金筹资只是该机构的一部份任务，但是，很明显是一项最重要任务。

根据国家经济振兴计划及国家银行，专门负责注资人银行的资本基金公司(DANAMOAL)所需的资金只是约160亿零吉，前国行副总裁邝荣柏曾说过这笔资金只是在情况最恶劣到比预期还糟得很多的情况下才会需要。他不认为银行系统注资行动需要这么多资金。不管怎样，对于拥有逾4千多亿零吉存款的我国银行系统，160亿零吉资金其实算不了什么，而且，国家银行或甚至资本基金公司本身要筹集这笔160亿零吉或约42亿美元的资金并不很困难。从这点看来，所罗门史密巴尼机构的任务并不是这么简单。

大马外债并不严重

单单在筹款方面，除了资本基金需要的160亿零吉资金外，我们还有一个负责解决银行系统呆账贷款的资产管理公司这个架构，这个专门收购银行系统呆账贷款的机构，需要资金250亿零吉或约66亿美元。由于资本基金所需的资金很少，因此，所罗门史密特巴尼机构料也将承担资产管理公司的资金需要，总的来说，如果该机构只负责银行领域的重组工作，则它所需筹集的资金只是约110亿美元或418亿零吉。

正如该机构主席德利摩根指出，我国的外债情况并不严重，经济情况仍能允许政府往海外筹集更多资金。根据国家

银行的第2季经济报告，我国的外债目前已进一步减低至406亿美元（1千543亿零吉），比本区域我们的许多其他邻国都强，而且，我国的大部份外债是属于私人界外债，政府只不过占不到10%，政府有绝对能力可再借外债。过去，我国将往海外筹资的计划搁置，主要是因为我国被国际评估机构调低评级所影响。随着委任了美国的投资机构负责去筹集这款项后，这问题将不存在。

政府在这时期毅然决定委任美国投资机构充当财务顾问，主要是因为政府已急欲看到我国经济能有比较明显的经济好转成果，同时避免政府好不容易采取外汇管制剧烈措施取得稳定及挽回的一些信心，会因为银行系统所可能出现的任何不测而受打击，则重新再出发将化费更多时间，令国家经济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呆账总额逾500亿

在现阶段，资产管理公司与资本基金公司这两个架构已开始运作，并且已经处于箭在弓的阶段，资产管理公司已收购阿芬英雄银行的呆账贷款，而资本基金公司则已注资15亿零吉入正在合并中的森合与兴业银行集团。现时，资产管理公司已接到不少银行欲售卖其呆账贷款的献议，资本基金公司则会在银行系统呆账贷款急速上升，一些银行在售出呆账贷款后仍面对资金不足的情况下，亟需注资援助。

不容质疑的是，我国的呆账贷款正急速上升，截至5月杪，呆账贷款总额只是约316亿零吉，但是，到6月杪时，这数字却已急速上升，并超越500亿零吉大关至逾528亿零吉，这种急速上升的情况肯定的受到国家银行及各有关当局的关注。

由于我国银行贷款过去急速扩张，使到贷款基础比1985年代大约6倍，因此，此次呆账贷款比率虽然远比1985年代过后的比率低很多，但是，因为这些呆账贷款而令银行机构所需要注入的资金却不是小数目，这点国家银行须谨慎防之，委任所罗门史密特巴尼任担任国家银行显示了政府并不小看这问题。健全的银行系统是我国经济此次能避过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的基础，政府必须不断加强这领域。

可能重组银行架构

除了银行系统所可能需要的资金外，政府也可能通过与这家美国投资机构谘询，重组整个银行架构的可能性，这包括诸如废除法定储备金改以存款保险制确保存户有保障般的这类提议，以便更有效的应用银行系统所收集到的资金，不会令太多资金遭银行系统机构绑住。

国家经济行动理事会过去曾提出许多诸如此类的银行系统改革建议，所罗门史密特巴尼由于是世界最大银行集团之一的万国宝通旅行者集团里的一员，财务与金融策划谘询又是该投资机构的业务之一，因此，这家来自美国的机构必然能提供很好的谘询劝告。

大马银行系统健全

无论如何，大马的银行系统可说是本区域最健全的系统之一，我们已经有了很好的机制基础，目前只是需要精益求精，进一步加强及巩固这系统。当局在引进任何的改革或重组计划时，务要小心谨慎。更有效率应用国内的储蓄固然重要，稳定的银行系统更加重要，听取这个美国投资机构劝告时，政府务要认清这点。

（南洋商报 11/9/98）

财务顾问与经济顾问之别

政府刚宣布委任美国投资机构，所罗门史密特巴尼为政府的财务顾问(Finacial adviser)。政府原本已有一个国家经济顾问(Economic adviser)，即我们大家都熟悉的现任首相署特别任务部长及国家经济行动理事会的执行主任敦达因。

很多人可能会很奇怪，为什么有了一个经济顾问，还要一个财务顾问，到底经济顾问与财务顾问有什么分别。

经济顾问的任务主要是对于国家经济政策与方针提出咨询劝告，虽然他也可能会涉及一些财务上的枝节，但是，主要是在宏观经济方面提供看法和意见，只有在一些财务上的枝节会影响到整体经济，他才会提出意见和建议。

财务顾问，顾名思义是提供有关国家财务问题的看法和意见。国家的财务顾问通常都会涉及银行与金融系统，及国家所需要的资金等，财务顾问可以提供国内资金流动方面的意见，当然这有时候会涉及改革整个金融与银行系统。

这里举个例子来分辨经济顾问与财务顾问，当政府要提升工业化计划时，经济顾问可以提供意见，认为应将工业提升至高科技工业领域，而当政府像此次需要到筹集资金供注资入银行时，这任务则交由财务顾问承担。目前所罗门史密特巴尼受委为财务顾问，它的职责即在这方面。

财务顾问不一定会长久委任，通常都是基于某个特定的财务需要而委任，一旦任务完成，通常都会告一个段落。经济顾问则会因为政府需要进行不断的经济发展，以加强经济利惠国民，因此，通常会是一个比较持久的职位。

(南洋商报 11/9/98)

所罗门史密特巴尼

资金庞大业务多元化

所罗门史密特巴尼是一家国际金融顾问公司。由所罗门公司及史密特巴尼控股在1997年11月28日合并而成。

所罗门兄弟集团简介

所罗门兄弟集团是世界第一级的投资银行机构，也是世界最大的证券交易商之一，及美国5大证券行之一。

所罗门兄弟成立于1910年，公司的业务包括，证券业，以及为政府、企业及投资者机构提供各种服务，包括包销、研究、金融顾问、投资管理服务等。

该集团是由所罗门家族3兄弟，即阿特(Arthur)、赫柏(Herbert)及柏西(Percy)所罗门以5千美元资金共同创办，这5千美元是他们3人的储蓄及一部分向家族其他成员借取。由于具创业意念，在筹集到这笔资金后，他们3人即离开父亲开设的公司，去纽约百老汇门牌80号的店面开设办事处。

所罗门兄弟公司是在1920年代与一家在纽约股票交易所拥有交易席位的公司，摩登哈兹乐(Morton Hurtzler)合并后，挤身证登业，但是，该公司崛起则是在美国通过自由贷款法令，财政部开始发行债券时，首个注册成为第一家政府公债交易商后，声名大噪。

虽然经历1929年华尔街股市大崩溃时代，但是，所罗门却因为从不接受按金户口交易，宁愿不赚这风险较高的业务而避过美国大部份证券业公司纷纷倒闭厄运。

在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政府须大发公债振兴经济时，所罗门由于业务仍健全，因此从公债发行蓬勃中赚了不少钱。1940年代，因为世界大战，政府同样须大发债券筹款，所罗门兄弟又取得不俗盈利。

由于在这两个年代赚取丰硕利润，所罗门在1950与60年大事发展科技设施，1970年代该集团搬迁到新大厦，同时将业务扩展到国际市场，尤其是落足亚洲，在香港与东京开设办事处。1980年代，该集团革新业务，推出各种新的金融产品。到1990年代时，由于资讯科技已达到新境界，该集团也搬迁新大厦，及设立现代化科技设施。一直到1997年11月26日，该集团母公司，所罗门机构与旅行者集团(Traveller's Group)合并，令身为子公司的所罗门兄弟与对方的子公司，史密特巴尼合并，成为今天的所罗门史密特公司。

史密特巴尼简介

史密特巴尼的历史始于19世纪的费城，年轻的证券经纪，查尔斯巴尼在1873年成立了一家公司，而在1892年另一投资银行家，爱德华史密特也创立了本身的公司。史密特及巴尼都是美国证券业的先锋，在使华尔街成为世界最顶尖的金融市场方面有极大的贡献。

在1987年，史密特巴尼，哈利斯优泛公司，被一家上市的金融服务公司柏利美利加(Primerica)公司收购，这家公司后来被山弗维尔所掌控。柏利美利加较后于1993年7月20日，收购了西尔森廉蒙(Shearson Lehmoan)兄弟在当地的证券零售及资产管理业务，进而与史密特巴尼合并成今天的史密特巴尼控股公司。

在1993年12月31日，史密特巴尼则成为美国金融服务巨霸旅行者集团的独资子公司。

旅行者集团是在1993年12月在属于旅游者机构旗下的柏利美利加的一下收购行动下所成立。它也是一家在美国纽约股票交易所上市的多元金融服务公司。

另外，所罗门与旅行者集

团则在去年9月24日宣布，协议将所罗门及史密特巴尼控股进行合并，成为目前的所罗门史密特巴尼控股。

在同年11月28日，在旅行者集团宣布获得有关方面批准收购所罗门后，完成这宗93亿美元（353亿4千万零吉）成价的收购交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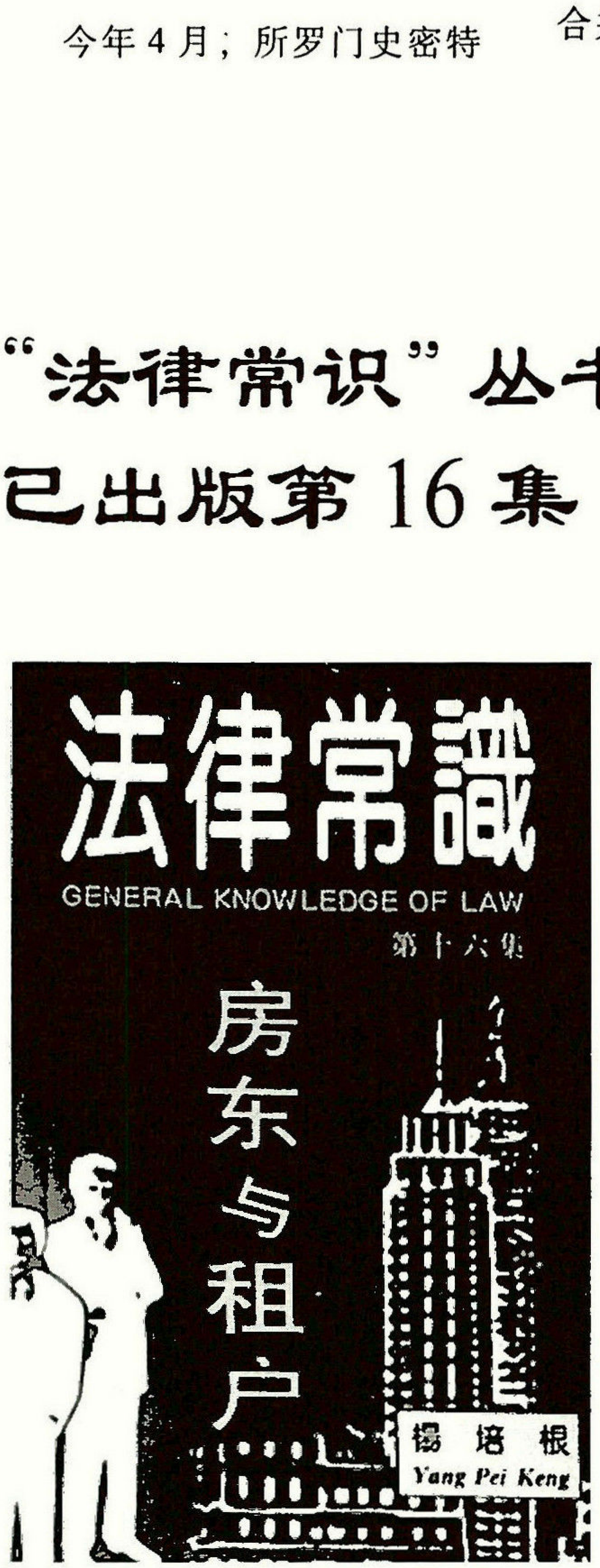
今年4月；所罗门史密特巴尼的母公司，旅行者集团宣布与美国的银行业翘楚万国宝通机构(CITICORP)合并，及组成全球最大的金融服务集团，万国宝通集团(CITIGROUP)。

这项合并交易的总值则是829亿美元（或3千零67亿零吉），在消息传出后，在全球市场造成一阵强烈的震撼。这家合并成的新公司，以资产值计的市值达6千974亿6千万美元（2兆6千503亿零吉）。

这两家公司将各拥有万国宝通集团50%的股权，并由这两家公司的首脑，约翰立克及山弗维尔共同领导。然而，有关计划仍必须获得监管当局的批准方可实行。

（南洋商报 11/9/98）

“法律常识”丛书
已出版第16集





每册定价 RM9.00
邮购请另付邮费 RM1.50

订购处：
华社研究中心 (271806-T)
Huazi Resource & Research Centre Bhd.
No. 1, Jalan Maharajalcla, 50150 Kuala Lumpur, Malaysia.
Tel:03-2734035 Fax:603-2734037

梭罗的一封投书
点燃了狙击之火

南方朔

俄罗斯的卢布狂贬，贬到不得不休市的程度，连带的，也造成全球新一轮的货币贬值和股市狂泻。虽说卢布贬值肇因于俄罗斯本身脆弱的经济体质。但梭罗写给伦敦《金融时报》的一封读者投书却无疑是真正的起火点。

梭罗投书值千万

在那篇被《金融时报》大篇幅、显著地位刊登的投书里，梭罗指出，俄罗斯的金融形势已到了危机前的最后阶段。他主张卢布贬值25%，重建卢布对美元的联系汇率；而7大工业国则应全力协助，筹款500亿美元为俄罗斯纾困云云。他的投书甫告刊出，俄罗斯的本地市场和其他市场，立即出现恐慌性的卢布卖压，俄罗斯的金融危机正式引爆。

对于此事，英国的《卫报》立即刊出了一篇由艾立欧特(Larry Elliott)所写的分析及评论。他指出，“这是件非常诡异的事，作为基金的经理人，梭罗其实根本就不应当写这样的信。”那么，他为何竟然做出这样的事呢？艾立欧特指出，梭罗写这样的信，其实是有目的在焉。由于他深知欧洲国家里，无论经贸投资或贷款，都以德国和俄罗斯最为密切，因此，俄罗斯任何风吹草动，都会波及德国。因此，早在写那封信之前，他即已高价卖出德国马克，轻轻松松就赚了两千万美元，难怪艾立欧特也要说：“两千万美元对梭罗或许没什么，但写封信就赚两千万美元，却真是不错。”

其实，梭罗的那封信到底让他赚了多少钱，情况至今仍然不明。有关德国马克的炒作部分，赚到2千万美元已被许多媒体报导过。此外，伦敦《金融时报》也报导说他借机炒作卢布，大约赚进1亿零700万美元。只是，稍后他的手下德鲁肯米勒(Stanley Druckenmiller)宣称，由于俄罗斯的股价持续下跌，从1月至今，已跌掉80%价值，因而他们在俄罗斯已损失了大约20亿美元。但尽管如此，梭罗的“量子基金”，今年截至目前，仍有19.1%的利润。由于如此高的利润，所谓的在俄罗斯损失20亿美元之说，也就难免让人有所怀疑了。

狙击亚洲最后防线

由他写给《金融时报》的一封信里所藏的玄机，可以举一反三地看出梭罗的基本品质。艾立欧特说：“梭罗是个从来不会为了他所做的事而觉得羞愧的人。”他是那种能吃就吃，不吃白不吃的金融赌徒。他是来自匈牙利的犹太人，但却继承了大约五百余年的法兰克福犹太巷金融炒作的传统。德国的法兰克福从启蒙时代开始，始终就是欧洲的中心城市之一，那里的犹太巷专出金融理财专家，当代几个著名的金融世家，如罗士渣家族、高德斯密特家族，都出身该巷，梭罗当年即打进罗士渣家族，学得一身金融炒作的本领。这种金融炒作，在1970年之前，由于国际金融秩序井然，没有太多缝隙可以钻弄，但1970年代之后，英美右翼政府当道，他们趁著古典的“布列顿森林协议”瓦解后的良机，使国际金融的自由操

弄空间变大，于是，梭罗的时代开始来到。这是个金融上“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新阶段。

在过去十余年里，金融交易已成为一种主流的聚敛行业，梭罗即是这个行业的精神领袖。他纵横欧亚及拉丁美洲，望者披靡。他夹带着钜大的金钱实力，再伙同一群追随者，像狼群守候羔羊般地寻找猎物，而后一涌而上，不弄到骨尽髓干绝不罢休。在金融资本跨国化的时代，人类的历史业已变写。要颠覆一个国家或一个政权，已可以不再需要洋枪大炮，也不必船舰飞弹，70 年代那种暗杀及阴谋政变也都失去了意义。现在更快捷的方法是依靠金融市场的操作，借操作而营造出集体的“惊惶”(panic)。“惊惶”是资本金融市场的本质，一旦“惊惶”被营造出来，再厚的铜墙铁壁也阻挡不了被瓦解的命运。从 1997 年 7 月起，这种金融资本瓦解了亚洲。稍早前，美国评论家法夫 (William Pfaff) 就已指出过，亚洲金融风暴，在本质上即是一个再殖民化的过程，借着金融资本的穿透力以瓦解亚洲国家的“国家”功能。只是，尽管亚洲金融风暴业已满一周年，凋蔽的亚洲却仍然有一座最后的防火墙存在，它由中国及香港共同组成，这座防火墙不倒，亚洲即无法被彻底整编。于是遂有了新一轮的金融再狙击。这一轮狙击有下列的战略目标：

(1)香港是中国裸露出来的一只脚，可以借着挥砍香港而使中国出血，从而让做为亚洲最后防火墙的人民币也告弃守，使亚洲更趋难以获救。

(2) 借着挥砍香港，而使中国及香港的信心危机无限升高。无论迫使香港放弃联系汇率而贬值，或迫使香港变成美元区，都将有经济和政治上的极大利益。

信心危机港币沦陷

这一轮狙击，以 7、8 月间在上海及深圳的美钞黑市及外国人持有的 B 股之炒作为始，以 8 月中旬的香港汇市及股市炒作为第二波。

在上海及深圳的黑市及股市炒作上。中国的外汇存底在 5 月底时已到 1409.1 亿美元，但到了 7 月底已降为 1405.1 亿美元。北京当局为此特修正金融管理条例，禁止金融机构从事不当外汇买卖，同时又以每日 1 亿美元拉抬人民币。人民币最低跌至兑美元为 9 元的价位，此后即告回升。而在 B 股方面，上海最高跌幅仅为 5.24，深圳亦仅 4.07，影响极其有限。大陆金融市场的开放有限，使它豁免于被炒作操弄的对象之外。

但 8 月中旬移师香港的攻势，则情况完全不同了。香港是亚洲金融中心之一，其金融的开放性较东京犹有过之。在亚洲金融风暴之后，诸如马来西亚、泰国等，都已禁止金融期货的交易，以免被外国投机资本炒作，而香港却完全无所防范。而更重要的，乃是九七香港回归，立即被金融风暴波及，这种特殊的情境及问题，遂使得许多人将香港的联系汇率视为一切不幸的替罪羔羊，并将港币贬值视为解决一切问题的万灵丹。这是特殊历史情境所造成的盲点，代表着香港人的信心危机。这种对自己的货币缺乏信心的情势，也给了梭罗为首的跨国金融资本集团极佳的入侵机会。1992 年梭罗狂炒意大利里拉和英国的英镑，若就其因果而论，其实是有战略目的一项出击，期望借此破坏攸关欧洲货币统一至为重要的“欧洲货币稳定机制”(EeERM)。他们此番狙击香港，战略目的极为酷似。

股市汇市连横操作

而在战术上，梭罗等国际金融集团，其布局和前两次炒作大致相类似。

（一）他们大概在四、五月间香港拆息较低时即借入大量港币，而后向市场沽售，兑换为美元，以期借此抬高利率，打击股市。如果香港特区政府宣布放弃联系汇率，他们立刻就可赚到港币贬值的巨大差额，单单这一项，他们大概就可赚进将近 50 亿美元。

（二）除了汇市之外，他们大约购入 3 万 5 千张股价指数的期货合约，在香港它被简称为“期指”。“期指”交易在现阶段形同一种炒作式的超级赌博。它借着抛售港币，拉抬利率，打击股市，重挫股价指数，以赚取股价指数差额的利润。根据保守的估计，设若他们的战术目标达成，在这一项上即可赚入大约 20 亿美元。

而梭罗等人的算盘也并非太过一厢情愿。目前的香港正处于经济中挫到萧条的中间阶段，经济早已呈现负成长，而失业率则渐次升高之中，人们对港币早已出现信心危机，而

国际的喊话攻势更加强了人们对港币和人民币的贬值预期，至于股价则已跌到15年来的最低。这也就是说，此刻的香港形同受伤的羔羊，它的受伤鼓舞着环伺的狼群，准备对它展开致命性的一击。根据香港方面的查证，发现到参与这项狙击的，除了梭罗的“量子基金”、“老虎基金”外，还有大约4家美资的投资公司及基金，动员资金约为50亿美元。

发起金融保卫战

对于这项狙击，8月初，香港由资金的流动及期指合约的大增，以及远期外汇的借用等资料，早已有所警觉。而对于这一波狙击，香港特区政府其实完全没有别的选择，只有干预一途。设若香港拒绝干预，在目前这种气氛下，狙击的结果必然造成惊惶，炒家们预期的战术及战略目标均必然将一一实现。香港将付出的代价是资产再度大幅缩水，经济更趋萧条，而梭罗等则可轻轻松松地就从香港人手中刮掉至少70亿美元。香港有可能在狙击中被彻底摧毁。

于是，香港被迫起而应战，由香港的“金管局”总裁任志刚，财政司长曾荫权领军，获得特区首长董建华的同意，拟订出一组应变战术。香港的干预和北京的关系如何，至今仍然未曾公开，除了知道北京同意香港的反击外，北京是否参与战术之草拟则仍未可知。香港的外汇储备为900亿美元，北京为1千400亿美元，北京的1千400亿美元必要时是否将会加入参战，已成了一个值得注意的关键。据来自北京的消息称，北京动员外汇参与香港的金融保卫战已成定局，只是其幅度仍在保密阶段。

港府说服企业主

香港的金融保卫战，正式的展开是在8月13日，星期四。当天特区政府决定延续8月初在汇市上的防卫以外汇基金收购炒家们抛出的港币，准备同样的用外汇基金介入股市，拉抬股价指数。香港决定翌日正式展开金融保卫战，原因是那是个长周末，而炒家们每次都是借着长周末发难，因而防卫也从长周末开始。8月14日一早，香港将决定正式告知北京，获得同意。于是，一场金融史上从未出现过的金融战争正式爆发了。香港的保卫战术有好几点值得注意：

（一）它以外汇基金承接炒家的抛售，尤其是对绩优的蓝筹股几乎完全的无量承接。这是一种高姿态的应敌态度。

（二）除了以外汇基金承接股票卖压外，在汇市上，香港也以暗中游说的方式，对港商和认同香港的英商展开劝退，希望他们勿提供子弹给那些美国炒家。据一位担任香港政府顾问的人士相告，暗中劝退在这次战役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其中，几位香港在地资本家，如李嘉诚、李肇基等，甚至响应政府的反击，自行掏腰包，买回自己的股票。这也就是说，香港特区政府也的确将这次金融保卫战打成了一次大型的动员式战争。除了外汇基金外，在地资本家，业已香港化了的英资集团，这次大体上都站到了香港政府这一边。

（三）香港特区政府也了解到金融保卫战势必将引发争论，因而自从8月14日开战之后，不但立即召开国际记者会说明，几位香港首脑如任志刚、曾荫权等，也都主动的在国际媒体上撰写专论，对所谓的“干预”、“不干预”、“防卫性的干预”等做出辩护。

香港的金融保卫战，乃是金融史上从未发生过的前例，由于它的对手乃是在全球金融论坛上占有主宰地位的美国跨国集团，因而整个战争，无论就实力和论述上，都打得极为难苦。

首先就实力而言，第一阶段的两周内，这些集团由于低估了香港的意志，仅动员了大约50亿美元的资金展开狙击，以期营造出恐慌，以收渔利。他们虽然在香港强力的反击下受挫，但他们营造出的旋风，却无疑地使得香港有些招架上疲于应付的困难。两周下来，香港大约花掉千亿港币，吃掉了全港股票的13%。这是一种以实对虚的战争，炒家们所付的多半为借来的远期凭证，期指合约的按金，港府却需用实质金钱承接卖压。这对香港不利，这也是金融战争本质上乃是有利狙击者的战争之关键。除此之外，这些美资集团的背后到底还有多少子弹，完全无法预估，持久消耗，香港弹尽援绝，攻方仍可继续发难，这是不利于香港之二。

俄崩盘港市增压

另外，就在香港金融保卫战之际，俄罗斯危机爆发，全球股汇市一片混乱和狂泻，对

香港这简直是雪上加霜。它使得香港股汇双市的压力更增。香港的易受伤害性增加后，将使得狙击者更加会去呼朋引伴，展开进一步的追击。这也就是说，香港的防卫愈来愈像筑水坝挡洪水，当水坝愈筑愈高，危险也就愈大。也正因此，从8月31日起，香港遂改变防卫策略，除了不再高姿态外，做法也趋弹性，并着手提出金融管理的对策，让攻方增加成本，同时也增加攻方的透明度，让攻守双方更趋平等。但纵或如此，香港的金融保卫战仍将极为吃力。设若这场战争发生于相对而言较为稳定的时刻，股价有上涨的空间，干预后就很容易放手，而目前正值萧条时刻，干预的买入，反而有可能是政府被套牢，香港的这种困境使得它处于极为不利的守备位置。这也是9月伊始，炒家毫无退缩之意的原因，这场战争已成了持久消耗战，随著战争的持续，北京已愈来愈有可能被卷入。

金融恐怖主义现形

不过，香港的金融保卫战虽然吃力且不容乐观，但这场战争在全球金融秩序上却有极大的象征作用。因为随着这场战争，国际金融秩序的弱肉强食，跨国金融集团形同金融恐怖主义的各种恶形恶状也都被摊了开来。香港是在替所有曾遭金融侵略的国家打一场抗议性的战争，国际社会的多数国家站在香港这一边。

也正因此，随着这场战争，尽管国际舆论里仍有许多坚持自由经济的人仍在反对香港的金融保卫战，但更多的人则逐渐开始转向。举例而言，一向对亚洲不太友善的克鲁曼(Paul Krugman)这次就公开站到了香港这一边。这位麻省理工学院的著名教授说："自由市场并不表示没有自由的滥用。故意操纵别国的金融是不对的，香港的干预是唯一的可用工具。"梭罗为首的跨国金融集团所造成的破坏，随着世界经济危机的日益严重，业已逐渐让人讨厌痛恨。香港的金融保卫战在这样的脉络下，有可能逐渐转化为一场金融政治的战争。梭罗这次碰到香港这块铁板，他也不可能讨到多少便宜。

因此，香港的金融保卫战，乃是一场具有多重意义的战争。这场战争是金融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是亚洲经济是否会继续恶化下去的桥头堡战争，设若香港弃守，港币与美元脱钩并狂贬，亚洲的竞争性贬值就会再现，而中国这个最后的防火墙也将弃守。设若如此，亚洲将面临的就不只是目前所谓的"传染病"，而是真正有毁灭性的灾难式大火了。

团队战胜个别杀戮

自从俄罗斯卢布狂贬，全球股汇市为之大震以来，全球的经济危机已愈来愈深。随着危机的深化，人们对始作俑者的跨国投机资本集团也愈来愈为反感。最近，美国媒体上谈论香港金融保卫战的论著极多。加州大学洛衫矶分校的教授普莱特(Tom Plate)在《洛衫矶时报》上发表了一篇很好的评论，有几段话值得人们记得：

——"香港企图驱逐投机者的策略，利用政府的金钱来拉高股价和支撑汇率，的确是勇敢的行为，当然也可能失败。但它若不失败，香港政府即将被视为一个天才，它终于设计出了一个先行的解救方法，可以驯化那些外来的，造成亚洲悲惨的巨大野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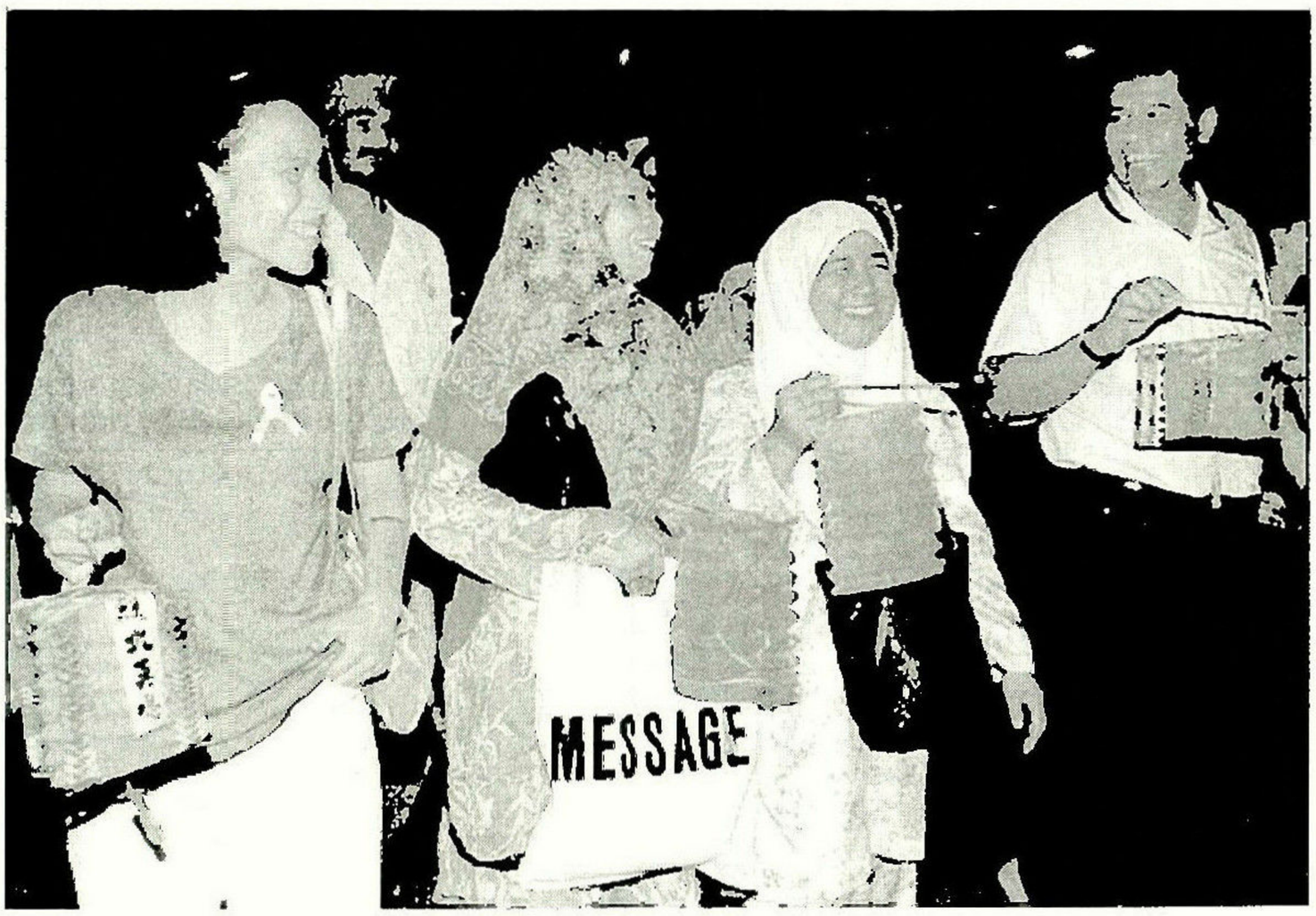
——"香港对国际经济稳定这个谜团的贡献，乃是它找到了股市和货币狙击间的关系，并企图让这两种狙击的效果均变得极小。"

——"各国政府都必须具有全球性的责任观念。因此，由香港之所为，亚太国家的财政部长们，应当发展出一种协同工作的团队精神。盖只有如此，亚太国家才不会被金融投机者的处决队伍所分化并个别的杀戮殆尽。"

(星洲日报 13/9/98)

其·心·可·诛

谢继麟



各族人士手提贴着“烈火莫熄”字条的灯笼游行。

不知道是甚么人出主意，在灯笼写上与马来人“改革”谐音相近的4个华文字，使华人传统节日沾惹上不必要的是非。

不管是甚么人出的坏点子，只有一句话可形容这项举措——其心可诛!

我们要的是一家团圆，快快乐乐，大人欢聚，小孩提灯耍乐的中秋节，而不是被别有用心者污染的节日。

你要搞任何运动，达到任何目的，这是你家的事，如果你抵触了法律，自然有警方来对付你，毋庸大家操心，但是不要利用我们快乐的节日来做文章。

我看到一些照片，一些少女提着写着上述4个华文字的灯笼，脸上焕发着纯真的笑容，是甚么丧心病狂的人会利用她们来渲染口号?

能译写出4个语带双关的华文字的人，本身相信是对华文有相当掌握能力的人士，不幸的是，这么有学识的人，不但未能深明大义，还把传统的华人节庆拉下浑水，此举简直令大家蒙羞!

安华政改运动所喊的“改革”口号，和中秋节原本是风马牛不相及，但是，随着这些别有居心、不负责任、不择手段的人把有关华文字写在灯笼上，中秋节的意义已被破坏。

任何有良知的人，都不会滥用本身族群的传统文化作为政治运动工具，反之，涉及这种行为的人，应该是已被某种利益或目的冲昏头脑者。

令人痛心的是一些妇孺在这些人的利用下，提着“题字”灯笼逛街，从而造成一些误会。

有鉴于此，单纯的人民务须提高警惕，不要被追逐利益的机会主义者唆摆或利用。这些机会主义者通常都躲在幕后行事，一旦有风吹草动，首当其冲是被他们利用的人。

国内各族人民都希望本身的传统文化及节庆受到友族同胞的尊重与认同，对于那些不懂得维护本身传统文化尊严，反之令其蒙羞的人，我们必须唾弃他们，而不是助长他们的无良行为。

谁最先把中秋节政治化？

黄进发

如果我告诉你，我在刚刚过去的中秋节中把“我爱你”三个字贴在纸灯笼上，送给心上人；你会不会骂我破坏中秋节，因为我的祖先乃至爷爷、爸爸都不曾这么做?

我猜你不会这么笨——如果所有祖先没做过的事，我们都不可以做，今天你我大概还是臂长过膝的类人猿。

把今年的中秋节过得如此有创意的人不是我，是约百位唱国歌提灯笼游行的马来西亚人。他们在灯笼上贴了“烈火莫熄”的字条，谐音 Reformasi。可惜吉隆坡总警长不懂得欣赏他们的幽默与创意，怪他们破坏中秋节。第二天，报章访问了几个政治人物，有人丢出“文化罪人”的罪名。(《南洋商报·雪隆版》C4, 7/10/98)

不让人家提“维新”/“兴革”灯笼的看法不外两种：第一、把传统文化节日政治化很不恰当，破坏庆祝节日气氛；第二、一旦华人节日被“利用”来进行政治活动，恐怕将来会影响政府对节日的“开放程度”。

我们不知道市警察总长和政客先生、女士们对中秋节乃至中华文化有多少认识。不过，他们大可放心，中秋节不是提灯笼那般脆弱，不会那么容易受到破坏。巴生国会议员陈仪乔博士认为，人民要政治改革，可通过选举或研讨会的方式，而不是上街示威游行。我们欣赏她正确的政治认识，知道人民完全有选择政治改革的权利，而不象一些烂政客般自以为是地以为全世界不支持自己的都是受了别人利用。不过，我们要补充的是，只要不触犯法律，如果任何人要选择上街，那也是他们的权利。有人要提“烈火莫熄”的灯笼，其他人不必费心。警方关心法治精神被落实就好了，不必担心中华民俗的“纯正性”。

中秋：政治色彩浓厚

原因很简单：中秋节本来是一个政治色彩非常浓厚的节日。如果要把中秋节“非政治化”，我们赏月就好了，绝不能吃月饼。月饼有很强的“反既成体制”色彩——传说朱元璋和他那批破坏大元帝国政治稳定的同党，就是把字条夹在月饼里，号召民众推翻一个不受欢迎的政权。

追溯上去，我们甚至不能告诉孩子们后羿和嫦娥的故事，因为他们的言行都不符合遵循权威的“亚洲价值观”，很容易给可恶的西方人利用。天上有十个太阳纵然太热，到底也是天帝的儿子，后羿却不知好歹把皇亲国戚全射下来，分明就是受了“外星”反动势力的蛊惑。嫦娥更要不得，丈夫再残暴也是自己丈夫，怎么可以为了人民大义灭亲，盗取丈夫的长生不老药。她丈夫那么爱她，两人大可长享富贵，为什么要去谈什么社会正义？社会正义一斤值多少钱嘛？最该死的是，她竟然投靠外来势力，逃到月球去做弃妇，分明是要丢地球的脸嘛！“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活该!

除了中秋，中华文化里有政治色彩的事物比比皆是。譬如说，端午本来是五月初五之意而已，为什么我们要吃粽子，赛龙舟？纪念屈原？屈原是谁？一个失意的政治异议分子兼思考太多的知识分子——这种人要是活在今天，就算不参加反

对党或NGO，“烈火莫熄”的灯笼队伍里也一定有他的份。另一个例子是“油炸鬼”。为什么两根面粉条从南宋吃到今天？还不是因为民众想把一些误国误民的家伙吃进肚子里泄愤？

为何极力非议政治？

中华文化里“政治化”的节日与民俗太多了，因为华裔和全世界的人一样，都不能活在政治的真空里，或者天生聋哑没有感觉。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要拼命把华裔马来西亚人“非政治化”？——是“甲必丹”思想阴魂不散么？不管什么原因，文化不象媒体任由你上下其手。如果我们要“阉割”文化里所有的独立政治意识，我们的文化纵使继承下来也是“太监”——大势已去也！

至于担心把传统节日赋以新意会引起当局敌视的顾虑，是传统的“官—民”思维模式，必须兴革/“烈火莫熄”一番。庆祝各族传统文化节日是马来西亚人的权利，也是国情，是马来西亚联邦宪法精神的体现，不是任何人的恩赐。我们不应该假定国家机关会囿于私利采取伤害国家的措施。安华的支持者屡次在回教堂聚会，并没有导致当局对回教徒行使本身信仰权利作出任何限制，就是国家机关尊重国人的宪法下权利的明证。任何没有根据的假定对国家机关是极不公平的。

我个人非常佩服提灯笼者的创意。这是传统中华文化本土化的具体建设。它为中秋赋了新义，也为大马社会提供了多一种温和的政治表达方式——你喜不喜欢它的内容是另一回事。

我不明白为什么记者没有采访在野的政治人物对“烈火莫熄”灯笼的意见——谁有道理，读者自有分数。受访者当中，我最欣赏的是民政党直辖区主席蔡崇安。他没有否定“另类灯笼”的意义，只是提出本身看法：烈火可能把好东西也烧掉。我们认为，这是政治人物应有的态度，你可以有本身的立场，也可以说服别人接受你的看法，但却不应阻止别人发表本身意见。如果阁下不喜欢“烈火莫熄”，大可弄一个“支持马哈迪首相”的灯笼游行。不久前，不是连墓园的法会上都有人发动支持首相的签名运动吗？

说到底，这是一个现代的社会，你可以努力说服但绝不能勉强任何人支持或反对谁。勉强没有幸福！如果你不明白，回家看粤语残片吧！

（作者为国大硕士班研究生，email: chinhuatw@hotmail.com）

（南洋商报 11/10/98）

烈火莫熄殃及传统文化

刘磐石

当9月风云笼罩大马天空，游行示威激情澎湃的时候，我们认为街头政治对国家没有好处，不能鼓吹；当国家面对严峻金融风暴，亟需全民团结一致，共挽狂澜的时候，我们更认为狂热的政治暴乱，不能发生。因为局势如果不幸失控，将会造成治安不靖，社会秩序荡然，经济复苏遥遥无期，人民生活不能摆脱水深火热。

难以想像到，中秋节前夕，吉隆坡竟然发生一椿妇孺在街上提灯游行事件，参与者手上提着大书“烈火莫熄”字眼的

灯笼，乍看之下，令人丈八金刚，摸不着头脑，以为时髦兴改革，中秋节也要“烈火莫熄”？经追问之后，才明白原来这些妇孺在支持安华，参加“改革”示威游行。

通常，华人在灯笼上写字，提着灯笼游行，只有在丧事场合才见到。中秋节这喜庆洋洋日子，提着写字的灯笼满街跑，该是破题头一次，大家除开咀说“大吉利是”之外，都觉得那些革新人士的创意，离谱到不可思议。

中秋节是一个渊源久远的华人传统节日，文化气息非常浓厚，是文人墨士抒发情怀的好日子，也是大人小孩欢腾热闹的好日子。许多动听的故事，如“嫦娥奔月”，月饼传讯，推翻暴政等故事，脍炙人口，百听不厌。古代诗人李白（编按应是苏东坡）有“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佳句，现代伟人毛泽东也以“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午”来自慰，至于凡夫俗子，则只能寄以“人月两团圆”来庆祝中秋佳节了。

大概改革派智商过人，不甘寂寞，不让前人专美，也要独倡新意，想出“烈火莫熄”，游行闹中秋，开我国中秋节故事新编的先河，让后人有所跟随，留为佳话吧？

可是，这样一来，却害惨了中秋节，诚如报章评论所说：创意归创意，“烈火莫熄”虽然达到最有效的宣传效果，却把华族文化卷入政治，污染了华人传统节日。后果非常不妙！

利用妇女和小孩，利用中秋提灯来达致某种政治目的，改革派可说居心叵测，给人印象不好，难怪连日来受到各方面谴责。

华人向来可以高高兴兴的庆祝各种传统节日，中秋节是最充满欢乐与融洽气氛的节日之一，倘若卷入政治漩涡，发生不愉快事情，谁愿意看到这样的后果？

多年来，华社一直努力发扬中华文化，提倡传统节日和民俗活动，今天，这些文化活动有了一些成绩，正待开花结果，如果因为卷入街头政治而告前功尽弃，岂不是可惜？

必须严正指出：改革派利用传统中秋节，来策动“烈火莫熄”示威游行，是非常不理智和极危险的做法，此举不但影响节日气氛，污染节日意义，更对华人文化建设不利，对促进种族和谐不利，除了破坏，对社会改革并不能起什么积极作用。

政府向来尊重民族传统文化节日，也一直以开明态度来看待华人的文化活动，但如果文化被政治挂帅，把文化活动牵进政治斗争里，相信人民必不容许这样做。

文化建设是一条漫长的道路，需要大家细心爱护，努力耕耘，长期积累，才有成绩可言。在多元种族社会里，文化建设更加艰辛，更需多方配合，做到互相尊重，互相了解，互相交流，融汇贯通，才能集大成，茁长和开花结果。

节日文化和民俗文化，是文化活动的重要部份，我们欣喜看到：华社经过多年努力之后，已把中秋节活动普及到各阶层中去，得到广泛认同。许多友族朋友和子弟，也吃月饼，提灯笼，跟华人一起同庆中秋节。

这种成果大家必须珍惜，不能让“烈火莫熄”来破坏。

“烈火莫熄”应在政党内，通过大选，通过议会民主斗争来实践，绝不能被鼓励走上街头，在文化领域里，在传统节日中出现，以避免发生敏感效应，殃及传统文化。

（南洋商报 14/10/98）

传统节日与政治化

张小兰

笔者从小所景仰的中国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1140-1207)有一首模仿屈原《天问》的送月词——《木兰花慢》:

可怜今夕月,
问何处,去悠悠?
是别有人间,
那边才见,
光影东头?
是天外,空汗漫,
但长风浩浩送中秋?
飞镜无根谁系?
姮娥不嫁谁留?
谓经海底问无由,
恍惚使人愁。
怕万里长鲸,
纵横触破,
玉殿琼楼。
蛤蟆故堪浴水,
问云何玉兔解沉浮?
若道都齐无恙,
云何渐渐如钩?

这是一首和中秋节有关的优美诗词,词人用丰富的想象力和勇于探索的精神以及浪漫主义的豪放,"把有关月亮的一些神话传说和生活比喻交织成一幅形象完美的绚丽图画,想象奇瑰,构思新颖,引人遐想,发人深思,可谓千古绝唱。"

辛弃疾是继苏轼之后,进一步扩大词的题材,几乎达到无事不可入词的地步,发展和丰富了诗词这一优秀传统文学形式。他二十一岁时参军,后做过官,注重军事训练,不畏强权,关心民瘼。有很大的政治抱负,但在政治道途上不得志,后郁郁而终。辛弃疾用诗词反映社会生活,政治现状,揭露和批判当时的上层统治集团,早已把中国优秀传统文学形式——诗词——"政治化"了。

中秋节与月饼的传说

"据史书记载,在中国古代帝王中,就有春天祭日,秋天祭月的礼制。《礼记》中载有:'天子奏朝日,秋夕月。朝日以朝,夕月以夕'。这里的'夕月'即拜月之意。可见,在封建帝王中就有八月十五晚祭拜月亮的习俗了。到了魏晋,已有中秋赏月之举。"中秋赏月,最盛的是宋代。到了明代,"八月十五日祭月,其祭果饼必圆……"。到了清代,"中秋之夜,人家各有宴会,以酬佳节。"

中秋吃月饼的传说则是:"元朝末年,蒙古贵族统治者为巩固其残暴统治,不准民间用铁制武器,规定每十家合用一把菜刀,统治者无恶不作,百姓恨之入骨。高邮张士诚暗中串联,在月饼里夹一起义的小字条,到了中秋之夜,家家掰开月饼,看见传单,纷纷夺取菜刀,举行了反抗元朝统治者的起义。从此,人们每到中秋节,就要吃月饼,以纪念这一人民群众的斗争节日。"

传统节日与政治

风俗习惯、传统节日都是在人们生活中逐渐形成的,同时又反映了社会现实和人们的思想感情、愿望和要求,符合社会现实和人们普遍要求的风俗习惯,传统节日将能恒久的继承下来,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变迁而在内容、形式上都有所改变,或加添新的因素以符合时代的要求。那些僵化的、落后的、一成不变的、不再反映社会现实和人们思想感情的风俗习惯、传统节日将随着时间的流逝,社会的发展变迁和时代的更迭而被淘汰。

政治是管理众人的事,民主政治是众人管理众人的事,是众人的事务。政治存在社会现实之中,存在于人们的社会

生活之中。政治现实是社会现实的一大部分。人们的思想感情也离不开人们的政治思想感情、政治愿望和政治抱负。如人们都希望“天下太平”，“天下太平”的愿望本身就含有浓厚的政治意味了。任何人认为可以脱离政治，认为社会生活可以不是政治生活，都是愚昧的。政治是无所不在的，你想不理它，它却时时刻刻会来理你。

端午节的政治意义

风俗习惯，传统节日不一定都和政治有直接关系。但是在某些历史时期，某些时候，某些风俗习惯和传统节日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现实，也是很自然的。如果说风俗习惯、传统节日与政治必须截然分开，是互相矛盾、抵触的，或者说政治因素会破坏了传统节日，那只能说是一种无知或别有用心。更何况有些风俗习惯和传统节日本身就具有浓厚的政治意味。

例如端午节，尽管中国现代文学家闻一多先生在《端午节的历史教育》一文中作过详细而精辟的考证，认为端午节是古代吴越吴族——一个龙图腾民族举行图腾祭的节日，然而，端午节在民间却有其他传说，其中之一便是有关屈原投江的传说：“……相传战国时代，楚怀王不接受大夫屈原关于联齐抗秦的主张，被张仪骗到秦国软禁，逼他割地献城。楚王又羞又悔，忧虑成疾，不久便死于秦国。这消息传到楚国，忠贞的屈原悲愤欲绝，上书新即位的顷襄王，望其近忠远奸，选将练兵，为怀王报仇。谁知顷襄王宠信奸佞，将屈原削职逐放。秦国一看时机成熟，便立即出兵，在很短的时间内，楚国便失地千里，百姓尸横遍地。屈原眼看自己的祖国被侵略，而自己救国无由，美好的理想变为泡影，感到心如刀割，但始终不忍舍弃自己的祖国，于公元278年农历五月五日投汨罗江身死，以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壮丽的爱国主义乐章……。”“……这些美好的传说，把端午节及其他吃粽子、赛龙舟的习俗说成是由于屈原之死才产生的……几千年来，人们一直相信这些传说。令人惊奇的是，这些传说把原有的风俗习惯与纪念屈原结合得那么巧妙。它反映了广大人民对屈原热爱与怀念之情，就连揭示了端午节真正起源的闻一多先生也非常赞同保持有关传说，佩服这些传说包含着‘无上的智慧’和深远意义。”

按照这一传说，显示当时人们认同屈原政治理想和主张，对屈原的纪念与缅怀也就是对昏君的间接抗议，只不过他们不是采取政治行动，如集会抗议、示威等，而是用传统文化形式表达出来，这有多浓厚的政治意味，而又多么巧妙的把政治因素和传统习俗、传统节日结合起来。

清明节和中秋节的政治抗争

清明节是华族古老传统，但是到了现代的1976年，那一年的清明节却在中国发生了震惊世界的政治事件。当时中国人民在权力狂和野心家们的压迫下，再也无法忍受，就在那一年的清明节前后，在全国爆发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巨大抗议行动。这一事件对后来中国的政治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如果当时有人认为不要让政治事件破坏了传统的清明节，可能吗？人们利用清明节，借着对故人的哀思，以表达强烈的政治改革愿望，这一政治行动并未丝毫破坏清明节这一传统节日。那一年过后的清明节还是清明节，而且更加清明。

中秋节吃月饼的故事更是一项惨烈的政治事故——起义、革命、暴动。当时人们掰开月饼，看到了号召起义的传单，竞相拿起菜刀和其他武器与残暴统治者作殊死战。一时间，中原大地一片血雨腥风，也就是这样才赶走了当时元朝的残暴统治。

如果当时有人说，不要破坏中秋节这和谐、温馨的传统节日，不要实行起义，要人们为了保持传统节日而忍辱偷生，让残暴统治继续鱼肉人民的话，后来的人们也许连中秋节都没得过了。那一年腥风血雨过后，中秋的月亮格外明亮，中秋节也更加温馨和谐，还增添了中秋月饼这一道美食，也给这传统节日注入了深远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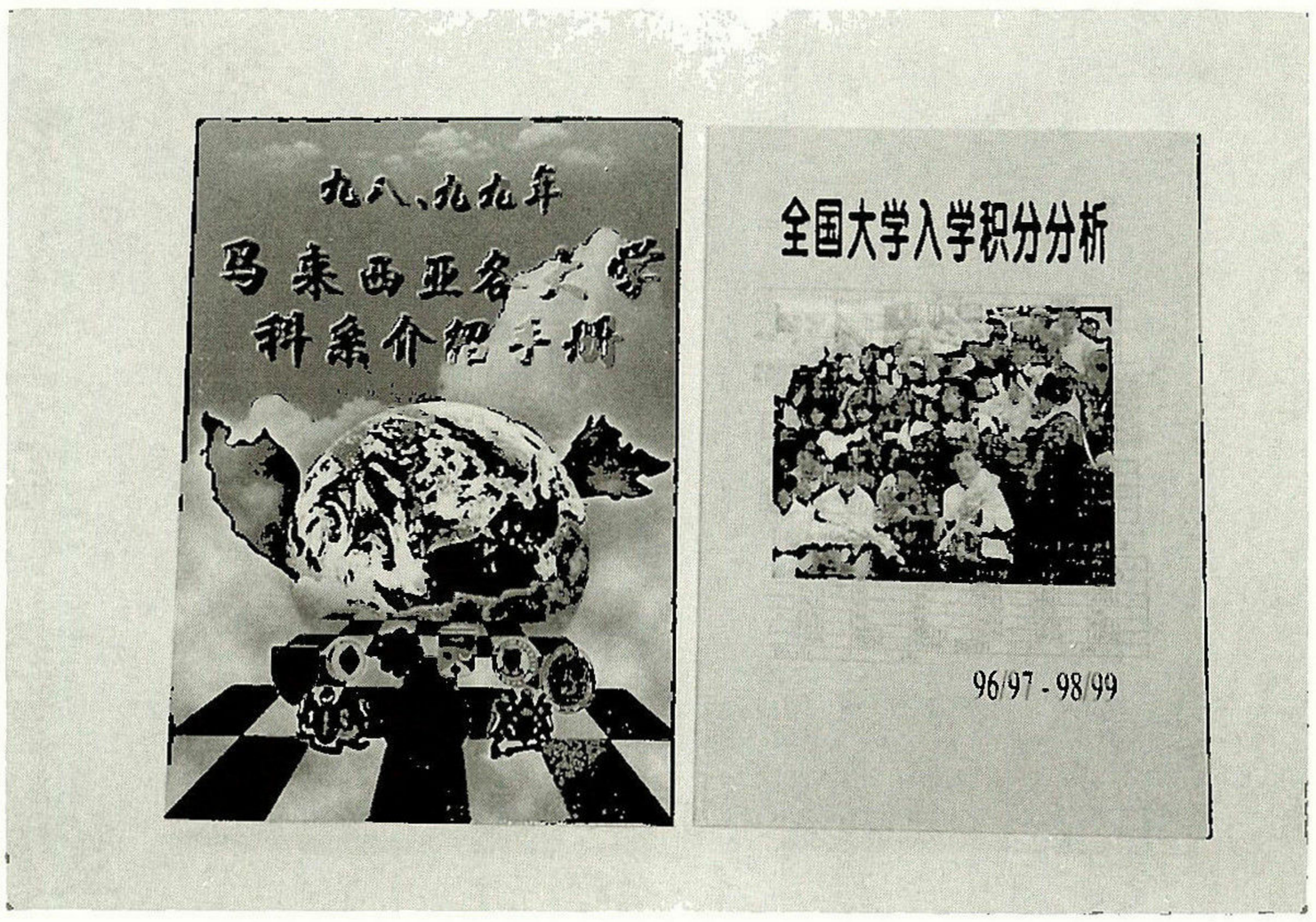
与政治的巧妙结合

现代人也经常巧妙的把传统节日和传统文化与政治结合起来。君不见华族传统文化表演艺术——舞龙舞狮不是常常被利用在政党集会上，或政治集会上、或迎接“政要”，或对“政治领袖”的效忠吗？中元节的歌台舞榭更妙，除了有现代化的低俗表演外，也常常有政

客借机发表其政治演说。尤其是在大选接近时，或有某些政治事件发生，或在集团争执政治权力的时候更是被充份利用。农历新年一年一度的大节日也不例外，君不见在多少新年团拜的集会上，台上台下的政客们不是发表其“政治”演说吗？或者在进行政治势力的游说。这些明显的政治活动，这些巧妙的政治结合，并没有破坏传统节日，年节还是一样过。

点上小火的灯笼，贴“烈火莫熄”的小字条儿，数百各族青年中秋提灯游行，发扬了传统中秋文化，反映了当前社会现实，却召来了一群政客的警诫：“不要让政治破坏了传统节日文化”。这警诫背后正隐藏着重大的政治动机与目的。只可惜他们对政治和文化是那么的无知，而显得异常笨拙。更可怜的是一小撮无知无助，惶恐不安的年轻人也随声附和。

(南洋商报 18/10/98)



迈向大专院校指南

- 96/97 - 98/99《全国大学入学积分分析》RM9.00
- 《马来西亚各大学科系介绍手册》RM13.00

出版了！

- 欢迎购阅参考
- 作出最佳选择

合购两册特价优待 RM20.00

邮购请另付邮资 RM 2.00

订购处：

华社研究中心 (271806-T)

Huazi Resource & Research Centre Bhd.

No. 1, Jalan Maharajalela, 50150 Kuala Lumpur, Malaysia.

Tel:03-2734035 Fax:603-2734037



这是对叶亚来生平事迹详尽而客观的叙述

大量的对叶亚来多方面描绘叶亚来这个百折不挠的拓殖先驱、指挥战争的战略家、操奇计赢的富商和勤政保民的行政长官一生的活动和事业，反映出第一代华族移民所走过的艰苦而险阻的历史道路。

这是对叶亚来历史功绩科学地分析和论断

每本
平装 RM 20.00
精装 RM 30.00
邮购请另付邮资
RM 2.50

邮购处：
华社研究中心（华研）(271806-T)
HUAZI RESOURCE & RESEARCH CENTRE BHD.
No.1, Jalan Maharajalela, 50150 Kuala Lumpur, Malaysia.
Tel: 03-2734035 Fax: 603-2734037
E-mail: huayan@huayan.net.m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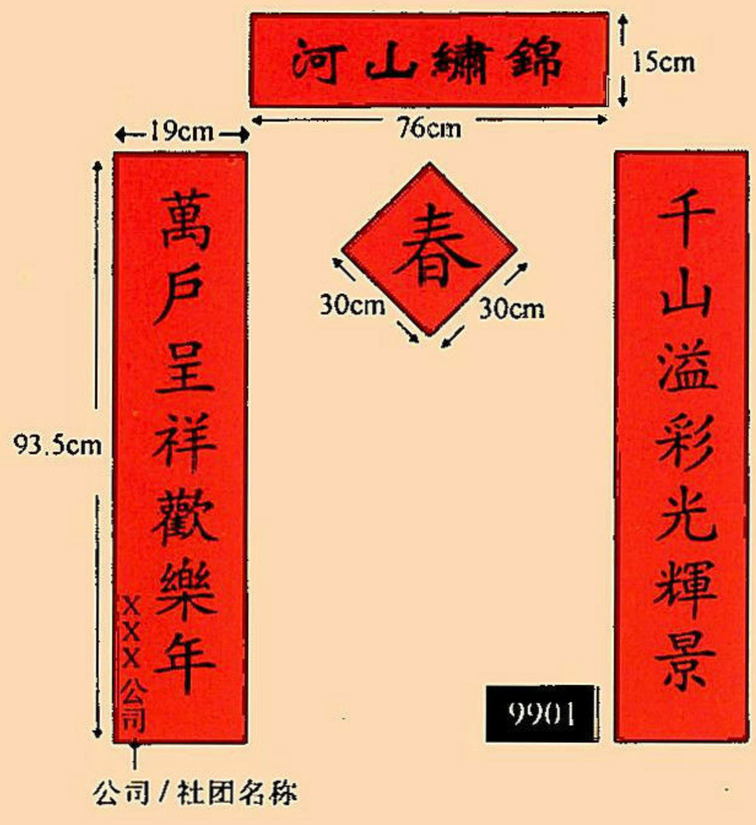
华社研究中心
联合星洲日报
马大中文系毕业生协会

欢庆春节张贴春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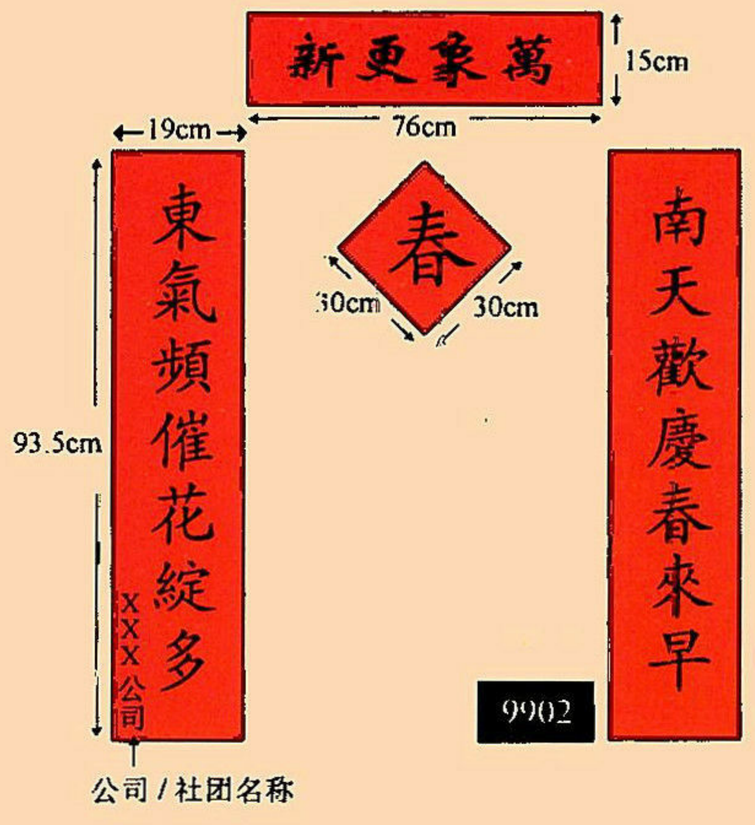
发扬华人优良风俗
展现多元文化精彩

主办己卯年贴春联运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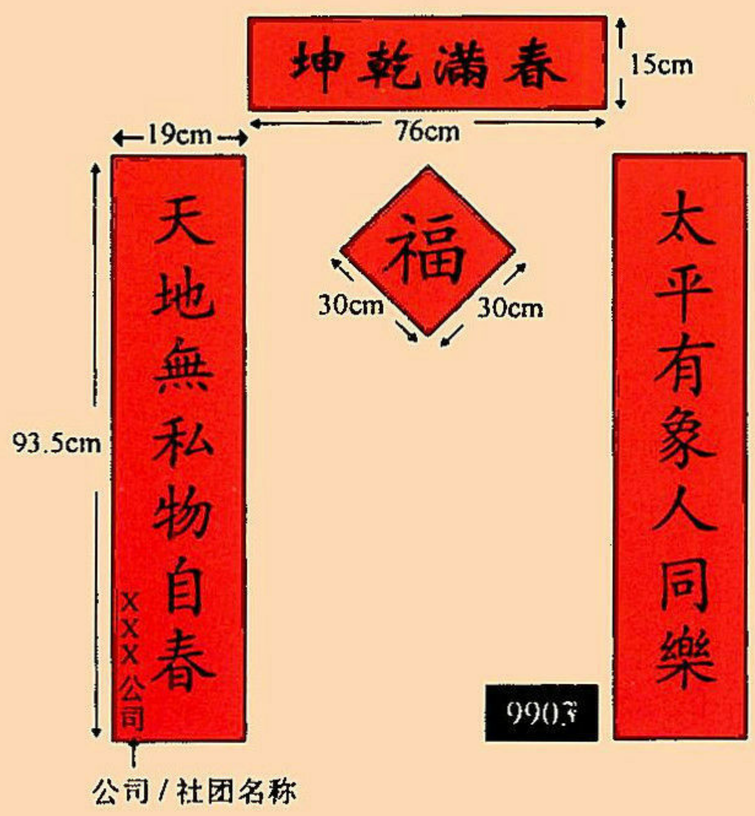
- 五套精美春联
- 欢迎各界选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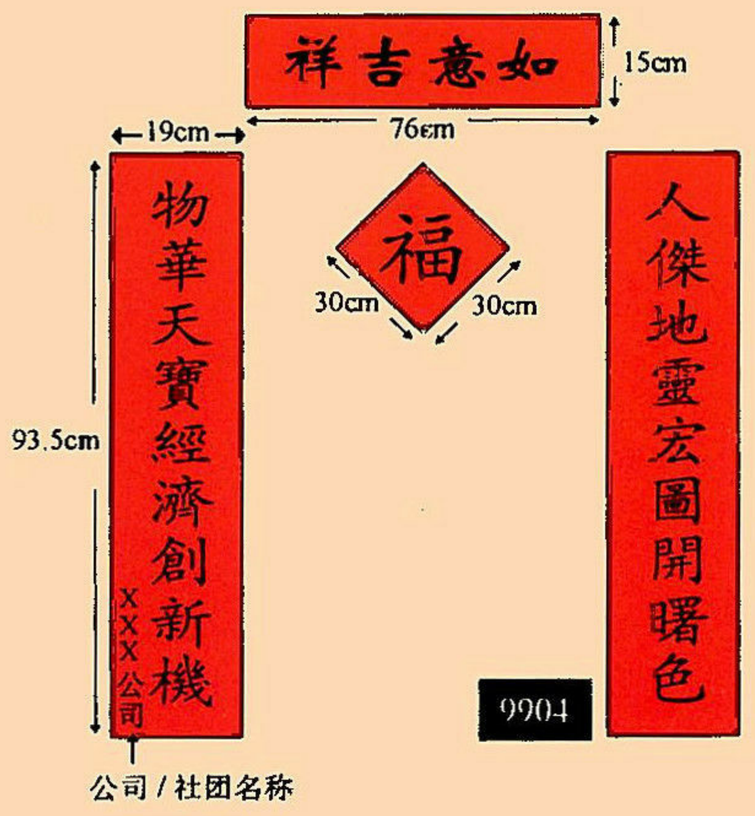
公司 / 社团名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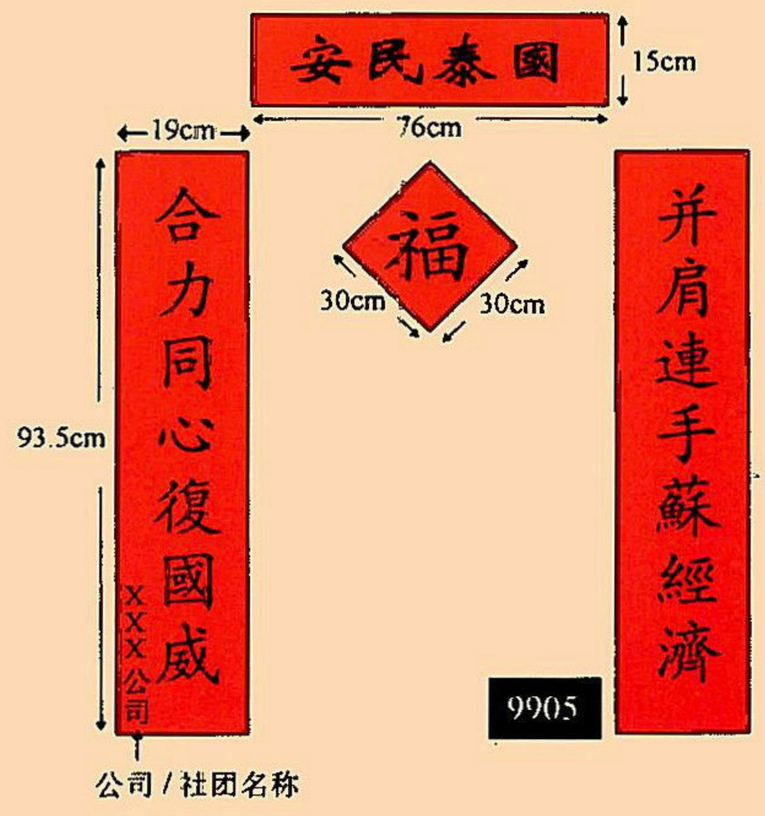
公司 / 社团名称



公司 / 社团名称



公司 / 社团名称



公司 / 社团名称

价格： 1. 每套春联零售价为 RM10.00。
2. 凡认购 50 套以上者，享有以下折扣及优惠：

套数	特别印刷	供应价(RM)
50 以上	无	6.00
500 以上	免费加印公司宝号 社团名称	6.00

订购处：
华社研究中心 (271806-T)
Huazi Resource & Research Centre Bhd.
No. 1, Jalan Maharajalela, 50150 Kuala Lumpur, Malaysia.
Tel:03-2734035 Fax:603-2734037

工商業華文電話簿

讓您的生意
《搶得先機．佔盡優勢》



全國免費派送

欲知詳情，請聯絡工商業華文電話簿廣告部

電話：03－7930142，7930146

傳真：03－7943507

工商業華文電話簿
PANDUAN PERNIAGAAN BAHASA CINA

PPBP 工商業出版有限公司 (員下子公司)
PANDUAN PERNIAGAAN BOOK PUBLISHING SDN. BHD. (Co. No: T. 160039－H)

新麗印務局有限公司
PERCETAKAN SOLAI SDN. BHD. (Co. No: 22182－W)

No. 8－10, Jalan 213, 4605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Darul Ehsan.

工商業華文電話簿 工商業華文電話簿 工商業華文電話簿 工商業華文電話簿 工商業華文電話簿 工商業華文電話簿 話電文